

王阳明：

心学的力量

方志远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王陽明

：

方志遠 著

心學的力量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心学的力量 / 方志远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7871-6

I. ①王… II. ①方… III. ①王守仁(1472-1528) — 心学—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7389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王阳明：心学的力量

方志远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871-6

2019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8

定价：40.00元



目 录

第一讲	从云端回到地面	1
第二讲	圣贤须在事上磨	19
第三讲	龙场悟道，“道”在心中	39
第四讲	此心在物，“心”即是理	57
第五讲	“政在亲民”	73
第六讲	“破山中贼易”	89
第七讲	“破心中贼难”	107
第八讲	宁府之变	129
第九讲	处变不惊	145
第十讲	以方寸心，体天下物	161
第十一讲	绍兴刮起“王旋风”	183
第十二讲	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	199
第十三讲	最后的行程	219
第十四讲	斯人已逝，斯人永在	235
后 记		255

【第一讲】

从云端回到地面





一、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伟大

公元1499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是明朝科举的“大比”之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齐集京师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明朝的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要经过四轮考试。严格地说，前三轮都属资格考试：

第一轮为“科考”，三年之内二考，在各府、州、县的官学进行。只有在科考中进入优等的“秀才”即官学学生，或以“同等学力”通过科考的“儒士”，才有资格参加下一轮的乡试。

第二轮为“乡试”，在会试前一年的秋八月进行，故称“秋闱”，分别在各省省会进行。只有在乡试中录取为“举人”者，才有参加下一轮会试的资格。

第三轮为“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春二月进行，故称“春闱”，又称“大比”。届时全国举人云集北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考试地点在贡院。明清时代北京的贡院今已踪迹皆无，只留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的名称，告诉人们当年“贡院”的位置。在会试中录取为“贡士”者，获得参加下一轮殿试的资格。由于殿试是等额考试，所有通过会试成为贡士的举人，已是“准进士”了。所以，对于天下的举子们来说，会试是真正决定命运的考试，所以才有“大比”之说。

第四轮为“殿试”。和乡试、会试连考三场不同，殿试只考一场，属“排名”考试，通过一场“策试”，将贡士分为“三甲”，即三个等级：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人们分别称之为状元、榜

眼、探花；二、三甲各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试，所以，进士们都是“天子门生”。

弘治十二年的会试和往年一样，按程序进行，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由于两位伟大人物的出现，使得这一年的会试非同寻常。这两位伟大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位是刚到而立之年的南直隶举子唐伯虎，另一位是比唐伯虎小两岁的浙江举子王阳明。而唐伯虎、王阳明的家喻户晓，从一定程度来说，都和这一年的大比直接相关。

唐伯虎姓唐名寅，“伯虎”为其字，是年30岁。前一年，唐伯虎在人才济济的南直隶乡试中高中榜首。人们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唐伯虎便是以南直隶解元的身份，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但是，会试刚结束，有位名叫华咏的给事中上书，直指主考官、礼部侍郎程敏政泄题，唐伯虎和另外一位富家出身的举子有行贿之嫌，理由是唐伯虎二人会试前见过程敏政，而二人试作的文章又与程敏政所出的试题相吻合。这件事情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虽然经过核实，唐伯虎二人的考卷并没有出现在被录取的试卷之中，也就是说，虽然唐伯虎是南直隶的解元，但这一次的大比却是落第了。而爆料泄题的给事中华咏，也因为危言耸听的“妄奏”下狱贬官。这说明，泄题乃是“莫须有”。但是，“瓜田李下”，考生在考前见主考官，无论如何脱不了作弊的嫌疑，所以，主考官程敏政被罢官，唐伯虎二人则被革除功名，直贬为吏。

这个打击对于心高气傲的唐伯虎极为巨大。明朝男女青年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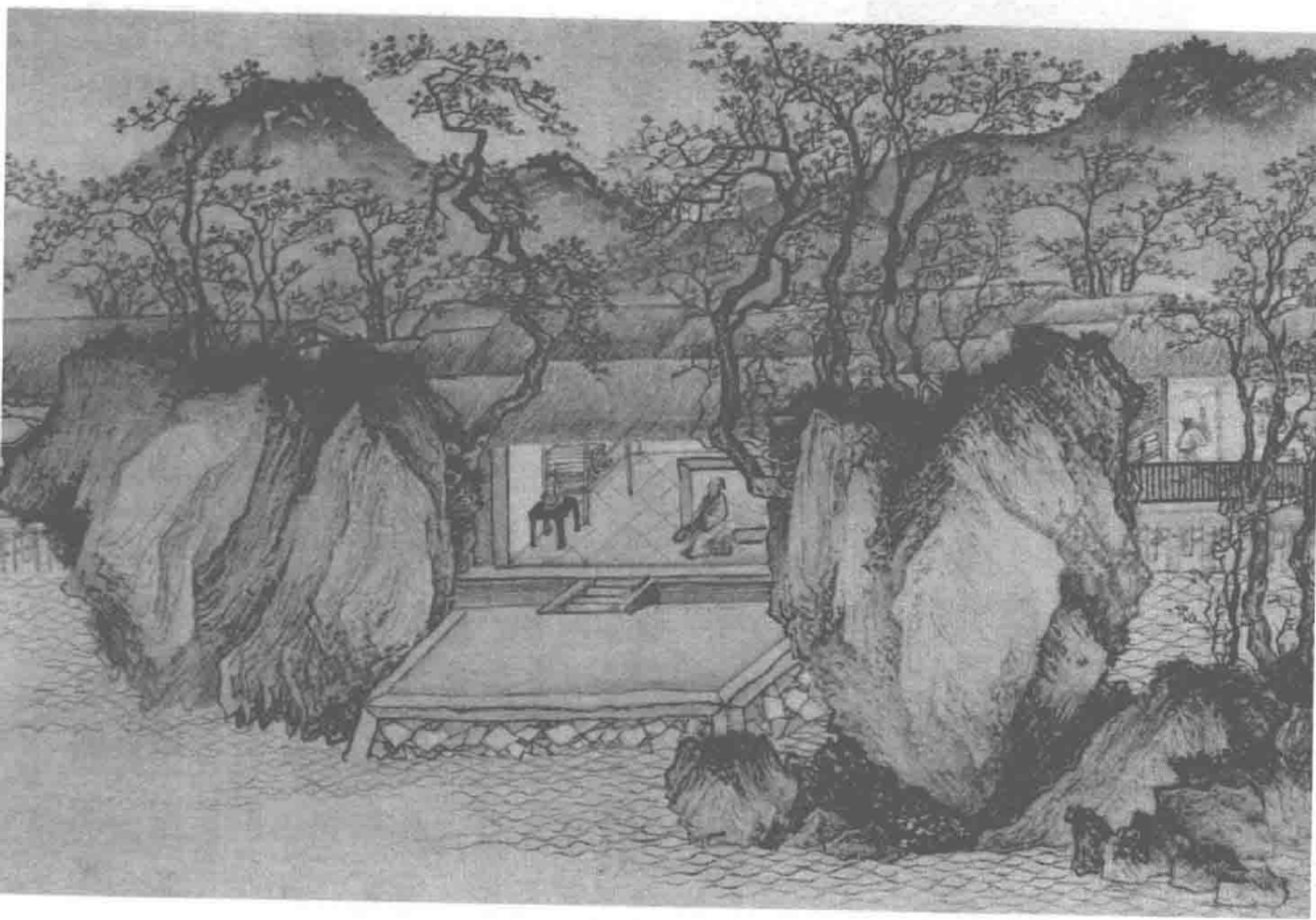


恋爱，海誓山盟，永不分离，说是若要你我来分离，“除非天变成地、东变成西、官变成吏”（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可见，贬为吏是严重的人格侮辱和沉重的仕途打击。唐伯虎不但极具才情，是南直隶解元，而且极具个性，和当年的陶渊明一样，不屑于为“吏”这五斗米而折腰，从此放弃仕途，放浪形骸，在明朝的“体制外”折腾。折腾什么？折腾艺术，并且闯下了极大的名头。“六如居士”的书画成为珍品，“唐伯虎点秋香”的戏曲成为经典。但是，唐伯虎虽然是在体制外折腾，却恪守道德底线：“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汪砢玉《珊瑚网》）

再说王阳明。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阳明”为其号。由于“王阳明”的名头太大，“王守仁”的本名反倒少为人知了。顺带一提，明朝科举排列前三位的三大府：一个是唐伯虎的家乡，南直隶的苏州府；另一个是王阳明的家乡，浙江的绍兴府；还有一个是我的家乡，江西的吉安府。

虽然比唐伯虎小两岁，王阳明中举人的时间却比唐伯虎早了6年，加上父亲是成化年间的状元，所以同样引人注目。只是在乡试之后的两次会试中，王阳明落榜了，或者他是在等待唐伯虎的到来。弘治十二年的大比，唐伯虎因“泄题案”被贬为吏，王阳明则以会试第二名、殿试第十名的成绩中了进士。从此以后，王阳明走上了和唐伯虎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明朝的“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

但是，王阳明一面在明朝体制内建功立业，一面又和唐伯虎一样，在体制外折腾，在体制外授徒讲学。而且，无论是在体制内的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的讲学授徒，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



唐伯虎《西洲话旧图》



王阳明

被称为有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第一人。

所以把王阳明、唐伯虎二人同时推出，是为了说明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明朝前期的“严峻冷酷”已经过去，社会已进入“百年承平”的转型时期；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呈现繁荣，风气日渐开放，思想趋向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正在到来。

所以，不管是在体制内做官、建功立业，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艺术、讲学授徒，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和活动，都有成功的机会，都可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这是一个“生产”天才的时代。王阳明出生的前十一年，“江南四子”之首的祝允明（自号枝山）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前二年，“风流才子”唐伯虎出生在苏州府吴县。王阳明出生的第二年，“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出生在陕西庆阳即今甘肃庆城；四年后，识拔张居正的顾璘在苏州出生。在王阳明出生的前后，苏州的木工蒯祥、石工陆祥，因为工艺天才，为正三品的工部侍郎；江西的术士李孜省、邓常恩则因精通术数，分别做到正三品的通政使、太常寺卿。更多人的选择则是“弃学经商”，徽商、晋商、江右商等地域性商人由此而崛起。“三国”“水浒”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通过民间艺人的反复说唱、民间文学家的反复加工，逐渐演绎成长篇巨制《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的。

正如老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孟子的学说一样，王阳明及

其学说，也并不是什么时代都可能出现。其发生在明代多元化社会到来之际，并推动了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如果对这个时代的特征缺乏认识，就无法解释王阳明及其学说的发生与传播。同样，对于王阳明及其学说的重新认识，也必然是发生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在日本，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夜；在中国，则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及“深化改革”的当下。

二、余姚的琅琊王氏

虽然说英雄不论出身，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王阳明之成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王阳明，和他的家风，和他的祖辈、父辈乃至祖上的遗风，也不无关系。

王阳明的先祖来自山东。两晋之际，“八王之乱”“永嘉之变”，天下大乱，中原的“衣冠之族”纷纷举家南迁。山东大族琅琊王氏也在此时迁到了江南，为东晋王、谢、桓、庾四大“侨姓”家族之首。王氏家族的代表王导、王敦，是东晋王朝建立的决策人物。

这个由山东琅琊迁来的王氏家族中的一支，来到了昔日越国都城的所在地绍兴（战国时称会稽，东晋时称山阴），开始在浙东定居，“书圣”王羲之就出自这个家族。两宋之际，王羲之的一位后人从绍兴东迁到了杭州湾南岸的余姚，于是有了余姚王氏。余姚虽然没有绍兴名气大，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就在这里被发现。

转眼已是明朝的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余姚王氏的一



支，户主名叫王伦，这是王阳明的祖父。“王伦”这个名字很眼熟，凡是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有个“白衣秀士”王伦，占着梁山泊，但心胸狭窄。王阳明的祖父取名“王伦”，正说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水浒传》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至少没有产生影响，否则，王阳明的祖父打死也不会取名“王伦”。

王伦是具有魏晋名士之风的豁达之士，平生有“四好”：好竹、好书、好琴、好帮助别人。王伦于居室之外遍种翠竹，并以竹子的品格激励自己。由于爱竹成癖，他得了个雅号，叫“竹轩先生”。王伦见书必读，读到高兴处，独自走出居室，在竹林中放声咏诵。又时时在风清月朗之夜，焚香操琴，抚弦而歌，并命子弟们按节而和。一家人在他的熏陶和带领下，耕读治家，意趣盎然。王伦还极富同情心，亲戚邻里有贫寒者，总是解衣推食，唯恐不及；教人子弟，总是尽心尽责，唯恐有失。所以，王家虽然无权无势，却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声望。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王华，母亲郑氏。相传王阳明出生时，有彩云缭绕其出生的楼阁，此楼后称“瑞云楼”。瑞云楼至今犹存，但已不是明朝的旧物。又有传说，其母郑氏怀孕14个月才生下王阳明，这就有些离谱了。如果不是怀孕时间推算上的失误，就是祖父王伦或其他人营造出来的神话。

王阳明10岁的时候，父亲王华中了状元。这是明朝的第35位状元，这也是自有科举以来，浙东王氏家族的第一个状元。而且，王华并非是以官学生员即“秀才”的身份，而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中状元，用今天的话说，是以“自

学成才”的“同等学力”中举人、中状元的，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对于每一个成功人士，人们总是可以回忆出许多与众不同的故事，王华也一样。

有记载说，王华6岁时，和伙伴们在河边玩耍。有一醉汉来到河边，洗了个脸，然后离去。小孩一心玩耍，没有工夫留意醉汉。天色近午，伙伴们先后散去，王华正要回家，却发现醉汉滞留过的地方有一提囊，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十两银子。毫无疑问，提囊是醉汉遗失的。王华将提囊沉入水中，以免他人取去。然后坐在河边，等候失主。不多时，醉汉果然号哭而来。银子失而复得，醉汉感激万分，取出一两银子，打发小孩。王华笑道：几十两银子我都不要，怎会收你一两银子？醉汉随王华来到王家，逢人作揖，千恩万谢。

又有记载说，王华14岁时，在余姚近郊的龙泉寺读书，同学都是富家子弟，以豪侠自许，屡屡欺负寺中和尚。传说龙泉寺中曾经闹鬼，和尚们便借此装神弄鬼，实施报复。同伴们先后离寺而去，唯王华不为所动，继续在寺内，诵读不止。和尚们暗暗称奇，问道：众人皆惧，独尔不惧？王华反问：何惧之有？和尚们说：近日闹鬼，难道你不害怕？王华笑道：不见闹鬼，只见和尚装神弄鬼！

还有记载说，乡试之前，王华曾受浙江布政使宁良之聘，在宁氏的祁阳梅庄教习子弟。宁家藏书甚多，王华在祁阳三年，白天授徒，晚上读书，足迹不入城市，学问大进，《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精，人称“五经司令”。祁阳狎妓成风，王华



全然不为所动。三年聘满，王华得回余姚，当地士人在江边亭楼设宴饯行。饮至夜深，酒酣人散，众人留王华独宿亭中。王华推门入室，刚想就寝，却见帐内坐着两个美貌女子。王华此时已有几分醉意，见状大惊，返身退出，想要出亭，岂知亭门已经落锁。情急之中，王华奋力推开窗户，又卸下亭内一扇门板，跳窗而出，将门板投入江中，拥身跳上门板，连夜渡江而去。几个惯于恶作剧的祁阳士子就在近处窥视，看着王华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朦胧夜色之中，不禁相顾赞叹。

这些记载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王华的形象，有主见、有定力、有胆量。

王阳明是幸运的，虽然母亲去世较早，但他不仅有一位豁达大度、胸怀坦荡的祖父，还有一位品行高尚、学问精深的父亲。在此后的讲述中，我们还将看到，若干代人的培育，祖、父两代的熏染，是如何在王阳明的一生中留下深刻烙印的。

三、天下“第一等事”

父亲王华中状元的第二年，王阳明随祖父王伦来到北京，被父亲安置在附近的一处里塾，和几位官员的儿子一道读书。

此时的北京，已经比较繁荣，王阳明上学，得经过几条街道和胡同，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僧道卜筮，无奇不有。王阳明每天散学之后，便和同伴在街上闲逛，哪里热闹往哪里凑，时常玩得昏天黑地。父亲知道了，多次斥责，但每次都有祖父护着。王阳明有祖父为靠山，更是为所欲为。

一天放学，王阳明和同伴照常在街上晃悠，被一位相士拦住。相士上上下下将其打量几遍，说道，我见你相貌奇特，赠你几句话，日后自有应验：“须拂颈，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阳明年谱》）说罢，转身离去。同伴们没听清相士胡说了什么，哄然散去。王阳明却一字一句听得明白，暗自琢磨：入圣境、结圣果、圣果圆，这是何意？须拂颈、须至上丹台、须至下丹田，又是何意？祖父、父亲发现，这个孙子、儿子，性情变得有些古怪了，有时独自发呆，有时又自言自语，却不知这是因为相士的几句话在作怪。

几天后，里塾先生和往常一样，苦口婆心向王阳明及同学们灌输读书求功名的道理。这帮学生的祖辈、父辈，都是习举业、考科举的行家里手，而他们自己，则是些不屑举业、不把科举当回事的“官二代”“学二代”。听着听着，王阳明陡然发问：人生有许多事要做，哪件是第一等事？先生一愣，自己费了半天口舌，竟然还有人提出如此幼稚的问题，有点丧气：“惟读书登第耳！”当然是要好读好书、博得功名，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先生说得没错，在那个时代，虽然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然而“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登第”。但是，王阳明冷不丁的一句话，令先生瞠目结舌：“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年谱》）

完全可以认为，当13岁的王阳明懵懵懂懂提出“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圣贤”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学为圣贤”。但是，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萌发的志向，却在后来的人生中逐渐凝练成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责任感



和担当。

“志向”和“想法”是有区别的。只要是“人”，就会有想法，就会有梦想，但不能叫“志向”，不能叫“立志”。只有持之以恒的、作为一生奋斗的动力想法，才能说是“志向”，才能说是“立志”。王阳明的时代，不仅仅是王阳明，无数的有志青年和王阳明一样，想成为“圣人”；在王阳明成为榜样以后的时代，更有无数的青年想成为“王阳明第二”。但是，绝大多数人大抵都停留在“想法”、停留在“梦想”的阶段，毕竟王阳明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阳明的。

那么，少年时代的王阳明的志向，所谓“第一等事”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学为圣贤的？

两年之后，成化二十年（1486年），15岁的王阳明来到北京的北边屏障居庸关，在居庸关的里里外外、远远近近游历了近一个月，深入到汉人家庭、蒙古人住处，考察居庸关内外的山川地理、民族风情。这次出行，有些当代著作说是“一人一骑”，也有说是“一人一仆”，并无任何依据。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说少年王阳明是与父亲一道去居庸关的，大概是依据晚明时期署名为“七乐生”者所著的一本有关王阳明的小说式传记《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但此书明言“从父执游居庸三关”，“父执”并非父亲，而是父亲的朋友。

王阳明后来告诉人们，这段时间他梦见自己拜谒“大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庙，并赋诗一首：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轰雷折，

六字题文尚不磨。（《梦中绝句》）

哪“六字题文”？“大汉伏波将军。”原来，少年王阳明所憧憬、所认为的“第一等事”，他心中的所谓“圣贤”，是班超、马援这样的军事家及其从事的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事业。

为国家建功立业，这才是王阳明从小的志向。所以，王阳明的这一次居庸关内外的游历，被认为是“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阳明年谱》）。

汉唐时期，有志青年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投身军旅，立功疆场；第二，读书做官，造福一方。但是，读书做官怎么也没有投身军旅、效力疆场那样令人激动、那样壮怀激烈。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马援马革裹尸的壮言，曾经让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热血沸腾，也让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充满向往。

但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成化时期，却不是壮怀激烈的汉唐时代：本朝永乐皇帝五次北伐，以及郑和七下西洋、明军巡弋黑龙江流域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就在30多年前，正统皇帝效法曾祖父永乐皇帝，率领浩浩荡荡的50万大军，抵御蒙古瓦剌部。结果，就在居庸关西北100里外的土木堡，全军溃败，皇帝本人成了俘虏。大批溃散的明军从居庸关逃回，蒙古瓦剌部的骑兵也是从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从此，明军对于蒙古，长期居于守势。明朝的长城，当时被称为“边墙”，就是从王阳明出生的成化时期开始修建的。

明朝的制度，更是对血性男儿的压制：军人来自军户、军官



要靠世袭，老子在军中的地位越高，儿子世袭的职务也越高。军人的士气越来越低，军官的素质越来越差，打仗反倒要文官谋划，靠文官指挥。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又定下规矩，文官皆从科举出。所以，班超之类的“投笔从戎”，在王阳明时代，还真是难以实现。

从居庸关回到北京之后，王阳明摩拳擦掌，要上书朝廷，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国家治理、边境防务的建议，遭到父亲王华的严厉斥责。

在父亲王华看来，这个自以为志向远大、一心要学为圣贤的儿子，过于想入非非、好高骛远，而缺乏面对现实、脚踏实地的精神，几乎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必须让他先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读“圣贤”的书，老老实实先把科举作为“第一等事”，只有进入官场，才说得上报效国家、建功立业。

这倒真是王阳明时代的“国情”，也是王阳明的家庭对王阳明的期望。和王阳明同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12岁中举，19岁中进士；后王阳明时代的张居正，13岁已有“神童”之称，被63岁的湖广巡抚、王阳明的好朋友顾璘视为“国士”。

如何才能收回这个整天想入非非的儿子的心？最为便捷、最为传统的办法，是让儿子成家，让媳妇管着他，让儿子生儿育女，建立起对家庭的责任。

四、从“问题少年”到“有志青年”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六月，17岁的王阳明奉父亲之

命，来到江西南昌，与布政司参议诸让之女诸氏成亲。诸让字养和，也是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一年进士，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早两科，此时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大婚之日，诸府上下，喜气洋洋，但当夜幕降临时，人们发现，新郎不见了。岳父诸让命人找遍南昌所有可能的去处，女婿全无踪影。

直到第二天天亮，新郎带着愧色回到岳父家中，说是昨天见众人忙忙碌碌，自己反倒闲着无事，信步来到附近的翠花街，这是南昌当年最为繁华的地方。随后进了一座道观，竟是大名鼎鼎的铁柱万寿宫，为传说中江西福主许逊许真君降蛟锁龙之地。看看也罢，王阳明自称在观中见到一位来自四川的高道，二人谈起了人生，谈起了养生，不知不觉，通宵达旦。

对于这样一个女婿，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岳父诸让比父亲王华更加一筹莫展。

但是，令父亲、岳父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从小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想要建功立业、学为圣贤的儿子、女婿，竟然被江西的一位学者从云端拉回地面。

在南昌住了一年半左右，也在江西各地游历了一年半左右，弘治二年十二月，王阳明和妻子诸氏一道回余姚。途经江西上饶时，王阳明拜谒了比自己大50岁的当地学者娄谅。68岁的娄谅十分高兴地接待了18岁的王阳明。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娄谅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而从娄谅身上，王阳明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老人有着一般学者所缺乏的豪爽之气。

什么叫投缘？这就是投缘。投缘才有共同的话题，投缘才有相互之间的认同。



年轻时的娄谅，也曾经是想入非非，想要学为圣贤的，所以四处拜师、各处求学。但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因为当时的明朝，学校多为官学，官学为科举输送人才，成了科举的附庸，所以娄谅所见所闻，尽是科举应试之学。后来，娄谅往抚州崇仁，拜名儒吴与弼为师。吴与弼为人古怪，一意读书讲学，不应科举。有人前来求学，一概收留；只是慕名拜访，一概不见。见到同样性格的娄谅，吴与弼喜不自禁，说了一句类似老顽童说的话：学者须有性情，老夫聪明，你也聪明！有这样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吗？

吴与弼如此张扬，自然也会得罪人，其中有两位后来还十分著名，一位叫罗伦，一位叫张元祯。罗伦是江西永丰人，王阳明出生前六年、成化二年的状元，因为弹劾大学士李贤，被贬为设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副使。在泉州期间，罗伦宁可靠卖字帮补家中生计，也决不收受贿赂。入仕之前，罗伦慕名前往崇仁，拜谒吴与弼，吴与弼不见。娄谅此时已入吴门，规劝老师：此乃有志之士，名声不小，先生为何不见？吴与弼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我哪里有时间见这些没事找事的后生小子？罗伦也是有脾气的，当然不高兴，于是“移书四方”，称吴与弼为名教中的怪物。张元祯是江西南昌人，5岁能写诗，25岁就中了进士。入仕之前同样慕名去见吴与弼，也被拒之门外。罗伦发难，张元祯应声而起，对吴与弼进行抨击。

以吴与弼的傲气，当然不予理睬，要看看这些“后生小子”有多少气力折腾。但娄谅不能坐视。都是江西人，相距也不远，娄谅向罗伦、张元祯说了一个看似十分简单，却被人们视而不见

的道理：“君子小人，不容并立。使后世以康斋为小人，二兄为君子无疑；倘后世以君子处康斋，不知二兄安顿何地？”（黄宗羲《明儒学案·教谕娄一斋先生谅》）“康斋”为吴与弼之号。娄谅向罗、张二人打招呼，君子小人不并立。如果后人以吴先生为小人，二兄当然是君子；倘若后人视吴先生为君子，二兄将何以自视？道理一点即破，吴与弼虽然性情古怪，但不失为君子。罗伦、张元祯不再吭声了。

从此，吴与弼对娄谅这个学生更加器重，把自己的学术心得倾囊相授，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就是这个娄谅和胡居仁、陈献章。从吴与弼的身上，娄谅感悟到学者收放心性、剔除杂念的功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遇事拿得起，也放得下。回到家乡后，娄谅开始闭门读书、开门授徒。

王阳明和娄谅对得上脾性，所以听得进教诲。有关王阳明拜访娄谅的详情，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娄谅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了王阳明启示。

第一，“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年谱》）。你不是想做圣贤吗？那你得先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读书，不是为“登第”而读书，是“学为圣贤”而读书。圣贤的书不好好读，圣贤的道理不好好领悟，怎么可能“学为圣贤”？娄谅的这番教诲，王阳明后来告诉了弟子，可见其感悟之深。

第二，“学者须亲细务”。从王阳明后来的行为看，娄谅应该和他说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崇仁求学的一天，娄谅被老师吴与弼召去，见面的地方竟然是田间。但见老师赤脚短衣，正在挥锄挖土。娄谅大为震惊，名闻天下的大学者，竟然亲自种地？吴



与弼告诉娄谅：“学者须亲细务。”从此以后，娄谅一改过去不屑琐事的习性，扫地除尘，皆自躬亲，不再依赖童仆。娄谅通过自己的体悟，向立志学为圣贤的王阳明灌输顺应时代、脚踏实地的道理。

所谓“响鼓不用重锤”，关键是要敲在点上。虽然对于“圣人必可学而至”“学者须亲细务”还有一个漫长的体悟过程，但王阳明从江西回到余姚后，如同当日娄谅从崇仁回到上饶一样，尽改过去嬉笑怒骂、好高骛远的习性，开始用心读书，开始认真做事。所以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黄宗羲《明儒学案·教谕娄一斋先生谅》）王阳明的学问，娄谅实为启蒙师。

不管是“圣人必可学而至”，还是“学者须亲细务”，娄谅给王阳明最大的启示，是脚踏实地。只有脚踏实地，才是实现自己的志向，才是“学为圣贤”的正确态度。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必须适应时代的需求。还有一句老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见到娄谅之前，自称要“学为圣贤”的王阳明，其实是浮在空中的一团云，是娄谅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把想入非非的王阳明从云端拉回到地面，使王阳明从一个“问题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志青年”。

两年后，娄谅去世，享年70岁。难道是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安排娄谅在上饶等着王阳明？那么，被娄谅从云端拉回地面、从理想拉回现实的王阳明，将如何一步一步实现自己“学为圣贤”的抱负？

【第二讲】

圣贤须在事上磨



一、与威宁伯的缘分

王阳明回到余姚不久，祖父王伦去世了。根据娄谅的教诲，也是祖父在生时的期望，王阳明开始认真读书。不为科举读书，但读书却有利于科举，科举必由读书而得。虽然王阳明不以科举为第一等事，但在王阳明的时代，不参加科举怎么报效国家、报效社会？即使是娄谅，也是参加过科举的，并且在景泰四年中举。虽然不知娄谅是否和王阳明说过这番道理，但见过娄谅之后的王阳明，从此把“学为圣贤”的志向收藏在胸中，把功夫放在了科举上，这才是脚踏实地。

犹如当下的有志青年，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但读大学仍然是前进的基石。有一条十分搞笑又十分现实的微信，画面上是十多个类似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装束的少年，年龄和当年在居庸关内外考察的王阳明相仿，个个英姿勃发。画面下方有一行面对现实的字：“也想仗剑万里行，作业太多去不成。”

1492年（明弘治五年），21岁的王阳明在浙江的乡试中举，开始有了功名。中举之后，王阳明于弘治六年、九年参加过两次会试，但没有成功。有和他同样命运的朋友感到十分沮丧，但王阳明有不同的看法：“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阳明年谱》）世上之事，哪有处处顺心的？何况，科举之外，该想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岂能对区区下第耿耿于怀？

话虽如此，科举的道路还是必须得走下去。弘治十二年，28岁的王阳明在第三次科举时，终于以会试第二、殿试第十的名次

中了进士，从此进入明朝的官场。一个满腔热血，一心要立边功的青年，最终还是得走时代和家庭安排的道路。

就在王阳明从乡试到会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这几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两件后来证明改变了全球格局的事情。

第一件事：1492年，王阳明中举的那一年，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在“地圆说”理论的推动下，与西班牙王室达成按一定比例获取报酬的契约，怀揣西班牙女王给印度国王、中国皇帝的国书，经过70个昼夜的航行，率领船队抵达了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被欧洲人称为“发现新大陆”。

第二件事：1497年，王阳明中进士的前一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之命，率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经过4个多月、4500多海里的航行，抵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港。这个港口，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并且停泊过。1498年，即王阳明中进士的这年，达·伽马满载而归，回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这两件事情的意义在于，西方已经在东、西两个方向，谋求向东方发展，20年后，更有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人类正在日渐走近。但是，当时明朝的人们，包括王阳明在内，并没有感受到这样一种变化。不仅如此，就在王阳明的少年时代，一代名臣，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为了阻止大明朝出现第二位郑和，销毁了郑和航海图。这可以说是500多年前中国开始在全球竞争中落伍的标志性事件。

王阳明进入仕途之后，被安排在工部观政。所谓观政，就是见习。正是因为工部观政、见习，王阳明和当时的一位传奇人



物续上了缘分。这位传奇人物名叫王越。

王阳明出生的 21 年前，即景泰二年（1451 年），25 岁的王越顺利通过礼部主持的会试，进入科举的最后一轮考试——殿试。殿试的地点在北京皇宫的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内奉天殿（今故宫太和殿），通过了会试的王越和其他准进士们一样，奋笔疾书，希望自己的策论能够得到皇帝的重视。谁也没有想到，突然间一阵旋风席卷而来，把王越的试卷卷起。王越和所有的参试者、监试者，惊奇地目睹试卷被卷上天际，转瞬之间，无影无踪。在人们的啧啧称奇中，监试官重新给了王越试卷，王越当然也毫无悬念地中了进士。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是，就在人们已经将此事淡忘的时候，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年秋天，前来北京朝贡的朝鲜使者，竟然带来了王越那份被卷走的试卷。说是朝鲜国王一天坐于殿中，有一“神物”从天而降，飘落在殿中，值殿官将“神物”呈上，国王一看，竟然是天朝进士的殿试试卷，遂命珍藏，并让朝贡使者带去北京。一份试卷竟然漂洋过海，被风从明朝的京师北京卷到了朝鲜的王京汉城即今首尔，也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神奇故事，王越也正是顶着那阵旋风带给他的神奇光环进入仕途的，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新的神奇故事。

正是这位王越，在明朝军队疲不堪战的大格局下，数次领兵，与盘踞在河套地区被称为“套虏”的蒙古部落抗衡，不但多次击退“套虏”的“入寇”，还多次率军深入，直捣巢穴，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被封为威宁伯，成为那个时代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一

切热血青年的偶像。

王阳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王越建功的时代。王阳明对人说，他曾经做过一梦，梦见王越将指挥奇袭威宁海子时所用的宝剑赠给自己，可见王阳明对王越的崇敬和仰慕。王越去世后的三个月，王阳明中了进士，被安排在工部观政，第一个差事，竟然就是给刚刚去世的威宁伯王越修墓，是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无论如何，当不负威宁伯。

尽管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有经略四方之志”，但当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居庸关内外所谓考察，却被视为年轻人的胡闹。但是，不管旁人怎么看，为了有机会报效国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经千方百计寻求兵书、钻研阵法，家中每次宴客，则将杯盘碗盏、橘皮果核排成阵势，又勤于练习骑射。理解的人认为此子胸怀大志，不理解的便视他为痴狂疯癫。但王阳明全不介意。

督造威宁伯墓，正是对自己的历练。王越之家，在今河南浚县，王阳明一路不用肩舆，乘马而行。一次马惊，王阳明从马背上坠落负伤，但仍然拒绝乘轿，翻身上马，继续前行。什么原因？仍然是当初的抱负、志向在激励，要建功立业，怎能不骑马？

来到浚县，王阳明将民夫按人数及身体状况编成什伍，分配劳役，起居饮食都有定时，工程质量皆经检收。工余之时，指挥民夫演练据说是由诸葛亮传下的八阵图。待到工期结束，不仅坟墓造得雄伟气派，王阳明自己也得到了一次实践锻炼。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只有立志，机会到来之时，才能够把握得住。

但是，由于有关王阳明一生的“神奇”故事甚多，而王阳明



的弟子们又精心为老师编造神话，所以对于《阳明年谱》中记载的王阳明以“八阵图”演练民工一事，我其实一直心存疑虑：王越的这座墓到底有多大的规模，用了多少民工，多少工种？

王阳明返回北京时，王越家属前来送行，并且带来了不少礼物作为酬谢，王阳明执意不收。家属们又取出一个布囊，交给王阳明。王阳明打开布囊，一柄佩剑赫然映入眼中，是王越生前的佩剑，是威宁剑！果然是天意！否则，怎会如此和梦中巧合？从此以后，王阳明更加相信，上天是要他担当大任的。只是不知何故，在王阳明自己的诗文中，从来没有提及此剑。

二、不懂事的刑部主事

一年的工部观政结束了，王阳明实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自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之后，六部为明朝中央最高一级行政机关，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都御史并称“七卿”，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均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有清吏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分管该部事务。吏、礼、兵、工四部均为四个清吏司，户部和刑部因事务繁重，与地方十三布政司即十三省对应，各设十三清吏司，同时带管南北两直隶事务。

刑部主管全国的司法行政，是当时最能了解民情的部门之一。刑部有大牢，又有“提牢厅”，设狱吏若干名，专管刑部大牢事务。关在刑部大牢的全是重囚，来自全国各地，或是已定死罪，等着秋后执行；或是虽定死罪，但犯者不服，提出上诉，等待再审。刑部各司主事每月一轮“提牢”，督理牢务。王阳明到刑部后

不久，轮着云南司提牢。

一天傍晚，王阳明带人巡牢，囚徒正用晚餐。王阳明逐牢查看，突然停下脚步，向牢房细看，但见囚徒的碗中，半稠半稀，黄中带黑，竟不知是何物。回头问狱吏，说是狱中缺粮，只能以米糠为食。王阳明点点头，继续前行，忽听得远处有猪叫之声，心中一动，循声而去。却见偌大的猪圈，若干头肥猪正在进食，食槽中尽是细粮白面。一切都明白了：早就听说狱吏将朝廷给囚犯的口粮用来养猪，猪养大了，众人共分，并孝敬相关官员。初闻此事，并不相信，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回到提牢厅大堂，王阳明召集全狱狱吏训话：朝廷有好生之德，即便囚徒，也拨给米粮布被，使其不致挨饿受冻。囚犯也是人，尔等却待其不如猪犬，夺食以喂猪，率兽以吃人，为朝廷招怨，尔等是猪犬不如！说罢，喝令用刑。狱吏们一面跪下求饶，一面七嘴八舌诉说，此事早已相沿成习，刑部堂上官也是知道的。

何为“堂上官”？各部的尚书、侍郎，以及清吏司的郎中、员外郎，皆为“堂上官”。正如狱吏所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只是王阳明刚到刑部，少见多怪而已。但不管怎样相沿成习、司空见惯，却是违犯了国家的条令，不能放到桌面上。王阳明命将狱中所养之猪统统宰杀，给囚徒食用，又通告全狱，若再发生这类事情，严惩不贷。

随后，王阳明向狱吏索取以往提牢主事名单，却是百不存一。大牢管理混乱，当然与此相关。说是提牢，又有几人真会到狱中走走，和囚徒见见？王阳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狱吏取来笔砚，提笔在提牢厅墙壁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及提牢的时间。经刑



部主管官员认可，以后凡当值的提牢主事，都要在壁上题上自己的姓名和提牢的时间，一旦狱中发生问题，提牢者无法推卸责任。

王阳明晚年，有位刑部官员当面向他提起此事，说是刑部一直传诵。王阳明听了却连连皱眉：往事休提，那是年轻时干的荒唐事，当时只顾自己痛快，全然没有替堂上官着想。自己做君子，让别人做小人，实在不应该。一番话，说得那位刑部官目瞪口呆。但是，既然是相沿成习，主管官员也就见怪不怪，而官场陋习正由此而成。所以，革除积弊，正需要王阳明的这种“不懂事”，但当时明代的官场，恰恰是“懂事”的太多。

第二年，王阳明奉命往江北录囚。录囚也是刑部例行公事，刑部主事每年要会同都察院的巡按监察御史前往带管的布政司或中央各部门清理案件、平反冤狱。这是明代司法的重要环节，旨在发现并清理各地司法过程中发生的弊病，给蒙受冤屈的人一些平反的希望，给企图逃脱制裁的真犯造成一定震慑。现在的扬州、淮安、合肥、凤阳一带，即当年南直隶的江北地区，录囚由云南司负责。

王阳明来江北遇到的第一桩奇怪的案子，是陈指挥杀人案。这位陈姓指挥脾气暴躁，生性好斗，动辄杀伤人命，下狱之前，被他无辜杀害的有18人。受害者家属年年告状，但因陈指挥一家三代服役，父亲死于疆场，儿子因贻误军机被杀，颇得人们同情。所以，虽然被定了死罪，但陈指挥却在狱中关了十多年，迟迟没被执刑，也没有被释放。这就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有关官员将陈家当成了“小金库”，只要陈指挥在狱一天，就可以不断从这个“小金库”提取钱财。

王阳明看完案卷，下令立即将陈指挥处决。一同录囚的巡按御史仍然以陈指挥父亲殉国为由阻挠，陈指挥的家属也托人求情。但是，录囚之事由刑部主事主持，王阳明一坚持，御史和其他官员也没有办法，除非向朝廷报告，由刑部对王阳明进行干预。但这种事情一旦让朝廷知道，不但救不了陈指挥，说情的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临刑之时，陈指挥冲着监斩的王阳明大声呼叫：王守仁，我死而有知，定饶不过你！声音嘶哑而凶狠，在场官员和百姓，以至行刑的刽子手，都感到一阵寒颤。王阳明反倒迎上前去，盯着陈指挥，一字一句说道：我如不杀你，18 人的冤魂就放不过我。为了这 18 条人命，我定要杀你。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言罢，喝令用刑。

有人暗暗纳闷：他人办不了、不敢办的事情，为何这位王主事不仅敢办，而且还办得了？人们由此想起他的父亲王华。这位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此时正官运亨通。王阳明在刑部办案没有遇上大的阻力，或许与他父亲的职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他自己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信念。无论什么时代，正义总是令邪恶畏惧。王阳明去世 30 年后，浙江淳安知县海瑞无任何政治背景，一纸大义凛然的公文，同样使八面威风的巡抚都御史鄢懋卿绕淳安县而过。



三、为圣为文两彷徨

王阳明于公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无论何事，都争取尽善尽美，这本来已经在践行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追求和志向，已经在“学为圣贤”的路上行进，“圣贤须在事上磨”。但王阳明却感觉和“圣人之道”渐行渐远了。原来，此时的王阳明和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把这些事情视为“庶务”。“庶务”的处理，都是在问题发生之后；将问题消弭于发生之前，那才是“圣人”之所为。有这种想法也不能全怪王阳明和他的同时代人，孔子的一句话实为始作俑者：“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第十三》）圣人所做的，不是“听讼”，而是“无讼”。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王阳明中举之后，去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也陪伴在京中任职的父亲。明朝科举，科考、乡试、会试，考的都是经义，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主要依据。王阳明想借此机会钻研宋儒，特别是朱子“格物致知”即体验事物的功夫，“学为圣贤”。于是将朱子的著作找来，认真阅读。不读还罢，越读越感到困惑。掩卷静思，竟一无所获。想来想去，突然开窍，既然是格物，那就应该去物中寻求。朱子说得好，凡事都有其表里精髓，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正好父亲官署之中种了不少竹子，王阳明来到院中竹林，微风阵阵，翠竹摇曳，顿感心中空灵，果然万物皆具灵气。但是，一用朱子的格物之论，沉思竹子之理，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格得久了，想得久了，王阳明竟头晕目眩，大病一场，第二年会试也落了榜。



王阳明格竹图



经过这次打击，王阳明对自己能否做得成“圣贤”开始有些怀疑。做圣贤大概要有缘分，不是人人都可做得。自己或受缘分所限，故想不通格物之理。做不了圣贤就不做吧，世上毕竟凡夫俗子更多。

一旦打消了做圣贤的念头，王阳明觉得轻松了许多。他的悟性本来就高，又有作文赋诗的天分，遂沉溺于词赋之中，与列名于“前七子”的同时代文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以及顾璘、乔宇等人为友，相互唱和。但不久，又觉得心里空虚，总不能以弄诗作文了此一生吧？原来，在内心深处，王阳明仍然“不忘初心”，仍然放不下“学为圣贤”的抱负。

有个不为人们关注的细节，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取舍。尽管有一段时间王阳明热衷于诗文，但他的交游圈中，有“前七子”，以及同时名列“前七子”和“南四子”的徐祯卿，却无“南四子”的另外三位。从表面上看，或许是因为王阳明看不上另外三位：唐伯虎被革除功名；祝允明七次会试下第；文徵明更甚，连考七届，连举人也考不上。“南四子”中只有徐祯卿中了弘治十八年的进士，并跻身“前七子”。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王阳明的眼中，唐伯虎等人只是一些胸无大志的文人，他不屑与其交往。当然，唐伯虎等人也理所当然地视王阳明等人为“道学”，不屑与交。

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故事。王阳明去世后9年，嘉靖十六年，13岁的张居正来到武昌，参加这一年的湖广乡试。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听人介绍过这位“神童”如何了得，半信半疑。等到读了张居正的文章，不仅击节叫好，连称“国士”。一见面，一交谈，

张居正从容不迫的举止，少年老成的见解，更令顾璘惊叹。63岁的顾璘反反复复地打量这位比自己小了半百的张居正，连称“小友”，解下自己的佩带，一面给张居正系上，一面连声鼓励：孺子善自珍重，日后前途无量，我这条带子，原本是配不上你的啊！但是，顾璘不赞成张居正过早出名，不希望张居正成为唐伯虎那样的风流才子，而应该成为国家栋梁（张居正《与南掌院赵麟阳》）。这位顾璘，正是王阳明的好朋友。王阳明在生时与顾璘关于“知行合一”的讨论，堪称经典。



顾璘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唐伯虎的老乡桑悦，生性狂妄，以举人为江西泰和县学训导，闻娄谅之名，前往上饶找碴儿。当时娄谅家正盖楼房，桑悦挑衅道，先生以孔门弟子自居，当年颜渊家的屋子有这么气派吗？娄谅虽然不悦，仍然以礼待客。桑悦又求其平日著作，扫了几眼，还给娄谅，继续挑衅：久闻先生大名，今见文章，全无章法，大失所望。娄谅不高兴了，说哪篇文章没有章法，请指教。桑悦有备而来，抵掌嘲弄：

先生过矣。诗文不佳，道学问之功已欠，吾犹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闻人毁己而怒，血气勃然，则所谓尊德性者又安在？（都穆《都公谈纂》）

说罢，扬长而去。

这两个故事的发生看似偶然，却反映出明朝，特别是王阳明时代的一个有趣现象。王阳明、顾璘等人重事功、重气节，更重“学为圣贤”，唐伯虎、桑悦等人则放浪形骸，嘲弄“圣贤”；娄谅等人开始尊崇陆九渊，讲究“尊德性”，桑悦等人则对“道问学”的朱熹、“尊德性”的陆九渊，一概嘲弄。

王阳明经过一段沉溺于“辞章”的时间，又回归到“正学”，偶然读到朱熹的《上光宗皇帝疏》，疏中有这样的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王阳明心中一亮，原来如此！以往觉得为圣无门，大概是因为探讨虽博却没有循序渐进，如今门径找到了，于是他放下辞章诗赋，又钻研起了朱子的格物致知学问。但不久，又迷惑了，虽然自我感觉在循序渐进地读书，

但事物的“理”和自己的“心”，总是沟通不了，“物理”归物理，“我心”归我心，判若两途。心中着急，毫无头绪。每当此时，王阳明便觉得自己是“天下之至拙”之人，是天底下第一傻瓜。由于心中烦躁，接着又是一场大病。于是又感觉圣贤自有天命，不是人人做得，回过头来，仍旧舞弄辞章。

其实，王阳明虽然自以为理解朱熹所说“读书之法”，却并没有真正领悟朱熹所说“读书之本”；看上去是在“循序渐进”，却并没有真正“居敬持志”。他那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汲汲于建功立业、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追求，决定了他不可能持之以恒地走朱熹及其弟子们所走过的道路。他的志向，不是做学问家，而是做政治家；他的性情并不适合做朱熹那样的“作者”，而是要做孔子那样的“述者”，要做马援、诸葛亮那样的“行者”。

王阳明去世后，湛若水为其作墓志铭，说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而所有的这些“习”，都和两件事情相关。第一件事是“学为圣贤”。由于王阳明从小立志要学为圣贤，要报效国家，所以要练习骑射，“任侠之习”和“骑射之习”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无法从朱熹等宋儒学说中求得“圣贤”之道时，遂转而向佛道中寻求，于是有“神仙之习”“佛氏之习”，于是“以为圣人之学在此”（《朱子晚年定论·序》）。话虽如此，应该还和第二件事情相关。王阳明从小体弱多病，通过练习骑射，可以强身健体；热衷于佛道，可以修习导引术。大婚之夜去铁柱万寿宫和道士所谈、所习的，也是养生之法、导引之术。不仅如此，王阳明甚至一度对神仙生活十分向



往，打算进山为道。这就不是只用“学为圣贤”可以解释的了，而是和养生有关。

王阳明科举落第的一段时间，一位名叫尹继先的道士在南京活动，自称是陕西临洮（今甘肃临洮）人，生于南宋高宗时期，300多岁了，却颜如孩童，到处替人排忧解难。王阳明久闻其名，便去拜谒，并且同住了一段时间，向尹继先学习养生术。但是，尹继先不但不收王阳明为徒，而且告诫：公子聪明绝顶，但出身贵胄，筋骨脆弱，没有长生的缘分，当以功业显于当世（陆粲《庚巳编》）。虽然听后怅然，但王阳明对于神仙术并没有放弃。

录囚江北事竣之后，王阳明专程去了一趟九华山，寻访一位名号为“蔡蓬头”的道士。但蔡蓬头和尹继先一样，不赞成王阳明沉溺其中，说长寿养生之道、立地成仙之术，都是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之人所习，相公胸怀大志，欲济众生，当力求为圣之道，而不应该汲汲于神仙小道。说罢，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王阳明心有不甘，打听到九华山的地藏洞有位异人，道术高深，千方百计求见。但这位所谓“异人”却对王阳明大谈“圣人之道”，王阳明十分诧异，便以宋儒的“格物致知”之说请教。“异人”对程颐、朱熹不置一辞，当论及周敦颐、程颢时，则大加赞扬：“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阳明年谱》）

四、“阳明洞”中“阳明子”

几个有关王阳明与神仙术的故事，同样看似偶然，其实反映了王阳明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的“初心”在主导。从修身养性

来说，佛道比儒学似乎更加快捷，但将其与孔子的教导、“圣贤”的行为进行考量，又大相径庭。佛、道讲究的是“出世”，而要“学为圣贤”，要报效国家和社会，恰恰需要“入世”。这就不难理解，仍然是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功名之心在左右王阳明。所以，无论是南京的尹继先、九华山的蔡蓬头，还是地藏洞的“异人”，无一不劝其“入世”而非“出世”。



王阳明余姚故居

从九华山下来，王阳明回京师复命，递交了入仕之后的第一份告假书。理由是身体一向有病，江北录囚，劳累过度，致使旧病复发。特别是自己和父亲都在京师任职，祖母岑氏年逾八十，住在老家余姚。所以，王阳明请求回余姚老家，一面养病，一面在祖母身边尽孝。历代统治者都提倡孝道，家有孝子，国才有忠



臣。王阳明既然提出养病、侍亲，告假书不久就批了下来。

王阳明告别父亲，回到余姚。祖母虽然已是84岁高龄，但仍然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见到孙子回家，更是精神焕发。老人乐观通达的生活态度，给体弱多病的孙子以极大的鼓励。

在余姚郊外四明山麓，有一僻静去处，风景秀丽，人迹罕至。尤令王阳明惊异的是，向阳山坡有一石洞，深邃幽静，极似在九华山见到的地藏洞。“学者须亲细务”，王阳明和仆人一道，将石洞收拾一番，搬来书籍铺盖，一主一仆当晚就要在此住下。

收拾停当，王阳明站在洞口，远眺群山，翠绿浓郁，山风徐徐，直沁心脾。几缕夕阳斜入洞中，将石洞映得通明，宛如仙境。王阳明心中喜悦，既然是阳光将洞照得通明，而洞又在四阳山之阳，遂将此洞命名为“阳明洞”。除本名外，王阳明只有表字“伯安”，尚未取号。当年苏轼躬耕于黄州东坡，遂以“东坡”为号，如今王阳明得了阳明洞，即以“阳明”为号，自称“阳明子”。但是，王阳明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阳明”之号一出，遂成千古。

在阳明洞中住下之后，王阳明开始精研佛道秘籍经典，又自练导引术，希望通过养心，达到养生、祛病的目的。与李白、苏轼、朱熹等人或中年或晚年开始练习养生术不同，王阳明自幼身体多病，所以从年轻时起就接触养生术，故有较多心得。在阳明洞静修了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的病情有了好转。回想起来，北京街头遇上的相士，南昌铁柱宫中的道士，从来没有引他学佛入道之意，一位让他做圣人，一位教他学养生，前者为立志，后者为健身。尹继先、蔡蓬头及地藏洞的“异人”，虽然都是化外之人，却也都劝自己济世为民。人未误我，我自误耳！若因一念之

差，隐入深山，为僧为道，将置祖母、父亲于何地，又将置国家、万民于何地？

第二年，从佛道之中解脱出来的王阳明，离开了阳明洞，往杭州西湖散心。阳明洞与世隔绝，西湖却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去处。如果说王阳明住进阳明洞尚有些许“出世”的向往，来到杭州西湖，则是决心重新“入世”了。流连于南屏山、虎跑泉，信步于苏公堤、白公堤，对人生的热爱完全压倒对人生的厌恶，对世事的参与完全压倒对世事的逃避。王阳明那颗圣人可学而得、慷慨有志于天下的“初心”又重新燃烧起来，再也没有有什么力量可以将其压制下去了。

一天游灵隐寺，听说有位僧人已坐关三年，不语不视。若是一年前，王阳明应该肃然起敬，但此时却甚觉可笑。他想起了85岁高龄却仍然对自己关心备至的祖母，想起了年近六十却每天为自己熄灯灭火的父亲，于是走进禅房，对着闭目垂首的和尚喝问：

你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和尚大惊，当即睁开双眼。

王阳明问道：你在此出家，家中可有亲人？

和尚回答：有老母在。

王阳明又问：可曾想念老母？

和尚又答：不能不想。

王阳明听罢，不禁感慨：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即便草木蝼蚁，在佛祖眼中，也都是一命。既是一命，便皆有情。佛说“四大皆空”，但人在世上，又哪里真能皆空？继续问道：你在此不视不语，倒也自在。你母亲每日想儿念儿，可也自在？



再看和尚，早已是泪流满面。

第二天，王阳明再来灵隐寺。寺中住持说，那和尚昨晚已经离寺，恐怕此刻已和家人团聚了。王阳明听罢，若有所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江湖不可久居，该入庙堂了。

【第三讲】

龙场悟道，「道」在心中



一、相见恨晚

弘治十七年（1504年），33岁的王阳明以新的面貌回到北京，受聘为山东乡试的主考，从所出的策试题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佛道的羁绊，认真思考如何经世治用了：“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等等，全与当时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但是，说“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看似批评“老佛”，却在鼓动学生对程朱进行批评，或者说，批评佛老是虚，向程朱发难才是实，王阳明自己的思想指向，也开始由朦胧逐渐清晰。

从山东回到北京，王阳明已经由刑部主事调任兵部主事。经过这些年官场的历练，经过出入佛老及在阳明洞中的思考，王阳明希望在职务之余，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也希望能够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探索“圣人之道”。而要做到这一步，最为快捷的方式，莫过于讲学，莫过于论辩。和娄谅同为吴与弼门下、若干年后又和王阳明一道从祀孔庙的江西余干学者胡居仁，对于为学的方式做了这样的陈述：

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黄宗羲《明儒学案·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

读书、讲论、思虑、行事，都是“穷理”的方法，也都是学为圣贤的路径。人们往往认为，讲论是佛学，特别是禅宗的讲学方式，但在王阳明时代的两千年前，孔孟已开讲论之先河。

讲论的前提是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明朝的前50年，政治气氛严峻，聚众讲学被禁止。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私人讲学之风开始兴起。早在王阳明出生之前，已经有吴与弼讲学于江西崇仁，娄谅讲学于江西上饶，章懋讲学于浙江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均闻名天下，从学者甚多。王阳明在弘治二年由江西完婚返余姚时，就在上饶拜谒过正在讲学的娄谅。

但是，无论是吴与弼、娄谅，还是陈献章、章懋，都是在家乡讲学，讲学时的身份，或者是“布衣”，或者是“赋闲”；讲学的内容，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对官方倡导的程朱学说有所修正，但尚未公开提出批评。王阳明的首次讲学发生在主考山东乡试回北京之后，其身份是兵部主事，地点在北京的大兴隆寺，讲学的内容则和当时推崇的朱子说有所异同，所以立时引起各种非议，“立异好名”的责难随之而起。王阳明我行我素，不以为意。令他振奋的是，就在他开始讲学之后不久，知音出现了。知音是谁？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人，20岁的时候，在广东乡试中举，那是正统十二年、王阳明出生前25年的事情。但是，第一次会试落第之后，陈献章便往江西崇仁，拜吴与弼为师，从此便和老师一样，绝意仕途，不问科举，一意授徒讲学，名满天下，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有“大儒”之称。

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为陈献章高足。陈献章死前宣布，湛



湛若水

若水是自己学说的继承人，这个身份就不一般了。

湛若水本来也无心科举，只因母命难违，勉强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当年就在人才济济的应天乡试中一鸣惊人，第二年即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湛若水是陈献章的门人，王阳明曾经问学于娄谅，娄谅、陈献章都是吴与弼的弟子，从这层关系来说，王阳明和湛若水之间的学问，倒是有一些渊源。

湛若水比王阳明大6岁，但中进士晚了6年。湛若水到北京参加会试时，王阳明正开始讲学。会试一结束，湛若水便去拜访王阳明。二人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交谈，都觉相见恨晚。王阳明一心一意要寻找“同志”而不得其人，没想到天上掉下一个湛若水，大为惊讶，连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也是欣喜异常，逢人便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当然，这个出于湛若水的回忆，在表述上并不准确，当时的王阳明才34岁，并没有“从宦三十年”，湛若水是把王阳明从28岁中进士到57岁去世整个的宦海生涯算了进去，或者是就王阳明当时的年龄而言。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事实，即王阳明、湛若水从此相互唱和，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并且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

二、庙堂不是讲理处

从王阳明出生到其少年时代，明朝在位的皇帝叫朱见深，即宪宗成化皇帝，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只上朝但不和大臣讨论国家事务的皇帝，从此“帘高堂远、君门万里”（赵翼《廿二史札记》）。以内阁大学士为首的外廷文官与皇帝沟通的渠道是内廷的司礼监宦官，从而真正开启了明朝皇帝“垂拱而治”、内阁和司礼监“对柄机要”的统治模式，明朝开始进入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整个社会逐渐处于“自由”乃至“放任”的状态。

王阳明步入青年时代的时候，成化皇帝去世，其子朱祐樞继位，这是孝宗弘治皇帝。弘治皇帝的好处是对文官们有更多的尊重，也偶尔接见大臣，并且在他们的建议下，革除前朝的一些积弊，上上下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被称为“弘治中兴”。

但是，就在这明朝人所称的“君臣契合”之时，弘治皇帝去世，儿子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这位明朝历史上的武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也最“好玩”的皇帝之一。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时15岁，正处青春叛逆期，而且热衷戏曲、酷爱武术，尤其喜欢在宦官的陪同下外出嬉戏。文官们已经习惯了“听话”的弘治皇帝，两相比较，眼下这位正德皇帝完全就是“异类”。大学士们奈何不了皇帝，便对带着皇帝、陪同皇帝、诱导皇帝游玩的八位宦官进行猛烈抨击，称之为“八虎”，特别集中火力抨击“八虎”之首的刘瑾。不仅北京，南京的文官也行动起来，南北两京遥相呼应，掀起了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其实是争夺皇帝



的斗争。

内廷司礼监的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也看不惯刘瑾等“八虎”的所作所为。何况，“八虎”的崛起正在打破内廷宦官的权力平衡。刘瑾一个钟鼓寺太监，竟然挑战王岳等人司礼监的权威。所以，司礼监宦官王岳等人支持外廷文官对刘瑾等人的攻击，努力说服皇帝制裁“八虎”。在内廷、外廷的双重压力下，正德皇帝一度打算缓和局势，把刘瑾等“八虎”外放到南京，形势看似一片大好。面对大好形势，文官们有些狂热，他们希望取得彻底的胜利，必欲置刘瑾等人于死地。

在中国历史上，此类斗争大抵以文官的失败而告终。你连皇帝的面都难得一见，怎么可能让他相信身边这些既听话又懂得侍候人的宦官尽是坏人，而且还要下狠手统统将其处死？这一次虽然有司礼监宦官的支持，却也不例外。所谓“物极必反”“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既是奴才又是朋友的“八虎”的苦苦哀求，正德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包括内阁首辅刘健、户部尚书韩文在内的一批态度最为激烈的文官被勒令致仕。皇帝甚至说了一句令大学士们难以应答的话：“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明史·刘健传》）

北京的形势急转直下，南京的言官更为激愤。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请求皇帝收回让刘健等人致仕的成命，要求严惩“八虎”。在刘瑾等“八虎”的唆使下，正德皇帝命锦衣卫校尉前往南京，将戴铣等人拿解北京，实施廷杖。

王阳明以“学为圣贤”自励，以天下为己任，在这场被士大

夫认为的大是大非的斗争面前，自然不能漠然处之。但王阳明是兵部主事，这是办事的官而不是说话的官，不能像御史、给事中等言官那样发表激烈言论，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了声音。拿解戴铣等人的诏旨一下，王阳明即上疏营救，《王阳明全集》中收录了这篇奏疏，标题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但全文不涉及戴铣等人奏疏的内容，更不涉及皇帝的胡闹与宦官的折腾，甚至连“宦官”及“权奸”的字眼也没有，只是讨论言官的职责及对其处罚的不合理，讨论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恪守。显然，疏名“去权奸”三字，是弟子们为王阳明編集子时加上去的。

这是王阳明的斗争策略，奏疏无可挑剔，不给对手空子钻。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刘瑾及其同伙对一切反对力量均予打击，以期摧毁士大夫的斗志。所以，上疏抨击“八虎”的戴铣等人尚未拿解至京，上疏营救戴铣的王阳明便被锦衣卫校尉捕入诏狱拷讯。王阳明明白了，原来庙堂并不是讲理的地方。

明朝的诏狱就是锦衣卫狱，和刑部大狱不同，关押的全是由皇帝定罪或等候皇帝定罪的“钦犯”。王阳明在锦衣卫狱中度过了正德元年年底，也就是1506至1507年之交北京最为寒冷的日子。一个月后，王阳明被押至午门外，廷杖四十，革除兵部主事的职务，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正德二年（1507年）春末，王阳明杖创初愈，离开京师北京，好友湛若水和崔铣、汪俊等人不避嫌疑，前往送行，作诗相赠。湛若水连作九诗，表现出不一样的感情，其一说：

皇天常无私，日月常盈亏。圣人常无为，万物常往来。



何名为无为，自然无安排。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

“皇天常无私，日月常盈亏”，是王阳明时常说的话；而“勿忘”“勿助”，则是孟子宣扬的功夫，后来成了王阳明教导学生的基本法则。

王阳明沿运河南下。消息传来，朝廷公布了 53 名“奸党”的名单，榜示天下。

名列 53 名“奸党”之首的，是被勒令致仕的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户部尚书韩文、工部尚书掌大理寺杨守随，左都御史张敷华，南京兵部尚书林瀚，都是正二品以上大员。

然后是户部郎中李梦阳。李梦阳比王阳明小一岁，也是王阳明的好朋友，不仅以诗文名列明朝弘治、正德年间文学群体“前七子”之首，而且以气节著称。李梦阳曾经因为抨击孝宗皇后的兄弟张鹤龄下狱 3 个月，出狱后正遇张鹤龄，一鞭挥去，正中其面门，击落了张鹤龄两颗门牙。这一次外廷文官集体抨击刘瑾等“八虎”的奏疏，文稿就出于李梦阳之手。

在李梦阳之后位列第八的是兵部主事王守仁（王阳明），然后是另外三位主事、一位翰林院检讨，以及 16 名六科给事中、25 名十三道监察御史。

与这 53 名文官同时榜示天下的，还有在与“八虎”斗争中失败的三位司礼监太监——王岳、范亨、徐智。

可见，这场斗争的壁垒并不那么鲜明，和外廷文官站在一起的，有内廷宦官中最有权势的司礼监太监；和刘瑾等人站在一起的，也有外廷文官中的重要人物，如吏部尚书焦芳等。这也是中

国古代文官和宦官斗争的普遍现象，宦官之中有同情文官者，文官之中也有依附宦官者。

就在此榜文发布之后不久，王阳明失踪了，而且一失踪就是大半年。那么，这大半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王阳明后来告诉人们，说他到杭州的时候，发现了刘瑾派来的刺客，于是假装落水，攀附在商船之尾逃脱。后来遇到风暴，商船漂泊到了舟山，再漂到福州鼓山，王阳明弃舟登陆，狂奔数十里，在荒山破庙中睡了一个晚上，甚至听到虎吼之声，等等。然后翻越武夷山到江西，再由江西至南京，看望正在南京任职的父亲，等等。

王阳明讲述的这段经历，被弟子黄绾写进了王阳明的行状，又被弟子钱德洪等人写进了王阳明的年谱，也为当今的许多王阳明研究者、爱好者津津乐道，其实是真实与虚构混杂，成为王阳明及其弟子编造的“阳明神话”的一部分。

这一神话的“由头”，是所谓刘瑾派出的刺客。但这个刺客，如果不是王阳明自己的臆测，便是为半年中的“下落不明”制造的借口。“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在这场“斗争”中态度比王阳明激烈得多，没听说过刘瑾派了刺客对付；刘健、谢迁等其他 50 余人，也没有任何人发现刘瑾派出的刺客。

朋友加同志的湛若水，对于王阳明的个性有比常人更多的了解，当有人告知王阳明的那段“神话”，湛若水立即做出判断：“此佯狂避世也！”后来二人在滁州见面，王阳明告以那段时间的真情，湛若水不禁一笑：“彼夸虚执有以为神奇者，乌足以知公哉！”（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那些把王阳明为“佯狂避世”而编造的假信息视为真神话的，怎么可能读得懂王阳明呢？



虽然刺客云云并非实情，但如湛若水所说，这段“神话”也表现出王阳明行事的个性：想人之不敢想，做人之不敢做。而王阳明“下落不明”的这大半年，可以确定的只是：去南京见过当时为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王华，但很快王华也因为得罪刘瑾而被勒令致仕。

其实，这大半年王阳明就在余姚家中，陪伴年近九十的祖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决定赴龙场贬所。

三、在底层体悟底层

贵州是明朝十三个布政司中设置最晚的一个，在西南川、黔、滇、桂四省中，也是开发较晚的一个。龙场驿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以北约八十里的修文县，是从贵阳（当时称为“程番”）北上的第一个驿站，规模应该不小，按规定设有驿丞一员，书吏一员，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以及驿卒若干名。到弘治、正德年间，驿站败落，马匹亡毙，房屋倒塌，驿卒多已亡故、逃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贵州与内地关系的疏远，而是因为交通路线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贵阳往内地，更多是向东北取道湖广而不是向北取道四川。

正德三年（1508年）春末，王阳明在离开北京之后的一年，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龙场，面对“龙场驿”字样的碑石，默然不语，得在这里度过漫长的时日。

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在为王阳明担心，担心以他的身体状况，未必能够到得了龙场；担心他即使到了龙场，也未必能够经受得



贵州修文县

住那里的气候、那里的艰辛，未必能够活着回来。但是，情况恰恰相反，王阳明最终却脱胎换骨般地从贵州回归中原，这倒有意思了。

王阳明可以说是在一生之中最合适的时候来到龙场的。第一，对于从小体弱多病的王阳明，37岁前后是其一生中生命力最为坚韧的时期；第二，生活的阅历、官场的遭际、学术的积累、“学为圣贤”的追求，对于王阳明来说，都到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认真整理的时期。

王阳明和仆人一道，栖茅屋、居洞穴，度过了初到龙场最艰难的时期。令王阳明振奋的是，在龙场驿南边大约两里处的东山坡上，竟然发现了一处与家乡的阳明洞极为相似的石洞，王阳明称其为“阳明小洞天”。主仆数人搬进“阳明小洞天”，以石为床，以石为凳，以石为灶，以石为案，相顾而笑，倒也其乐融融。洞



中还有一块凹形石块，王阳明告诉仆人，如果身有不测，此石即为自己的“石棺”。

王阳明生而为祖父母钟爱，长而因父亲的地位、自己的才华受人尊重，虽然在录囚江北时对社会有了一些真实的了解，虽然因为上书言事受廷杖、下诏狱、赴龙场，但所见所闻主要是在士大夫的圈子，读书人的圈子。到龙场之后，他见到的是其时中国经济最落后地区的民风民俗，听到的是中原流亡者对当日社会最黑暗现实的揭露，这才是以最底层的身份，真正接触到最底层的社会。直到这时，王阳明的肉体，才真正经受了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磨炼；王阳明的灵魂，才真正经受了有生以来最为剧烈的震撼；对人生、对社会，王阳明才开始了有生以来最本质的认识。也正是在此时，王阳明才真正体会到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义。

在此期间，王阳明有一篇名为《答人问神仙》的短文，陈述对当时盛行、自己曾一度沉溺其中的神仙术的认识，并对“长生”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所谓“长生”，并非是指肉体的长存，实是精神的长存，是“道”的永生。孔子死了，其肉体早已化作尘烟，但儒学却昌盛充沛地发展，孔子不是永生吗？颜子 31 岁就死了，但“朝闻道，夕死可矣”，比起那些百年的行尸、千年的走肉，以及当代许许多多徒具人皮而包藏祸心的人，颜子不是永存吗？

如果说王阳明到龙场后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和飞跃，这篇短文可说是一个起点。一个人，如果看透了生与死，如果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放不下吗？用一句流行语：“当人遇上生

死，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有了这种认识，王阳明更可将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以前是汲汲以求地想做圣人、学做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故而多方体验，上下求索；读先圣的书，读宋儒的书；习佛老以养性，习神仙以养生；学骑射兵法，忧国计民生。但为圣之路竟不知在何方，报国之门竟不知在何处。如今独居恶山险水、毒气烟瘴之地，圣贤佛老无从而求，民生国计无从而问，一切抱负化为泡影，生命也随时可能终结，此心反倒清净洞明。这种改变，倒像当年老子给孔子的建议：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把你的骄气，把你的傲气，把你的所谓抱负，统统收藏起来，顺其自然，顺时而为，道法自然，才是大道。

四、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明朝的官场和社会逐渐形成一股风气，凡有人因为批评皇帝、批评宦官、批评大学士受了廷杖，因为伸张正义受了惩罚，都受到舆论的赞扬。所以，越是挨了板子，越是受了惩罚，就越是荣耀。等到人们知道王阳明是因为与“八虎”斗争而遭到贬谪，龙场一带的各族首领及民众都把他视为英



雄。他们在龙场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破土动工，盖起了一处颇具规模的庭院，有居室、客厅、凉亭，气势宏伟。远近学子渐渐知道王阳明贬谪至此，听得新居构成，纷纷前来道贺。

因新居建在龙场山冈之上，王阳明将其命名为“龙冈书院”，这将是自己日后生活及钻研“圣学”之所在。龙冈书院内，居室四壁徒立，却干净舒适，取名“何陋轩”；客厅简朴无华，却宽敞明亮，取名“宾阳堂”；凉亭不事雕琢，却翠竹环绕，取名“君子亭”。

虽然住进了龙冈书院，王阳明仍然常在“阳明小洞天”读书、思考，在这里体悟、把玩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探讨自然规律、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周易》，所以，又将“阳明小洞天”称为“玩易窝”。说是“玩‘易’”，实是“悟性”，是在苦思冥想以前一直琢磨不透的问题，即人生和宇宙、人性和天理、致知和格物的关系。王阳明称之为“吾心”和“物理”的关系。这个问题孔子曾经提出，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所以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第五》）

这个子贡认为“不可得而闻”的问题，经过后世儒者包括程颐、朱熹等人的不断考订、诠释，结果是越解释越复杂，越复杂越艰深，成了专门的学问，朱熹更成为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和权威解释者。

王阳明既然想“学为圣贤”，也和张载、周敦颐、二程兄弟及朱熹等宋儒一样，想努力窥破这层道理，想努力将自己的心性与天道沟通。为此，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体验，但也一直在苦恼。

尽管朱熹的说法看起来有理，但在王阳明看来，用之解释事物，处处都是障碍。就在他自以为开始有所悟的时候，却被命运驱赶到了这蛮荒之地，无书无友。但是，当年周文王被幽禁在羑里，不也是无书无友吗？不是经过反复演练，终于演绎成《周易》、构成八卦六十四爻的博大学问吗？如果周文王处于此时，他会演绎出什么学问？如果孔子在此时，又该做出什么学问？王阳明在他的《玩易窝记》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蒞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

在经过“始其未得”“其或得之”“得而玩之”三个阶段之后，王阳明突然心中一亮，人性与天道、吾心和物理竟然联成了一体！心、性乃是稟天地五常之气而生，与生俱来。孔子之心、之性，也是和孔子与生俱来。天道、天理乃元亨日新之道、元亨日新之理。元者善也，亨者通也，天道、天理乃万事万物日日不停、新新不已的变化道理或规律。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乃孔子之心与万物之理、孔子之性与元亨日新之道的沟通与契合，



这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心灵与宇宙的撞击。这日日不停、新新不已之道，正在孔子自己的心中，他人如何能明白，又如何能“得而闻之”？

王阳明觉得豁然开朗了，原来，所谓天道、物理，所谓圣人之道，竟然全在我心之中，全在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之中。为圣之道，只需从自己的心、性中挖掘、寻找。也就在这时，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学生们根据王阳明自己的回忆，对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做了如下记载：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阳明年谱》）

“圣人之道”就像一盏明灯，后世儒者不断将自己的认识附在灯上，久而久之，见到的都是附在灯上一层一层的厚纸，灯反而不明了。如今，把这一层一层后儒附上的纸揭去，“圣道”重现光明。迷雾被拨开，陷阱被填平，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性，直接和圣贤对话、沟通。这个发现被王阳明的弟子们称为“龙场悟道”。

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揭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宋儒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如此简单的道理，王阳明竟然经历了近20年的上下求索、左右彷徨，才在龙场这个地图上难以寻找的地方，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种

新的方式表述出来。由此可见，任何新发现、新发明，都不是仅靠“读书”可以得来的，都要通过亲身的经历和磨炼，用“心”体悟出来。正如胡居仁所说，读书得之虽多，而行事得之最实。有一种说法：“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是，如果没有读十年书、办十年事的积累，这席话就是对牛弹琴。所以，绝对不能以一席话来否定十年的读书、十年的努力。

“龙场悟道”的十年之后，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的“序”中，对自己“学为圣贤”的经历做了回顾，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是在经历了“三变”之后，才有“龙场悟道”的：

一、“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与其齐名的后来有不少大名鼎鼎：名列“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同时名列“前七子”“南四子”的徐祯卿，以及在湖广巡抚任上识拔张居正的顾璘，在关键时刻帮助王阳明的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等等。但是，王阳明总觉得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谓的诗文词赋之中，非“圣人之道”。

二、于是改弦易辙，“稍知从事正学”，研读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著作，又“以竹格物”，但大病一场，遂感众说纷纭、“茫无可入”，圣贤皆有缘分，未必人人可至。但是，对于程朱的学说，对于“圣人之道”，始终不能释怀。如此反复，却不知“圣人之道”究在何方。

三、不得已转而“求诸老释”，顿觉惊喜，“以为圣人之学在此”。而将其与孔孟之说、日用之道相印证，又产生抵牾，遂有劝僧人还俗、批评神仙术之举。但王阳明的一生，实与佛道有不解之缘，在他的学术中，更有兼容并包的大气象。



在经历过这“三变”，经历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学术探索之后，王阳明于迷茫彷徨之中，贬官龙场，反复思考，体悟日深：

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所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朱子晚年定论·序》）

所谓“龙场悟道”，就此发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王阳明的这段回顾，是为了告诉人们，他的“龙场悟道”来之不易，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求索。但是，王门弟子后来在为老师“造势”和“造神”的过程中，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蒙上神秘色彩，成了佛教徒营造的禅宗六祖惠能“顿悟”神话的翻版，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王学的误解而直指其“入禅”。其实，包括六祖惠能及王阳明在内，所有的“顿悟”，都是“渐悟”的阶段性成果。由于“渐悟”的永不休止，也就不断有“顿悟”的成果推出。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在龙场的此次“悟道”，只是悟出了通向“圣人之道”的“路”，而非达到了“圣人之道”的“道”。“圣人之道”是王阳明上下求索的目标，“吾性自足”则是寻求“圣人之道”的路径，这个路径不在“外物”，而在“吾性”。

【第四讲】

此心在物，「心」即是理



一、禹心稷心即我心

就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时，有人打算请其出山“传道”了。打算请王阳明“传道”的，是贵州提学副使席书。

席书是四川遂宁人，比王阳明大 11 岁，进士早三科。正德四年春，席书由河南按察僉事升任贵州提学副使，职责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当时的贵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既缺学生，更缺先生。到王阳明在龙场为驿丞、席书在贵州任提学期间，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贵州还附于云南，与其一并进行，两省的举人名额也合在一起，直到王阳明去世后的嘉靖十四年（1535 年），贵州的名额才从云南划分出来。

虽然论资历是前辈，但席书敬重王阳明的气节和学术，如果能把王阳明请到贵阳，“主席”贵阳书院，对于学生是巨大的鼓舞。但是，席书有席书的顾虑，尽管自己对当时尊朱抑陆有看法，但毕竟朝廷推崇的是朱熹，而王阳明则推崇陆九渊，对朱熹颇有微词。作为提学副使，席书的职责却是督促学生修习朝廷倡导的“正学”即朱学，那怎么办？

席书从贵阳来到龙场，以正四品提学副使的身份，拜会前正六品兵部主事、今未入流的龙场驿丞王阳明。稍事寒暄，席书直奔主题，询问起朱、陆二家学说的异同，他得掂量一下王阳明能不能请。虽然经过在贬谪途中，特别是经过在龙场期间的长期思考，王阳明对天道、人性已经有更加深刻的领悟，对朱、陆也有了新的认识，但他不知席书的学术取向，所以不便向席书阐明。

此时他需要的是平台，而不是争议。所以，对于朱、陆的认识，王阳明避而不谈，只是把自己最近的心得告诉席书：“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是说“圣人必可学而至”吗？二者之间有何关系？王阳明给席书举例子，就事论理。这种“举例子”“就事论理”的方式，既是王阳明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包括禅宗思想家的一大特点。

王阳明以夏的开创者大禹、周的开创者后稷为例，向席书解释何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何谓“心即理”：大禹、后稷都是圣人，同有为民之心，但禹心是禹心，稷心是稷心，其忧民之念就各不相同。大禹以治水为己任，必定认为：洪水未能治理，民众必受水灾。看似洪水为患，实则是我为患。大禹以此心治水，才13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后稷以劝教农事为己任，必定认为：民众未习农事，必然遭受饥饿。看似缺粮所致，实则我未尽责。后稷以此心教民，方有刻不容缓之迫。可见，只要心中存着百姓，无论禹心、稷心，都与我心无异。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如若不然，孔子在2000多年前，焉能得知你我今日之会而预先教我？大禹、后稷又如何知今日民生之需求而教我？

原来如此，以“吾心”体禹心、稷心，禹心、稷心即是“吾心”。席书开始信服了，“圣人之道”，竟然真的如此便捷。更何况，《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天命”“天道”，本来就与“我心”“我性”相通。所谓天命、天道，说到底都是人性、人心的体现。

席书对“圣人之学”、对朱陆之学有了新的认识：圣人之学，



重见于今日；朱陆之学，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要得圣人之道，只须向自己的心中寻求。

看上去王阳明并没有回答朱陆之异同，但意思已经十分明白。席书也是心领神会，后来更成为王阳明学说的有力支持者。王阳明在和席书、和贵阳书院学子的交流中，也不断阐释、修正、完善自己的心得，并且向贵阳书院及来龙冈的学生们提出了四大要求：

其一，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坠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其二，勤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

其三，改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其四，责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在王阳明看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缺一不可。前面两条是说学问，后面两条则是说做人。不立志，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志也不能成就。为人处世，不可能无过，但应该有过必改；不仅自己向善，还要责人向善。但责人必须注意方法，要让人能够接受，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自己不能攻人之短，但要乐于闻己之短。

王阳明晚年的弟子钱德洪说，老师“为学”经过泛滥于辞章、出入于佛老、研读于圣贤三个阶段后，有了“龙场悟道”；而老师“为教”，也有三个阶段，贵阳为第一阶段，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教：

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刻文录叙说》）



王阳明后来告诉学生，当他将“知行合一”之说与从中原来到龙场一带的汉族“亡命之流”交流，以及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首脑交流时，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但是，一旦和汉族士大夫交流，却是格格不入。究其原因，中原的“亡命之流”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脑没有受到“世儒”的“污染”，而汉族士大夫却已经被程朱的“格物致知”先入为主，所以难以接受“知行合一”。于是王阳明更加相信，要传播自己的学说，要让人们接受自己的学说，就必须对朱熹的学说进行批评，进行清理。

那么，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和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有何异同？其实王阳明在此时也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也许他觉得自己心里明白，但其实并不清晰，至少不能清晰地阐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所以，对于“知行合一”，王阳明还需要继续体悟，我们的了解也只能随着他自己的体悟而逐渐展开。

二、同是天涯沦落人

如果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王阳明或许真已忘记自己尚在贬谪之中，忘记自己尚在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

正德四年秋七月初三日傍晚，一位来自京师北京的吏员，带着一子一仆途经龙场，在一位苗民家借宿。王阳明感觉该主仆三人情绪低落，打算第二天前往探询。但第二天一早，王阳明还没有来得及探询，吏员一行已经上路了。王阳明不免有些惆怅。中午，有人告知，说吏员死在了离龙场不远的路边，儿子和仆人痛

不欲生。傍晚，吏员的儿子又死于父亲尸体旁。第三天一早，又有人来报，说吏员的仆人也死在山坡之下。

王阳明接二连三得知噩耗，倍加伤感，带着两名仆人，前往察看。但见荒山野岭，了无人烟，三具尸体横竖道旁，场面十分悲惨。王阳明命仆人掩埋尸体，仆人面有难色。王阳明并不责怪，只是自言自语叹息：我等三人，与吏员主仆三人，命运何其相似也！仆人听了，不觉潸然泪下，就着山势，将三具尸体掩埋。

王阳明触景生情，写下了一篇传诵甚广的《瘞旅文》，后被《古文观止》所收录：

呜呼伤哉！翳何人？翳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

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

呜呼痛哉！……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二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



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自从步入仕途，此身便已卖给帝王家，因遭贬谪而来此地，我是身不由己。但是这位朋友，你又何苦？听说你只是一个吏员，月俸不过五斗。如果领着妻儿耕作田亩，自当衣食有余，何必为这区区五斗米而弃尸异乡荒野，还连累了儿子和仆人？

如果你真的留恋这五斗米，那就应该欣然就道，又何必如此凄凄惨惨、面无欢容？穷山恶水、毒气烟瘴攻于外，悲悲切切、忧心忡忡郁于内，哪有不死之理！只是没有想到你们会走得如此之仓促。

我到此处已近两年，却能去病健体，就是因为心境怡然，无一日之戚戚。今天所以悲伤，完全是为你父子主仆。如今已经埋葬了你们三位，我也不再为你们而悲伤了。人是有精神的，一旦自己做出了选择，就该义无反顾、从容面对。

这篇《瘞旅文》，王阳明以自己现身说法，既是教人，实为自励。

经过几年磨难，王阳明开始用通达的胸怀对待人生，也正在养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古文观止》收录了王阳明的三篇文章，有两篇为其在龙场期间所作，既是偶然，更是必然。因为此时的王阳明，在经历肉体上磨难的同时，也在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净化。而据书法界的友人告知，从王阳明遗存的作品看，其书法也在此时臻入上品。其中上品中的上品，正是其文也收入《古文观止》的《象祠记》。

两年前，当王阳明进入贵州这块“蛮荒”之地时，虽然早已

有了为圣之“志”，却未寻找到为圣之“道”，心中不免有几分惶惑。两年之后，山河依旧，世事仍故，王阳明却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脱胎换骨。

转眼已是正德四年年底，王阳明的贬谪期已届三年，来到龙场也已一年零十个月。如果不发生这场变故，王阳明此时也许是某部清吏司的员外郎或郎中了。但这三年恰恰发生了变故，而这场变故所凝聚的能量，将成为其毕生事业的巨大动力。

在王阳明离开京师的三年时间里，朝中大局相对稳定。刘瑾为首的宦官势力除了继续对文官集团中的反对派进行打击外，没有挑起新的政治事端；正德皇帝有自己热衷的戏曲、游乐，外事则有文官集团打理。王阳明远在贵州，与中原音信隔绝，自然也不会再去惹怒权贵。

正德四年年底，论公历应该是1510年初，吏部的一道文书下到贵州，以王阳明为江西布政司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包括《明史·王守仁传》在内的诸多有关王阳明的著作记载说，刘瑾被诛之后，王阳明为庐陵知县，并非事实。刘瑾被杀在正德五年八月，而正德四年的除夕夜，王阳明的座船已行驶在沅江之上，并且有两首《舟中除夕》诗，其一说：

扁舟除夕尚穷途，荆楚还怜俗未殊。处处送神悬楮马，家家迎岁换桃符。（《舟中除夕二首》）



三、新官上任头把火

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中旬，王阳明来到了江西吉安府治所在地庐陵县。这是王阳明进入仕途以来，第一次任职为一个行政区的主官。知县被民间艺术家戏称为“七品芝麻官”，但在明朝的职官体系中，却是中级官员。由于直接和民众打交道，知县和知府、知州一道，被称为“亲民官”。国家的法令，他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民间的疾苦，他们是真正的感知者。只有经历过这个层面的官员，才可能知道民众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才符合民意并具有可行性。韩非子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乃至理名言，你连底层民众都没有接触，连人民的真正疾苦都不知道，怎么做宰相？而战国时期的所谓“州部”，就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府、州、县。

宋元明时期的江西，特别是江西的吉安，是人文荟萃之地，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但是，吉安有吉安的荣耀，也有吉安的问题。最令地方官头痛的，是“民风好讼”。明朝官谚说：“命运低，得三西。”（谢肇淛《五杂俎》）“三西”之一，就是“民风好讼”的江西，特别是江西的吉安。王阳明出生的几年前，有位陕西籍官员调任吉安知府，因为吉安“文人贤士固多，强宗豪右亦不少”，要求朝廷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以治理吉安府的“讼风”。不到两年，“强宗豪右”倒是打击了不少，但这位官员也因为被“强宗豪右”构陷，下狱而死。庐陵为吉安首县，江西的问题、吉安的问题，都在庐陵有突出的表现。

到庐陵后，王阳明既不忙于处理积压已久的案子，也不急于革除相沿成习的“讼风”。“好讼”既已成风，必定有它的道理，说明民众对法律的熟知，但遇事则争、遇事则讼，且处处钻法律的空子，也不可取。王阳明认为，治理地方，关键在于安抚人心，人心既安，几桩积案还不迎刃而解？但是，毕竟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说，王阳明在刑部为主事时，第一把火革除了猪吃人粮的陋习，第二把火处决了杀害十多条人命却判而不决的陈指挥。如今为庐陵知县的王阳明，这第三把火要革除什么，要烧向何方？人们拭目以待。

此时的王阳明，大概正在以“我心”体“禹心”、体“稷心”，归根到底，体的是“民心”。正是从“吾心”“民心”出发，新任知县王阳明的第一把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烧向了江西的镇守中官。

原来，王阳明在查阅公文时，有件事情凸显出来。一份由吉安府发来的公文说，奉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钧牌，命吏员到县，催促庐陵县上交所欠葛纱银两。

明朝自成祖永乐年间开始，向各边派驻宦官，称“镇守内官”或“镇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镇守中官，协调文武官员，搜刮地方物产。镇守中官多和当地地痞流氓勾结，以上贡为名，行中饱之实，大肆搜刮民财，在各地引起规模不同的骚动。吉安、庐陵也不能幸免，葛纱银两便是一例。

王阳明经过访查，知道了事情的始末。此事始于三年前，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官行文布政司，凡生产葛布府县，都得上贡葛纱、葛布；不生产葛纱、葛布的府县，得根据田赋的多少，加派一定



比例的葛纱银两。公文一下，“民风好讼”的庐陵群情激愤，拒不交纳。

明朝有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法令，即各地征收不足的赋税及摊派，由粮长即当地大户代赔。王阳明到庐陵时，有几位粮长正被拘留，他们连赔了两年的“葛纱银两”，第三年因未及时赔补而被关押，家属或家族须交足银两，方能放人。

王阳明的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仅一个庐陵县，这些年不仅加派了葛纱银两，还有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摊派。本来一年交纳的定额税银为 3498 两，如今已超过万两，是原额的三倍，这还不包括日甚一日公差往来的接待费用。此时的河北等地，因为类似的原因，已经发生了民变，川东及江西南安、赣州等地百姓也在动乱之中，如果逼得急了，庐陵百姓不也要闹事吗？国家之事，就是这样败坏的！

果然出事了。一千多乡民进了县城来到县衙前，请求知县做主，释放被关押的粮长，减免无理的摊派。王阳明这些天琢磨的就是这件事，本打算给上司陈述，请求放宽催征加派的时限，释放被关押的粮长，但见到眼前这些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乡民，放宽时限的话竟然说不出口。在这些乡民中，或许就有胡铨、文天祥的后人；在这些乡民的子弟中，或许将会产生大明朝的欧阳修、杨万里。

经过诏狱、廷杖和龙场的磨难，王阳明已经不太容易激动。但一看到这些乡民，一想起那些骄横跋扈、搜刮民脂的宦官及其爪牙，不由得又激动起来。他挥了挥手，让乡民们安定下来，原本想安抚，竟然成担保：本县到任不久，尚未完全体查民间疾苦。

但这葛纱加派一事，已经明白原委，定为你等申告上司，尽行蠲免，关押县衙的粮长，立即释放！

乡民进城，本来只是希望释放亲人、减少加派，没想到知县竟然如此果断，不仅立即放人，还要申告上司，蠲免葛纱银两，真是喜出望外。人们千恩万谢，陆续散去。乡民散去之后，王阳明立即向吉安知府、江西布政司主官写了一份题为《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公文，要求免除镇守中官加给本地的不合理摊派。应该说，当时的吉安知府也是有担当的，一面行文上司，一面对王阳明的报告做了批复，拖欠葛纱银两，一概蠲免。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官，大概也知道这位贬谪龙场复出的庐陵知县王某不好对付，此人刘瑾都不怕，还怕谁？这件事情，竟然不了了之。

庐陵城乡当时是一片欢腾。人们开始对这位新任知县刮目相看，早就听说其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名扬京师，而且不怕得罪权贵，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但是，对于王阳明来说，这件事又办得有些意气了。意气和禀性竟是如此根深蒂固，遇上不平之事，事关民众生计，忍不住就要拍案而起。

四、为政以开导人心为本

凭借助抵制摊派树立起来的威望，王阳明在庐陵又烧了两把火：一是兴利，减少吉安的火灾隐患；二是除弊，整顿吉安의 “好讼”之风。

传说庐陵为火神居地，故火灾特别多。王阳明经过实地考察并咨询当地父老，知道庐陵火灾起因有三：一、火灾多发生在夏



秋之时，这是天气亢旱所致，各地皆然；二、庐陵县城民居皆为土木结构，容易发生火灾，同样各地皆然；三、庐陵民居建得十分密集，房屋之间既无砖墙相间，又无火巷相隔，一旦发生火灾，便是燃烧一片，这才是庐陵火灾的“个性”。王阳明为此发动当地父老，说服居民：一、凡临街建筑均退地三尺，以拓宽街道，既为防火带，也便于疏散人口；二、每家房屋两边各退地二寸，作为火巷；三、每家出银一钱资助临巷居民，修建砖墙，以断火势。

比起火灾，“讼风”更为复杂，经与幕僚及父老的反复计议，王阳明理直气壮地烧了这第三把火。一天傍晚，庐陵从县城到乡村，通衢里巷，都张贴着县衙的告示。此时，地里干活的农民收工，外出贩卖的商人返家，每张告示前都挤满了人。有识字的挤在人群前面，高声诵读，大概意思是：吉安本“文节”之邦，却以“健讼”著称，作为知县，深感羞愧。当下正值农忙，又遇疾疫，有人却将精力放在诉讼，家中老少无人照料，田中农事任其荒废。如因未能及时治疗而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如因未能及时播种而使秋后无收，即使官司打赢，难道不后悔吗？如果真有冤屈，作为知县，定当为民做主。若有田土纠纷，仍往里老处调解，如里老徇私作弊，本县将拿里老是问。“礼以待民，法以制奸”，历来如此。对于专以诉讼为能、诬告为快的刁民，县衙之中，有的是刑具，所以至今不用，是因庐陵为贤士文人辈出之地，家家都有知书达理之人。但是，如果有人不听教诲，执意胡为，国法不容，到时也休怪本县动用刑罚。

接着，整肃“讼风”的措施也随之出台：一、恢复明太祖时期建立、此时已经名存实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惩治邪恶，

褒扬良善；二、让乡中里老重新承担起教化乡民的责任，要求各家家长对子弟进行管束和教育；三、强化明初建立的里甲制度的功能，县城内十户为一甲，乡村以村为单位，要求平时邻里和睦相处，不得动辄告官扰官。

经过半年的治理，“文章节义之邦”的庐陵，“讼风”虽然不可能根治却有所缓解，火灾虽然不可能消除却大为减少。

人们说阳明一生，“事业多在江右”（罗洪先《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但通常将庐陵知县一节忽略不计，原因是知县官品太低，而王阳明任职的时间又太短。

就在王阳明为庐陵知县期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八月，“八虎”之首的刘瑾被诛杀。消息到了庐陵，王阳明借朝覲之机进京，谋求平反，并留在了北京。所以，他为庐陵知县的时间，实际只有6个多月。

但是，谁说做官一定要做大官？谁说小官办不了大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民众来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的当下疾苦，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衣食住行，一句话，“百姓日用”，就是国家的大事。如果明朝1000多个县的知县、100多个府的知府，都能像王阳明这样，以“我心”体“民心”，不计个人得失，把解决民众的疾苦视为自己的责任，社会能不太平？如果比他们级别更高的官员，如果明朝的皇帝能够多一些为民众的利益着想，国家能不安定？

谁说任职时间短就不能为民众办事？就这6个多月，人称王阳明“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就这6个多月，人们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办实事；就这6个多月，开始形成王阳明“为



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的风格，成为其日后在更大平台上施展才干的预演（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特别是，就这6个月，作为“亲民官”的王阳明，从自己任职的实践中，正在体悟并酝酿着一生学术之中的一个重大思想，两个字——“亲民”。

【第五讲】

「政在亲民」



一、大兴隆寺的三人会

正德五年的年底，正值府、州、县“亲民官”三年一度的赴京朝觐期，王阳明提前进京，谋求“平反”。平反的政策落实得及时而快捷，从正德五年冬到正德七年冬，两年之间，王阳明先后受命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未赴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吏部考功司郎中，再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品级由正七品到正四品，进入高级官员的序列。这些官名有点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明史·职官志》或笔者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尽管官越做越大，王阳明却并不满足。他的志向、他的抱负是“学为圣贤”，而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官场上行走，他希望有更大的施展自己志向和抱负的平台，希望将自己20年来对“圣人之道”的体悟，特别是对“心即理”“亲民”“知行合一”的体悟，传递给更多的人，并落实在行为上。

王阳明到北京后最大的喜悦，不是官做大了，而是和湛若水重逢了。阔别四年，劫后重逢，两人都是欣喜异常，比邻而居，大兴隆寺再次成为会友讲学之地。

大兴隆寺是当年北京的第一大寺院，原名“庆寿寺”，正统时期由著名宦官王振主持重建，旨在为皇室祈福。但是，大兴隆寺建成的第二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正统皇帝被蒙古瓦剌部所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虽然大兴隆寺并没有给造寺者带来福报，却给当日北京带来了一大名胜。各地举

子进京考试，各地商人进京贸易，大兴隆寺几乎是必去之处。北京的士大夫更将大兴隆寺作为讲论学术、接待朋友的好去处。王阳明的学说产生影响，正是从重回北京之后在大兴隆寺讲学开始。

在大兴隆寺讲学的这段时间，有三位重要的人物开始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第一位是黄绾。黄绾字宗贤，浙江台州黄岩县人，自称“少尝有志圣学”，也曾留意宋儒周、程、朱、陆的著述，但对王阳明并不了解。后有友人致书说：“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趋向正，造诣深，不专文字之学，足下肯出与之游，丽泽之益，未必不多。”（《阳明先生行状》）黄绾是个热心人，立即拜访王阳明，后来成为王阳明的弟子。每当有人抨击王阳明及王学，黄绾必挺身而出，颇似王门“护法”。王阳明、湛若水在兴隆寺聚众讲学，黄绾摇旗呐喊，大力宣扬，在京师上下卷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王旋风”。

第二位是方献夫。方献夫字叔贤，广东南海即今广州市人，刚20岁出头，就和大自己20岁的湛若水同科中进士，一同选庶吉士。从年龄和资历来说，方献夫是王阳明的后辈，但此时已是吏部郎中，是吏部员外郎王阳明的上司。但是，方献夫服膺王阳明的学说，当时就请为门生，给了王阳明极大的面子，也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第三位是乔宇。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山西乐平即今昔阳县人，虽然只比王阳明年长8岁，入仕却早了15年。由于都曾热衷于辞章之学，同为“文友”，关系比较密切。王阳明以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在大兴隆寺讲学时，乔宇已是户部侍郎，时常前来探讨学问。王阳明记载了二人之间十分有趣的一次对话，我们



将其译成白话文：

王阳明说：学贵于专。

乔宇说：真是这样。我在少年时代喜欢下棋，专心致志，废寝忘食，除了棋局，目无所视，耳无所闻。一年之后乡中无对手，三年之后天下无对手，真是学贵于专。

王阳明又说：学贵于精。

乔宇笑道：真有体会。我年轻时好诗文，诸子百家、史传《通鉴》无所不读，意境如行云，作文如流水，始则出入于唐宋，继而直追汉魏，果然是学贵于精。

王阳明也笑了，再加一句：学贵于正。

乔宇不禁深思：太对了，中年之后，我开始好圣贤之道，深悔过去把有限的时光消耗在了无谓的棋艺、诗文上。现在该怎么办？

王阳明一句话又得罪人了：“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当朝大佬们有几个真正在做学问，真正在修习圣贤之道的？只要先生您有决心学圣贤之道，任何时候都不会晚。春秋时代卫国国君武公，年届九十，尚且对国人说：“毋以老耄而弃予。”先生年龄不到武公一半，只要真心向道，自可事半功倍。先生如果向武公学习，我也当以国士视先生（《送宗伯乔白岩序》）。

方献夫、乔宇和王阳明一样，都有求索和彷徨的过程。方献夫在“尚辞”即热衷于辞章的阶段，和王阳明学说格格不入；在“讲说”即交流学问阶段，开始有了共识；一旦有志于“圣人之道”，便服膺于王阳明。乔宇是位天才，用功既专且精，学棋三年难有敌手，学文由唐宋入汉魏，人到中年，感到棋、文皆雕虫小

技，为学当走“正道”、当趋“正学”，过去辜负了大好时光，如今后悔晚矣。但王阳明以当年卫武公年届九十而孜孜求学的故事，鼓励乔宇把“专”与“精”的精神投入到“正学”即“圣人之道”上来。

十年之后，在王阳明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先伸出援助之手的，正是这位乔宇。

二、朱陆自有异同

但是，不管怎么说，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是不能容忍几个中级官员肆无忌惮讲学的，而且，所讲的内容多是挺陆九渊而贬朱熹的。正德六年十月，也就是王阳明到北京之后的一年，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

对于湛若水，王阳明充满敬意。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认识，而湛若水的学术，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务求自得”。这个“自得”与“自足”之间，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并无本质区别。湛若水离京时，王阳明作文送行，言及湛若水对自己的帮助：

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别湛甘泉序》）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提出了一个疑问：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

其实，王阳明早已承认自己受益于湛若水甚多，又何必一定要说到从未见过面的湛若水的老师陈献章？

在这篇送别湛若水的赠文中，王阳明没有忘记对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及当代学者进行抨击和嘲讽：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敦颐）、程（颢）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

在王阳明眼中，颜子、曾子、孟子才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他们的学说到宋代由周敦颐、程颢继承，而最受明代官方推崇的程颐、朱熹，只是干了些“言益详，道益晦”的事情，他们说得多，分析得越是精细，“圣人”的光辉就越是为他们所掩盖，学术越是支离破碎，给有志学习的人设置了无数的障碍。

王阳明的两位门人，王舆庵和徐成之为朱学与陆学的是非发生争执，王舆庵崇陆学，徐成之则崇朱学，请老师加以裁定。王阳明听完二人的述说，笑道：朱学为是，陆学为非，这是天下的定论，由来已久，久则难变。就是徐成之不与争论，王舆庵也无

法改变这个定论。老师的这个回答，令推崇朱学的徐成之非常难堪。他抗议说，先生的说法看似不偏不倚，却是暗中在助舆庵，看上去既不偏朱也不倚陆，却是挺陆而非朱。

在王阳明以往的言论和书信中，已经多次表示对朱学的不满。如今学生之间因为朱学与陆学的是非发生争论，并且把这个事情直接摆在了自己面前，王阳明干脆就此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

王阳明在给徐成之的信中说，王舆庵赞赏陆九渊的学说，认为陆学以“尊德性”为主，其实不然。陆九渊不仅主张“尊德性”，也主张多读书，而且要求认真体验。这些都是孔子、孟子对学生的要求，怎能说他是空虚无物呢？后人批评陆学，主要是针对他的“易简、觉悟”之说。但是，“易简”之说出自《周易》的《系辞》，“觉悟”之说虽然出自佛教禅宗，但与儒学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陆学都是值得推崇的。

王阳明在信中又就徐成之对朱学的赞赏说了自己的看法：你认为朱学以“道问学”为宗旨，同样不对。朱熹常说“居敬穷理”，又说“非存心无以致知”，还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这些话虽然说得不很透彻，但可以看出朱子也是尊德性的。只是因为朱子平日汲汲于小学功夫，见书就作注解，训诂成癖，后来的学者不去钻研他学问的精华，只是周旋于他学问中的末技，致使人们说朱学支离破碎。所以，你徐成之虽然想尊朱学，却也没有真正弄清朱学的精髓在何处。

王阳明在阐明了自己对朱学、陆学的基本认识之后，最后在信中表示：朱学早已风行天下，没有必要再去论辩；陆学蒙不实



之诬近 400 年，该是为其洗刷的时候了。

王阳明给徐成之的两封信以及其他的相关言论，处处尊陆而贬朱，故而引起朱学捍卫者们的愤怒。反对者中，有不少王阳明早年的朋友，如汪俊、崔铣、储巏等。储巏曾盛赞王阳明“趋向正，造诣深”，让黄绾追随王阳明为学，如今则责备王阳明不以师道自处；汪俊、崔铣曾经是王阳明最亲密的朋友，如今反复致书论驳，直至断交，崔铣更斥王阳明为“霸儒”。

那么，王阳明为何要尊陆贬朱？这里既有其自身个性及学术路径的问题，但更与时代相关。王阳明的时代，是明代多元化社会形成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明朝前期以个体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状态，社会财富的积累使得人们的消费观念由崇节俭转向重享受，政治环境的宽松给了人们更多的学术自由、娱乐自由。程朱学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也是因为适应他们那时所处的时代，但在成了“官学”之后，其中最为生动活泼的成分被淹没，剩下的成了说教，不适应正在开放的社会，所以才有了吴与弼、陈献章等人带有挑战性的讲学，也才有王阳明公开对程朱学说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吴与弼、陈献章到王阳明，都是在为当时的社会、为人们的思想松绑。

三、“亲民”之学不明，天下无善治

湛若水离开北京的一年后，王阳明也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七年年底，也就是 1513 年初，王阳明辞别北京，沿运河南下，往滁州赴任。

从11岁开始，他在运河上往返家乡与京师已经多次了，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南下，有生之年竟然再无机会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

陪同王阳明南下的，是妹夫徐爱。徐爱是王阳明的忠实崇拜者，与另外两位年轻人一道，当年在王阳明离开余姚赴龙场时，投身王门，成为王阳明的第一批正式弟子。当时的王阳明，生死未知，前程未卜，徐爱等人的举动，令其感动。正德三年春，就在王阳明抵达龙场之际，22岁的徐爱中了进士，为祁州（今河北安国县）知州。此时任满，在北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核之后，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二人分别向朝廷打了报告，在上任之前，先回家乡余姚省亲。

在回家乡的座船之上，王阳明与徐爱谈学问，话题竟然是《大学》中的一个概念——“亲民”。徐爱在《传习录》中记载了自己的提问，其实也是借自己之口陈述人们的共同疑惑。

徐爱问：《大学》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程颐、朱熹都说，此处的“亲民”，当为“新民”。《大学》的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为所据。先生以为当据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王阳明毫不含糊：程朱说“亲民”应为“新民”，实属望文生义。《大学》后文的“作新民”，和前文的“在亲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学》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此其一。其二，“亲民”以“安百姓”“百姓日用”为第一要务，同时也有“教化民众”的



意义；而“新民”只是强调教化而忽视民生，这就偏了。程颐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不仅沿用其误，而且任意分割原文，杂以己意，实将人引入歧途。

王阳明告诫徐爱：以后读《大学》，当以《礼记》旧本为正，不必尽信朱子之言。而且特别指出，如果《大学》只是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那就类似佛老而非孔子之教了。

这段关于“亲民”与“新民”的对话，可以说是王学和朱学在执政理念上的根本分歧。虽然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哪一个第一位，哪一个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的出发点。这也是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分歧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心学，首先却是关心民众的“物质”，是“养民”；而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首先则是关心民众的“精神”，是“教民”。

《大学》是程朱所认为的一切学问的基础，王阳明向程朱宣战的突破口，恰恰是这个一切学问的基础。徐爱告诉人们，自己猛然听得老师这番言论，顿时晕了头。后来反复切磋、反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传习录》）

王阳明通过徐爱，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出去：

第一，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

姓。”“修己”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

第二，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就是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佛家的层面上；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阳明弟子黄绾后来对王阳明所说的“亲民”做了这样的阐释：

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挈矩之道者是已。

何谓“百姓不亲之亲”？百姓看似不是你的亲人，但就是你的亲人；百姓不亲，父母兄弟也不可能和顺。得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百姓，而且一视同仁。何谓“与民同其好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百姓的日常用度，就是国家的根本。民之所好我好之，民之所恶我恶之，用今日的话说，颇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之意，这才是治国之道。何谓“挈矩之道”？就是“正心”而“修身”，为民众做出示范。

“亲民”既是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生的施政纲领。如果追寻王阳明这个“亲民”理念的渊源，倒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子：“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亲民”不仅是王阳明自己的施政纲领，而且不断向入仕的弟子们灌输。

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的弟子，



曾向老师请教“为政之要”，王阳明回答：“政在亲民。”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当即将自己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为此题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

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行前问政于老师，王阳明还是两个字，“亲民”：“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书赵孟立卷》）

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王阳明是这样教弟子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无论是此前为刑部主事、庐陵知县，还是此后为南赣巡抚、江西巡抚，我们都可以看出“亲民”这两个字的分量。而王阳明一生的学术中，“亲民”被学生们奉为“三大要”之一，这是他在龙场、在庐陵、在南赣、在江西与民众的广泛接触中产生出来的情感和终极认识。

四、“学问”当自谋生始

正德八年（1513年）十月，在受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10个月后，王阳明由家乡余姚来到滁州。虽然说是已向朝廷告假省亲，但在余姚的时间也实在是拖得够长。

说到滁州，人们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唐宋八大家”北宋六家的头一位、“六一居士”欧阳修。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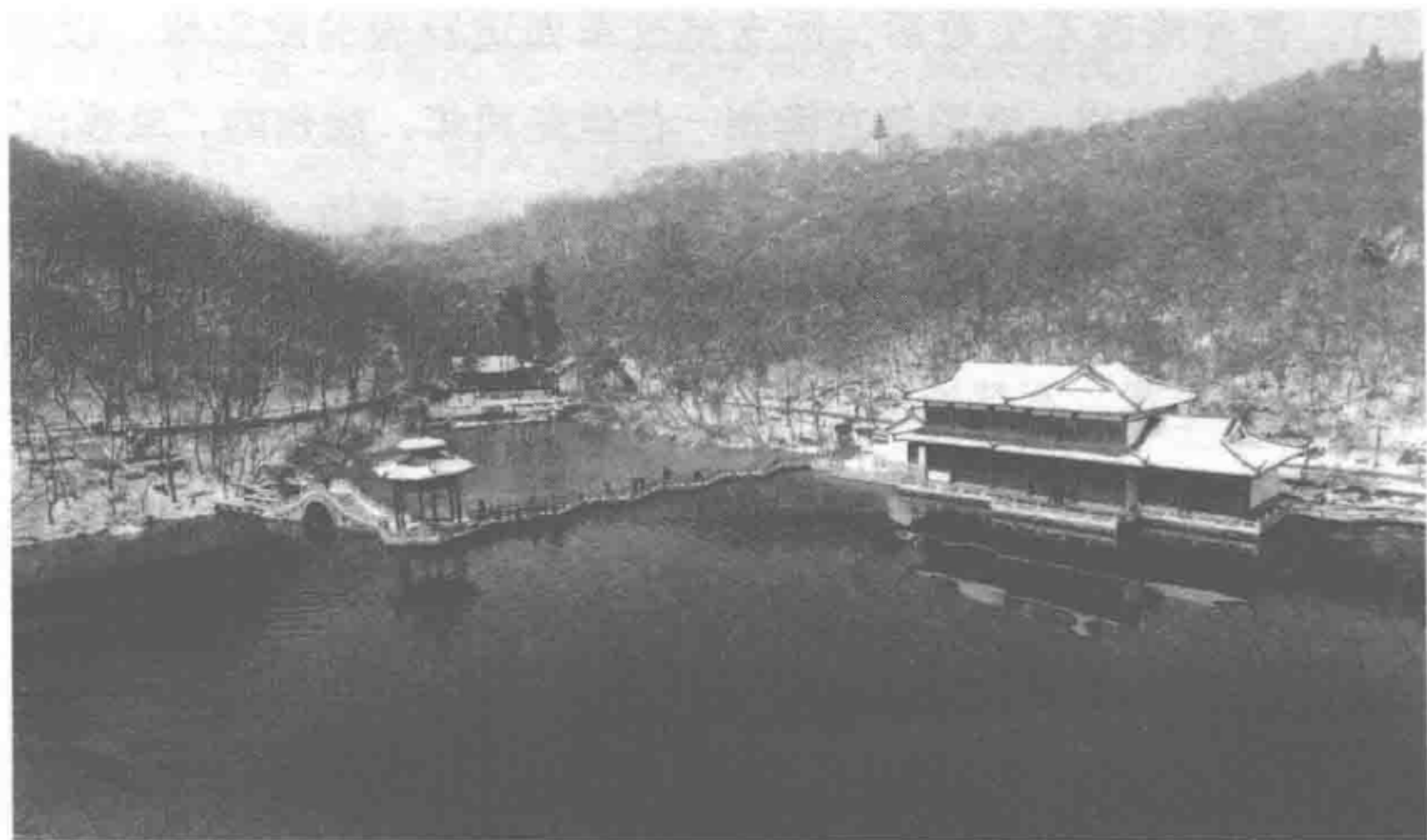
年)，范仲淹改革失败后，因支持改革而遭贬谪的欧阳修，以知制造任滁州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一住就是两年。滁州的“琅琊山”有一“让泉”，又名“酿泉”，山僧智仙建亭于泉边，以为游息之所；又以让泉之水酿酒，酒香醉人。欧阳修应邀登亭饮酒，果然一饮即有醉意，不禁连连称奇，从此自称“醉翁”。又喧宾夺主，将此亭称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虽然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一年多，真正在滁州任上的时间只有半年。在这半年中，他留下了 36 首诗，但只字不提欧阳修、醉翁亭及《醉翁亭记》。或许此时的王阳明认为，以欧阳修的大才，却以“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自得，太玩物丧志。他“阳明子”现在的使命是使久已湮灭的先圣精神重新发扬光大，应该透过山水之性情，点化出万物之通理。

在王阳明的讲学生涯中，滁州及此后的南京是重要的一站，在这里的众多弟子中，后来比较著名的有徐爱、黄宗明、薛侃、陆澄、季本等，以至阳明晚年的弟子钱德洪说，滁州是其师的“讲学首地”，并在《阳明年谱》中记载当时的盛况：

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酿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一轮明月冉冉而起，师徒数百人环龙潭而坐，同声而唱，学者提问，老师应答，师生



滁州琅琊山

讲论，何等气象！

那么，学生问什么？王阳明答什么？据王阳明的《赠周莹归省序》，有位来自浙江永康的周莹，曾拜应良（字元忠）为师，后又专程往见王阳明，希望能在王阳明这里受到更多的教益。王阳明听完周莹诉说来意之后，问道：你是从应先生处来？应先生都教了你什么？

周莹回答说：应先生只是每天教我要立志，要读圣贤的书，不要溺于流俗。应先生还说，如果我对这些道理不明白，或有猜疑，可以向阳明先生求证。于是不远千里，来见先生。

王阳明笑道：那你是不相信你老师说的话了？

周莹连忙解释：我相信老师的话。

王阳明笑道：相信你还来干什么？

周莹说：应先生虽然教了我应该学什么，却没有教我怎么学。

没有学习的方法，即使知道该学什么也是无济于事啊！

王阳明看了看周莹，说你已经知道了方法，没有必要再拜我为师。

周莹听了茫然：已经知道了方法？先生别拿我开心。我如果知道方法，就不会千里迢迢来见先生了。还望先生看在应先生的分上，不吝赐教。

王阳明笑了笑，和周莹进行了又一轮问答：

问：你从永康而来，路程很长吧？答：有千里之遥。

问：确实很远。是乘船来的吗？答：是的。先乘船，后又换成车。

问：那是够辛苦了。现在正值盛夏，路上热吧？答：热得很。

问：来时带了盘缠、带了仆人没有？答：都带了。但仆人在途中病，我将盘缠大半留给了他，省吃俭用而来。

问：你这一趟来得真不容易。既然是这样，你中途为何不返回家乡，也省得吃如此多的苦头。是否有人强迫你？

听了这番话，周莹感到受了委屈：没有人强迫。我既然已经决心投入先生之门，别人看来劳苦艰难的事，在我看来，就成了很快乐的事了。怎能因为一点微劳而打退堂鼓呢？又何必要别人相强呢？

王阳明听了，抚掌而笑：所以我说你已经知道学习的方法。你想到要入我门下，便不辞劳苦，不需别人强迫，遇水乘舟，无水陆行，冒酷暑、贷钱粮，终于实现了愿望。这是谁教你的方法？不都是你自己的主意吗？既然是这样，你立志于圣贤之学，自然也会以这种方法和态度去追求。你现在还需要我教你方



法吗？

周莹听罢，恍然大悟，不禁欢呼雀跃。

在滁州、南京期间，王阳明的讲学、应答，涉及“正心”“诚意”“良知”“亲民”等概念，而和周莹的这段对话，则反映了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追求“圣人之道”，当从学习生存、从“百姓日用”始；为政者，当从“亲民”始。

【第六讲】

『破山中贼易』



一、上天赐予的平台

在滁州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在南京为南京鸿胪寺正卿，虽然都是正四品的“高级”官员，但也是无可事事的“闲曹”。只是官是闲官，王阳明不是闲人，他利用朝廷给他的“有闲时光”，大张旗鼓地讲学，大张旗鼓地收授门生，大张旗鼓地宣讲他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并且在各种场合通过对《大学》的解读，对程朱学说进行抨击。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和陆九渊的学说并称为“陆王心学”，但王阳明学说的初兴，更多不是对陆学的继承，而是对朱学的批评，是破中有立。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王阳明在南京的“有闲”时光被一纸任命结束。朝廷命其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不久由“左”改“右”，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前往赣州，平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广接境地区流民的闹事。

从王阳明出生的那段时间开始，本是明朝中央派出机关的巡抚都御史，开始成为封疆大吏，掌管一省的政务、军务。虽然公开的名称是都察院巡抚某处“佥都御史”“副都御史”，分别为正四品、正三品，但地位却在从二品的布政使之上。以从二品的布政使为正三品“副御史”巡抚某处，便是提拔、重用；王阳明以正四品的南京鸿胪寺正卿为正四品的“佥都御史”，同样也是提拔，更是重用。

对于王阳明来说，南赣汀漳巡抚的这个任命来得十分突然也十分偶然。因为不久前，有御史向朝廷建议，发挥王阳明讲学的

特长，任其为国子监祭酒；而在本年年初，朝廷已经任命一位官员为南赣汀漳巡抚。只是，朝廷没有理会御史关于王阳明为国子监祭酒的建议，而此前受命为南赣巡抚的官员由于畏惧这一差事，宁愿告病退休，也不肯往赣州任职。结果，在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南赣巡抚的职务历史性地落在了王阳明身上。

第一股力量，是隐形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以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当权派。杨廷和是明朝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对于稳定正德后期、嘉靖初期的政局，对于革除正德时期的积弊，起了重大作用。王阳明出生的前一年，12岁的杨廷和就在四川中了举人，并且在19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此后在南、北两京任职，从正德七年开始为首辅。人们都熟悉的《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其作者杨慎，就是杨廷和的儿子。而且，就在杨廷和为首辅期间，杨慎不但中了进士，而且是中了状元。这是有明一代内阁首辅的儿子凭真本事中状元的唯一一例，所以没有受到“言路”的非议，既说明杨廷和本人的清正公平，也说明杨慎的文章能够服众。70年后，首辅张居正之子张懋修也中了状元，却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几年后“倒张”的重要凭据。杨廷和赞赏王阳明的气节，但不赞同王阳明的学术。他和他的内阁同僚们都恪守朱学，几年前，他们已经把王阳明调离了北京，现在就更不能让王阳明去做国子监的祭酒，不能为王阳明肆无忌惮地批评朱子、宣讲心学提供官方平台。但是，王阳明任期已满，得有一个去处，正好南赣汀漳巡抚空缺，你不是要做圣贤吗？不是要“知行合一”、要“亲民”吗？那就去赣州吃吃苦头，省得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天到晚耍嘴皮。



第二股力量，是公开的力量。这股力量主要来自兵部尚书王琼。由于南赣汀漳巡抚负有军事功能，通常得提督军务，所以兵部对人选有重要的推荐权。王琼和王越一样，也是明朝中期难得的干才，正德时曾历任户、兵、吏三部尚书，嘉靖时又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无论在哪个职务上，王琼都表现出过人的胆识。起用王阳明为南赣汀漳巡抚，正表现出王琼的胆略和见识。世人只知王阳明聚众讲学，以“发明”孔孟“圣学”自居，对程朱颇多非议，不管观点怎样，毕竟是学问家。至于王阳明除了搬弄学问之外，是否还有统兵理政之才，谁也没有把握。只是听说他15岁时去过居庸关外，但那是少年人的瞎胡闹，不能当真；也听说过他钻研过兵法，以果品盘碟布阵，并在督造王越墓时以兵法节制民工，但那也能算是懂兵法？当然，王阳明在刑部主事任上兴利除弊，在庐陵知县任上“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那是公认的事实。王琼正是在这些道听途说中了解到王阳明，而且，王阳明敢以一人抗天下、公然挑战朱子的学说，就凭这份胆量，大明朝没有第二人。

事实证明，南赣巡抚的任命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与贬谪龙场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意义，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平台。甚至可以断定，即便没有龙场之行，王阳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出类似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认识，但是，如果没有南赣汀漳巡抚的任命，一定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王阳明。如同没有太平天国，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曾国藩。

贬谪龙场成就了思想史上的王阳明，南赣巡抚则成就了

中国政治史上的王阳明，前者为王阳明的“立言”奠定了基础，后者为王阳明的“立功”提供了平台。这两个方面在王阳明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初心”的激发下，相互推动，才造就了一个“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王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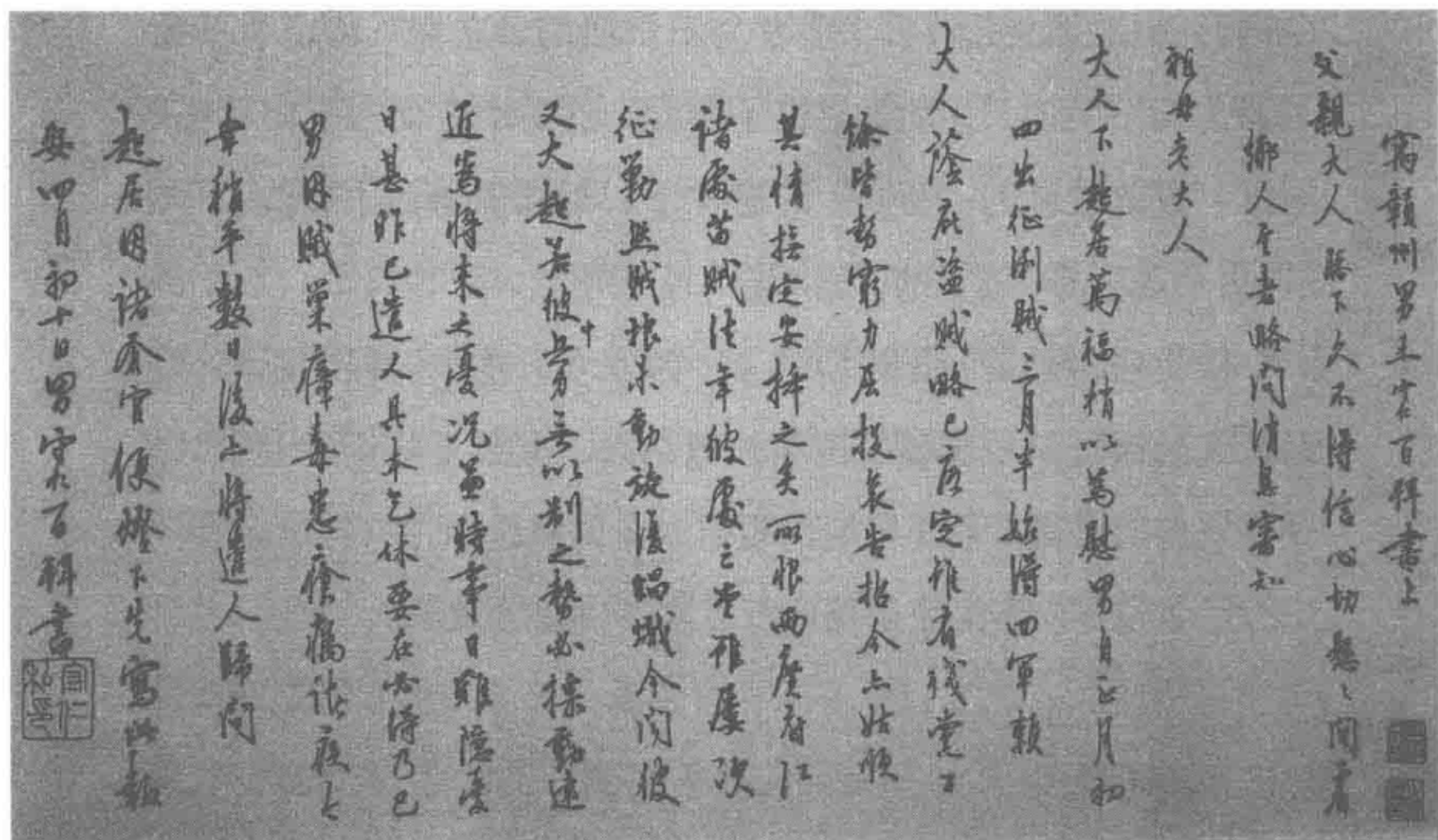
接受任命之后，王阳明回了一趟家乡。这个时候的王家，已经从余姚搬迁至祖先曾经的居住地绍兴。父亲王华年近七十，致仕在家侍候老母。而王阳明的祖母，此时已是98岁高龄。老人年纪大了，说走就走，王阳明此行，实有诀别之意。

二、系统工程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初三日，王阳明从南京出发，溯长江而上，到江西湖口，进入鄱阳湖。这是当年太祖朱元璋和陈友谅血战之地，鄱阳湖大战也可以说是明朝的奠基之战。经鄱阳湖入赣江，溯赣江而行。正月十六日，王阳明抵达南赣巡抚的开府之地赣州。

赣州南倚五岭，扼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之冲要，素有“江湖枢键，岭峤咽喉”之称，既是江西南部重镇，也是当时四省边境最大的城市。章、贡二水，穿山越谷，在赣州汇合而成赣江。南宋辛弃疾在两江交汇的郁孤台，留下了著名的感怀词《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王阳明书法作品

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立赣县始，到王阳明巡抚此地，赣州建城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南赣汀漳巡抚始设于孝宗弘治十年（1497 年），是由原江西按察司岭北分司即岭北道改置的，节制江西南安、赣州二府，福建汀州、漳州二府，广东潮州、惠州、南雄、韶州四府，以及湖广郴州，共八府一州，组成了一个“特别行政区”。

赣州的巡抚衙门也建于弘治时，气势恢宏。曾任南赣巡抚的何乔新对衙门的规制做了记叙：

前后堂五间，穿堂两廊，大门、仪门廊庑各若干间，东左建寢室，又东则建赏功所。大门之外，立抚安、镇静二坊牌。屏墙之南，又立三司厅，以为巡守、兵备会议白事之

所。……穹堂峻宇，高阁崇墉，規制壮丽，它镇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馘，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何乔新《新建巡抚院记》）

这段记叙既描述了南赣巡抚衙门的气派，也可以从中看出南赣巡抚的权威。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阳明在赣州的所作所为，不仅让天下观望者大跌眼镜，连极力推荐他的兵部尚书王琼也觉得不可思议：前后六任巡抚剿灭不了的“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全部平定。

人们奇怪，是别人都不行，还是王阳明太神奇？所以，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今天的人，都在讨论王阳明如何用兵，如何神机妙算。但王阳明的真正伟大之处，如果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用心”，是时时用心、事事用心。王阳明向学生解释，何谓“心即理”？“此心在物则为理。”这是王阳明对陆九渊“心即理”的深切体悟和直白解读。你“心”在物上，“物”就在你的心中，“理”也自然明白，此为“心即理”。那么，“此心”在“南赣”，“南赣”在“此心”，又当如何？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王阳明对南赣的形势有了真切的认识。

散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交界地区的流民，来自广东、福建及江西的吉安、临江等地，他们或者因为失去土地，或者为了逃避徭役，进入东西上千里、南北五百里的崇山峻岭之中，砍柴烧炭、垦荒种地，人口越聚越多，常常因为山场、



田地、墓地的归属等问题，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地方官府在这些纠纷中，自然是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加以流民中有不少流亡无赖之徒，时时挑起事端，抢劫杀戮也在所难免。官府弹压，流民抵抗，酿成武装冲突。时间一长，这里的流民结成了上百股武装势力，首领多有自称元帅、总兵、都督、将军者，势力最大的几股，已经建号称王。所以，在官方的文献中，将他们称为“山贼”“山寇”。

为了平息这里的动荡，明朝在弘治年间设置了南赣汀漳巡抚，为准省级机构，驻赣州。但是，20多年过去，官军对“山贼”屡屡镇压，或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或取得一时胜利，却无长久效果。巡抚换了多个，“山贼”的声势却越来越大。

王阳明虽重视用战争解决南赣问题，但并不把战争视为单纯的军事行为。因为南赣汀漳的“山贼”问题既是军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的是综合治理而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所以，王阳明在南赣推行了一个“系统工程”。

第一，清除内奸，行连坐法。由于已经形成了规模，而且遭受官兵的屡屡镇压，流民首领也有应对措施，收买了不少衙门胥吏，让他们提供情报；同时，和一些城乡居民有经济往来，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所以，王阳明首先是挖出衙门中流民的眼线，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要求向流民提供假情报，颇类“碟中谍”“无间道”的剧情。接着，在城市乡村推行“十家牌法”，居民十家为一“牌”，一家通“匪”，十家连坐。通过这种方法，切断流民的物资供给。又行“保长法”，加强地方治安，防御小股“山贼”。

第二，训练民兵，筹集粮饷。赣州是江西南部重镇，但府库空虚，兵员短缺，历任巡抚都向朝廷请调外地军队，不仅耗时费饷、骚扰地方，而且军队一撤，动荡依旧。王阳明严令所辖八府一州就地招募“胆力出众之士”，得民兵五千，又从卫所军官中挑选武艺出众、有实战经验者，对民兵进行训练。这支民兵被王阳明称为“精兵”，在此后的战斗中起着骨干作用。有兵得有饷，王阳明看准了赣州的两大财源——一为商税，二为盐税，经过反复与朝廷交涉，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军饷。

三、声西击东，首战告捷

当然，这并不是王阳明“系统工程”的全部，只是它的序幕。朝廷也不可能等着王阳明一步一步将“十家牌法”“保长法”以及选练民兵、筹集军费等事项做完后再去“剿贼”，只有不断让朝廷得到“剿贼”捷报，才可能不断得到朝廷的支持。

王阳明在南赣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话是这么说，其实并不易，否则以前的六七任巡抚岂不都是窝囊废？那么，如何破“山中贼”？先向哪方用兵？当时在四省边境的上百股大大小小的“山贼”中，最令官府头痛的主要有：活动在江西南安府与湖广毗邻的横水、桶冈一带的谢志珊、蓝天凤，活动在广东惠州府北部与江西毗邻的浰头一带的池仲容，活动在江西、广东、福建三省结合部被称为“漳南”即漳州南靖地区的詹师富等。

王阳明决定，先向漳南用兵。为什么？这就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战略眼光了。其一，相比于谢志珊、池仲容等部，詹师富部



相对较弱，仗相对好打。其二，王阳明刚到赣州的时候，就见到来自福建的报告，说官军在进攻詹师富部时中了埋伏，请求增调“狼兵”，即广西、湖广的土司兵，等候秋凉再行进讨。而促成了王阳明向福建用兵决心的，正是这份秋后进兵的报告。

既然福建方面请求秋后用兵，王阳明便因势利导，扬言从福建撤兵，待平定横水、桶冈，再行进剿。消息一经传出，横水等处“山贼”纷纷据险设伏，做好迎击官军的准备，福建詹师富等则设宴相庆。但是，正德十二年三月，来到赣州两个月后，王阳明便率领刚刚募集的民兵和部分官军，日夜兼程，进驻福建长汀、上杭，严令各军向分散在各处詹师富部“山贼”发起进攻。詹师富等人猝不及防，纷纷退往福建漳州府南靖县平和乡的象湖山。王阳明指挥官军及民兵，兵分三路，直扑象湖山。战斗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中午，双方死伤惨重。有数千官军受王阳明密遣，由间道从“山贼”的后方发起攻击。“山贼”腹背受敌，溃散而逃，官军乘势追击。到五月，福建“山贼”被杀 2700 余人，被俘 1500 余人，落入山涧深谷丧生者不计其数，另有 4000 多名“山贼”被招抚，安插复业。十年来活动在福建漳州、汀州南部，令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地区不得安宁的“贼首”詹师富，在可塘洞被俘。

这是南赣汀漳巡抚设置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仗，也是王阳明有生以来亲自部署、指挥的第一仗，朝廷没有增调一兵一卒，是完全意义上的反败为胜。当然，败是别人败，胜是王阳明胜，这就更加证明了“阳明子”不仅仅能讲学，能谈学问，而且是军事天才。

王阳明自己也十分兴奋。当时福建南部旱灾，就在王阳明接到前方捷报文书、行将从上杭回师江西时，却连续下了三场大雨。实在是好兆头。幕吏们建议，应将上杭临时行台的大堂取名为“时雨堂”，王阳明欣然同意，不仅写了一篇《时雨堂记》，还连续写了三首《喜雨》诗，其一说：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顺水飞樯来买舶，
绝江喧浪舞渔蓑。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想伏波。长拟
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

还在念念不忘留下“马革裹尸”壮言的汉伏波将军马援，可见，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乃是王阳明一生的追求，是他“学为圣贤”的“初心”。接下来的两个举措，即可看出王阳明做事的风格：第一，整顿军队；第二，扩大权力。

在平定福建“山贼”的战斗中，王阳明进一步发现官军缺乏纪律、机动性差的弱点。所以，乘着战事的间隙，他利用自己刚刚树立起来的威望，以参加这次战斗的军队为试点，进行整顿。

第一，调整编制：每25人编为一“伍”，设“小甲”即伍长；两伍即50人为一“队”，设“总甲”即队长；四队即200人为一“哨”，设“哨长”；两哨即400人为一“营”，设一“营官”及两个“参谋”；三营即1200人为一“阵”，设“偏将”；二阵即2400人为一“军”，设“副将”。

第二，严肃号令：副将可以罚偏将，偏将可以罚营官，营官可以罚哨长，哨长可以罚总甲，总甲可以罚小甲，小甲可以罚



伍众。

这些名堂，都是王阳明少年时在兵书上见到的，所谓伍、队、哨、营、阵、军及小甲、总甲、哨长、营官、偏将、副将等的设置，则是仿照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的方法，也可被视为对现有“卫所制”的整顿。通过整顿，达到“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举动如一，治众如寡”的目的。这个“身”，就是全军统帅王阳明自己。

四、因势利导，用兵南安

捷报到了京师，在兵部尚书王琼力主之下，也在王阳明自己的运作之下，朝廷给了他更大的权力：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王阳明立功了，权力大了，至少有两个人坐不住了。

第一个坐不住的是江西的镇守太监毕真。毕真向朝廷上疏，说南安、赣州本属江西，所以，南赣和江西一样，当由他来“监军”。按当时的惯例，毕真的要求有合理性。但兵部尚书王琼是位有主见的人物，要用王阳明，就要让他有真正的决策权，不能让他人去掣肘。但这话还不能直说。当镇守太监的要求下到兵部处理时，王琼轻描淡写却又不容置疑地说了一条原则：用兵之道，最忌遥控，南赣在南昌千里之外，军情变化万端，如果遇事都要先和南昌的镇守商议，岂不误了大事？镇守太监自然也不愿意因为要揽南赣的权而放弃南昌的权，只得作罢。

第二个坐不住的是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秦金比王阳明大5岁，科举早两科，正德九年以山东左布政使的身份，

出任湖广巡抚。盘踞在江西南安府桶冈一带的流民，时时出没于湖广郴州、桂阳等地。秦金眼看王阳明在漳南立功，下一步当兵指南安，便有些坐不住了，向朝廷建议，调集湖广、江西、广东三省的兵力，进攻桶冈。

经过王阳明半年时间的经营，除了福建的詹师富，江西赣州的“山贼”也平灭了不少，南赣“山贼”主要还有三大股：横水、桶冈、洊头。横水、桶冈位于江西西南部南安府的上犹、大庾、南康三县和湖广东南郴州的桂阳之间的大山之中，南北、东西各约三百里，有多股流民武装，势力最大的是横水的谢志珊、桶冈的蓝天凤，横水、桶冈之间的左溪“山贼”，也势力不小。洊头有上、中、下之分，又称“三洊”，位于广东惠州府的龙川、河源二县北部和江西赣州府龙南县南部交界的九连山区，同样有多股流民武装，最著名的首领为池仲容。

王阳明打算先用兵江西南安府，平定横水、桶冈，再进兵广东洊头。但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批准了湖广巡抚秦金的建议，调集广东、江西、湖广三省驻军，夹攻桶冈“山贼”。秦金的建议和朝廷的批准，令王阳明哭笑不得。

其一，三省夹攻，必须彼此约定日期，同时并举，方能成功。但“兵无定势，谋贵从时”，要三省之兵统一行动，谈何容易；而三省之兵统一行动之时，又未必是最好的用兵之时。其二，横水、桶冈在江西、湖广交界处，最多二省合击即可，根本不需要广东兵马远涉山水。其三，从湖广看，桶冈是“山贼”的咽喉，而横水实为腹心；从江西看，横水仍是腹心，桶冈则为羽翼。所以，所谓三省夹攻之议，在王阳明看来，是既不懂兵法之要，更不知



江西的“贼”情。放着“山贼”腹心的横水不进攻，却汲汲于侧翼的桶冈，即使能形成“三省夹攻”，至少有一路陈兵横水、桶冈之间，腹背受敌。

那怎么办？没关系。如果说苏东坡是文学上“化腐朽为神奇”的高手，王阳明就是军事上“化腐朽为神奇”的天才。既然“三省夹攻”的消息已经传出，军队也在调动，王阳明决定再次因势利导、将计就计，明攻桶冈，暗取横水。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王阳明秘密调动军队，兵分七路，分别向横水及左溪“贼寨”进兵。王阳明自己将行营迁到离横水30里的南康县至坪，就近指挥。此外，挑选了400名身体强壮而有胆量的山民及樵夫，每人携带旗鼓火药，潜入横水附近的高山绝壁之上，等到官军进攻时，张旗擂鼓，鸣炮呐喊，以扰乱“山贼”的斗志。

十月十二日黎明时分，官军在蒙蒙雾雨的掩护之下，向横水“贼寨”发起进攻。流民首领谢志珊等人已经得知官军合击桶冈的情报，不免松懈，睡梦之中被惊醒，闻知官军攻山，急忙组织抵抗，但听得四面八方全是鼓炮之声，军心大乱。横水一破，左溪也随之瓦解。谢志珊等人借着熟悉地形，逃向桶冈。

南赣文武官员自与“山贼”打交道以来，总是提心吊胆；当地官军从来没有打过这样顺利的仗，眼见横水、左溪顷刻而下，士气大振。王阳明下令犒赏三军，就地休整。将领们奇怪了，所谓“兵贵神速”，为何不乘势直取桶冈反倒就地休整？他们相约来到行营，请巡抚指点迷津。

王阳明问明众人的来意，笑道，还是那句话，“兵无定势，谋

贵从时”。“兵贵神速”固为千古真谛，却也不能墨守成规。我军袭取横水，是兵贵神速。但文武之道，须一张一弛。桶冈天险，四周壁立万仞，中盘百余里，连峰参天，深林绝谷，不见天日。虽有锁匙龙、葫芦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处可以出入，却要架栈梯壑，易守难攻。我军若乘全胜之势，兼三日之程，争百里之利，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顿兵于幽谷之中，岂非自处死地？

王阳明对桶冈地形的描述并非虚言。时至今日，当地虽已经济发展、交通发达，还开辟了宏大的旅游区，但要进入“中盘百余里”，仍然不易。

王阳明的一番话，说得众将目瞪口呆。他们在军营滚爬了十几年、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打仗还有这样多的学问。

半个月后，十月二十七日，王阳明领着经过休整的官军及民兵，在桶冈各处隘口附近驻扎。部署停当，王阳明召来在横水被俘的几名流民首领，诱之以利、胁之以威、动之以情，让他们进入桶冈，劝说桶冈流民向官军投降。蓝天凤等桶冈流民首领慑于官军压力，多想出降；谢志珊等横水流民首领却主张凭借天险，与官军周旋。众多在横水被俘又与桶冈有关系的流民也被放了出去，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桶冈的亲戚、朋友传递官军善待民众的信息。是战是降，固然在流民领袖中议论不休，而负责把守各处隘口的流民们也不知所措，都在彷徨观望之中。王阳明派出的密探，已将这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又是一个冬日的雨中黎明，蓝天凤、谢志珊等人还在锁匙龙围绕着是战是降做达旦之争，猛听得四下里喊杀震天，官军趁着



流民们的松懈，以横水被俘的流民为向导，冒雨突破隘口，向锁匙龙合围。蓝天凤等人大惊，拼命抵抗，但挡不住如潮似水的官军。当天午后，桶冈被官军攻破，有 30 多个流民居住点被摧毁，蓝天凤、谢志珊等首领也尽被俘虏。

兴奋之余，王阳明突然有些伤感。所谓惺惺相惜，王阳明对自己的对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命人将横水“山贼”的大首领、自称“征南王”的谢志珊带入行营。这位常常将官军打得一败涂地的“贼魁”，被俘之后雄风犹存。

谢志珊看了看王阳明。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官军奉若神明，把自己打入地狱的新任南赣巡抚，竟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瘦削文人，自己纵横江湖几十年，竟然栽在了他的手上！

王阳明也上上下下打量着谢志珊，问道：你占山为王，对抗朝廷，罪不容诛。但能有如此多的同党为你卖命，倒也不失为英雄。不知所用何术？

谢志珊见王阳明并无讥讽羞辱之意，长叹了一口气：其实并不容易。

如何不易？王阳明问道。

平生见到世上好汉，绝不肯轻易放过，必定想方设法进行罗致。好酒者纵其酒，有难者助其急，坦诚相待，肝胆相照。既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更是有福人先享、有难己先当。如此，则无不归属于我。谢志珊坦诚而不无得意地讲述。

王阳明听了，不觉连连点头。目送着谢志珊被带出行营大堂，王阳明长长地叹了口气。事后，他不止一次用惋惜的口吻对学生

们说到这位谢志珊，并且总要加上一句：“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岂异是哉？”（《年谱一》）如何对待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乃至有福推让，有难先当。

【第七讲】

『破心中贼难』





一、人同此心，攻心为上

平定横水、桶冈，是比平定福建“山贼”更大的胜利。就南赣的大股“山贼”而言，剩下的只有广东浰头的了。由于浰头“山贼”被认为在南赣“山贼”中最为彪悍，最难对付，所以王阳明不但将其放在最后“剿灭”，而且不断进行“招抚”，剿抚并用。

在平定福建詹师富等“山贼”之后，王阳明写了一封入情入理、感人至深的劝降书，对浰头的“山贼”首领进行“攻心”。

这封名为《告谕浰头巢贼》的劝降书中，王阳明先讲明形势，说本院巡抚南赣，专以弭盗安民为职。从到任的那天开始，就不断听说尔等长年以来劫掠乡村、杀害良善，本来打算剿灭。但是近日扫荡漳南贼巢，虽然斩获7000多人，审讯时才知道，最初为恶者不过四五十人，其余多被胁从，不觉怅然。浰头各处，亦当如此。而且，听说尔等之中，亦有大家子弟，应该明白事理，所以不忍遽加以兵。不是因为地势险峻、尔等兵力强盛，而是出于怜悯之心，给尔等留一生路。再强的“贼寇”、再险的“贼巢”，一旦本院进兵，皆当扫平。

在讲明形势之后，王阳明让“巢贼”换位思考：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

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

“盗贼”之名，人人以为耻；遭受劫掠，人人以为恨。所以，若被人骂为盗贼，若被人烧了房子、夺了妻女、劫了财物，肯定极其愤怒，肯定要报此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王阳明以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流民着想：

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

“为官府所迫”“为大户所侵”，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民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最主要的两大因素。王阳明把这两大因素坦诚地向“山贼”们揭示出来，为其开脱或减轻“罪行”。接着，王阳明从三个方面帮助他们解除顾虑：

第一，朝廷用兵，实是迫不得已，好比父母有十子，八人为善，二人为恶，为恶者二人要害为善者八人。为恶者二人不除，为善者八人乃不得生，所以父母才除去二人，此非本心，实属无奈。若二子真心向善，尔等真心归降，就是朝廷赤子，父母喜不自胜，官府怎肯妄加杀戮？

第二，尔等当时为“贼”，是走向死路；今日本院让尔等改恶从善，是指明活路，为何反而不愿走、不敢走？只是因为尔等为贼日久，杀人如儿戏，却不知本院以亲民为政、以爱民为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



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从我言，改恶从善，决不追咎既往之罪。

第三，尔等提心吊胆、辛苦为贼，其实缺衣少食。何不以尔等为贼的勤苦精力，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既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又可以放心游观城市、优游田野，岂似今日担惊受怕，忧苦终身，还有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之忧。

有推心置腹的劝说，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有声色俱厉的斥责，有声泪俱下的警告，王阳明也被自己感动了，说我言已无不尽，我心已无不尽，“兴言至此，不觉泪下”，但何去何从，还是得尔等自己选择。

在王阳明“剿抚并用”的兵威与感召之下，龙川首领卢珂等人、浰头首领黄金巢等人先后归降了官府。王阳明进攻横水时，黄金巢率部下 500 人随征。但是，浰头最大的“贼首”池仲容心存疑虑，派自己的弟弟池仲安到王阳明在南康的行营表示归附之意，其实是想探听官军的动向。王阳明正担心浰头“山贼”趁官军东进时制造事端，见池仲安来到，不禁大喜，一面将池仲安滞留军中，使池仲容有所顾忌，一面督军迅速攻破桶冈。

池仲容一直在等池仲安的消息，但等来的却是横水、左溪、桶冈被官军攻破。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唇亡齿寒、兔死狐悲。20 年来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闹腾，除了官府的腐败，还在于横水、桶冈以及漳南各处的相互策应。如今各个山头相继被铲平，浰头难以独存。池仲容一面再次派人去赣州打探消息，以便摸清官府的真实意图；一面暗中布置，以防备官军故计重施，偷袭浰头。但是，面对王阳明强大的军事压力，且归降的黄金巢、卢珂

等人也得到了官府的宽待，在池仲容一派的内部，主张向官府投降的力量逐渐占据了上风。

在部众的劝说下，池仲容带着众多首领及护卫一行 93 人，来到赣州请降。为防万一，池仲容将众人安置在城外的演兵场，自己只带领几个贴身护卫进城，拜见王阳明。王阳明初闻池仲容到了赣州，大喜。待听说池仲容将余人安置在教场，只带数人进城，不觉暗暗称奇。几个月来，他一直对横水谢志珊有特殊的好感，这池仲容看来也非等闲之辈。“山贼”之中倒真是藏龙卧虎，难怪官军屡战屡败。

二、挥之不去的不安

对于占山称王 20 年的池容仲，王阳明要先挫挫他的锐气，所以立即施以颜色，说你既然诚心来降，又如何心存疑虑？你的朋友都是我的子民，为何将他们滞留城外？池仲容没想到王阳明一见面就责问此事，顿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是，王阳明适可而止，随即好言安抚，肯定他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池仲容惊魂未定，将众人召进城来，王阳明一一予以安抚，安排在赣州祥符宫住下，以便观看年节花灯。

祥符宫位于今赣州老城区，初名紫极宫，始建于唐代，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改名为大中祥符宫，是明代赣州城内最为壮观的建筑群。王阳明派了几名吏员，白天陪同池仲容等在街市游览，晚上教其礼节，实则观察众人的行为。



赣州文庙（旧称祥符宫）

池仲容等人本来提心吊胆地进入赣州，没想到受如此礼遇，不禁喜出望外，原有的警戒之心也渐渐淡化。但梨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家。过了两天，众人觉得在这赣州终不如在浚头痛快，便向王阳明辞行。说是浚头有几千弟兄，如果无人节制，恐怕生出乱子。理由充分，但也是王阳明最忌讳的。池仲容等人不回浚头，群龙无首，“山贼”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一旦回去，却是虎归深山、龙回大海，难以控制。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之下，一个王阳明自己也认为是过于狠毒的计划开始酝酿并实施。

王阳明不急不慢对池仲容等人说道：眼看就是年节，从赣州到浚头，少说得八九日路程，即使今日动身，年内也到不了家。今年除夕赣州城内张灯结彩，尔等久居深山，哪里见过这番热

闹？看过灯后再回浚头，也不为迟。本院也是第一次在赣州过年，与尔等共欢。

所谓人到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加上巡抚盛情，池仲容等人只得继续在赣州住下。这年除夕，赣州的花灯也确实别具特色。入夜之后，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灯笼将整座赣州城照得通明，大街小巷，挤满了看灯的男女老幼，人头攒动，热闹非常。池仲容带来的那班头领，久居深山大谷，哪里看过这种场面，一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唯有池仲容，仍是心有疑虑。

除夕之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便是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一，池仲容带着头领们来巡抚衙门向王阳明拜年，再次提出要返回浚头。年也过了，灯也看了，王阳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表示要在初三日大摆宴席于祥符宫，为他们返回浚头饯行。

初二日，祥符宫内沸沸扬扬，王阳明命人在此杀猪宰羊，安排初三日的宴会。浚头的首领们心怀感激，也忙里忙外穷折腾。忙了一天，池仲容和同伴们早早入睡，准备明日宴会过后启程。然而，就在他们进入梦乡之后，巡抚衙门的智囊龙光，带着甲士潜入了祥符宫。这些天来，他们趁着池仲容等人外出之际，早已熟悉了浚头首领们在祥符宫的住处。所以，不需要灯火，用不着搜寻，甲士们按照事先的布置，分头冲进客房，举刀便剁。池仲容和同伴们纵横江湖 20 年，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阳明此举，应该是违背了自己的本心，其中当然有诸多的无奈。池仲容原是龙川县大户，因被仇家所害，不满官府的处置，一怒之下，与其弟池仲宁、池仲安聚起家丁庄户，杀了仇家 11 口，遂招集亡命，占山为王，自号“金龙霸王”，造印封官，屡败



官军，又胁迫远近居民，壮者收为部下，富者借贷银米，若有违抗，则行杀戮。为“贼”20年，要幡然改变，实属不易。

当然，虽然有各种理由，王阳明用此等手段对池仲容等人进行处置，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非议。王门弟子所修《阳明年谱》对此做了一些弥补性的掩盖，说王阳明命龙光带甲士乘夜杀死池仲容等人后，心中自责，“日已过未刻，不食，大眩晕，呕吐”。而王阳明在给朝廷的报捷文书中，则将乘夜暗杀改为白天捕杀，可见内心的不安。这种不安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因为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半年前，王阳明在《告谕浚头巢贼》中曾经许诺，决不杀降，更不滥杀无辜，否则，冥冥中自有还报，殃及子孙。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初七日，王阳明亲自指挥已在龙南等地集结的官军，直扑上、中、下三浚。当年四月，所有的战斗结束，江西、福建、广东、湖广边境的“山贼”悉数平灭，此时距离王阳明受命为南赣汀漳巡抚仅仅一年半的时间。

三、生存乃第一要务

正德十三年正月，在率兵抵达江西龙南，准备对广东浚头“山贼”发起攻击之前，王阳明在给弟子杨骥、薛侃的信中，说到了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杨骥）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

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与杨仕德薛尚谦书》）

这是王阳明第一次向人们同时提出两个并列的概念：“山中贼”和“心中贼”，时间是王阳明到赣州的一年之后。王阳明说，他上年十月也就是出征横水的时候，就已经在给杨骥的信中提出了“山中贼”和“心中贼”，只是这封书信没被收录在王阳明的集子中。

这两个概念的同时提出，自然让人们认为这个“心中贼”存在于“山中贼”的“心中”，只有不但在军事上荡平“山贼”，同时清除“山贼”们心中的“贼”，让他们洗心革面，才有可能真正带来一方的安宁。但是，这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的“心中贼”的全部含义，在王阳明看来，“心中贼”不仅存在于“山中贼”的心中，而且存在于诸贤、存在于大丈夫、存在于所有人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心中。王阳明在答复弟子叶宗宪时的一番话，得罪了无数人：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不追求“天理”，不在他日后所提出的“良知”二字上下功夫，只是一味地追求知识、才干，那么知识越



多、才干越大，良知越被泯灭，“人欲”即“心中贼”也就越盛。

正德十三年四月，浯头一带的“山贼”被铲除，地方大抵安静下来。但也正是这股被认为最为“凶悍”的广东浯头“山贼”，给王阳明的内心以更加深刻的感触。在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中，拒险而守的“山贼”，坠崖而亡者不算，被杀 291 人，而进攻官军仅有 14 人死亡。可见，所谓“山贼”，其实并没有多少战斗力，或者说，并没有进行殊死搏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拖家带口的流民。被俘的流民共 2000 多人，平均每人只有“赃衣”一件、“赃纱”不到一两，每 86 人合有“赃银”一两，20 人合有“赃钱”一文，这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诉求其实只有一个，生存。

可见，“山中贼”的“心中贼”不但涉及“善念”与“恶念”，更涉及生活的出路。通过官军的围剿，通过王阳明的“攻心”，流民归附官府，“改恶从善”，但如果生计没有保障，仍然不得安宁。这是其一。其二，漳南、浯头及横水、左溪、桶冈等地所以成为“贼巢”，也是因为地处大山之中，远离府县控制所致。

所以，南赣地区要恢复秩序，要清除南赣“山中贼”的“心中贼”，不但要用军事力量打击，更要有善后措施保障。要加强官府的管理，更要给流民合理的生存空间，而这正是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正德十二年五月，王阳明平定漳南詹师富部后，漳州知府钟湘通过福建按察司兵备僉事胡璉，呈送所属南靖县几位县学秀才的建议。秀才们在建议书中说，南靖县的县治僻在一隅，与本县所辖的平和、卢溪、长乐等地相距遥远，由于官府鞭长莫及，平和等地成为“盗贼”的渊藪。如果乘“山贼”初平，在本县的河头

增设县治，控制上述地区，则“盗贼”不易死灰复燃，地方也可永保平安。同县的“义民”曾敦立等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并领着南靖知县去河头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是，河头的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势宽平，周围 600 余丈，西接广东饶平，北联三团、卢溪，堪以建立县治。

当地“秀才”“义民”的建议当然是为着自身的利益，但地方安定无论是对当地居民还是对官府，都有好处；归附官府的流民更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应给他们合法的身份和生存的出路。这个设立县治的建议和王阳明的地方治理思路不谋而合，所以，王阳明立即上疏朝廷，反复陈述在河头增设县治的理由，并特别提出：

臣观河头形势，实系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而遗孽残党，亦宁无有逃遁山谷者？旧因县治不立，征剿之后，浸复归据旧巢，乱乱相承，皆原于此。今诚于其地开设县治，正所谓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不然，不过年余，必将复起。（《添设清平县治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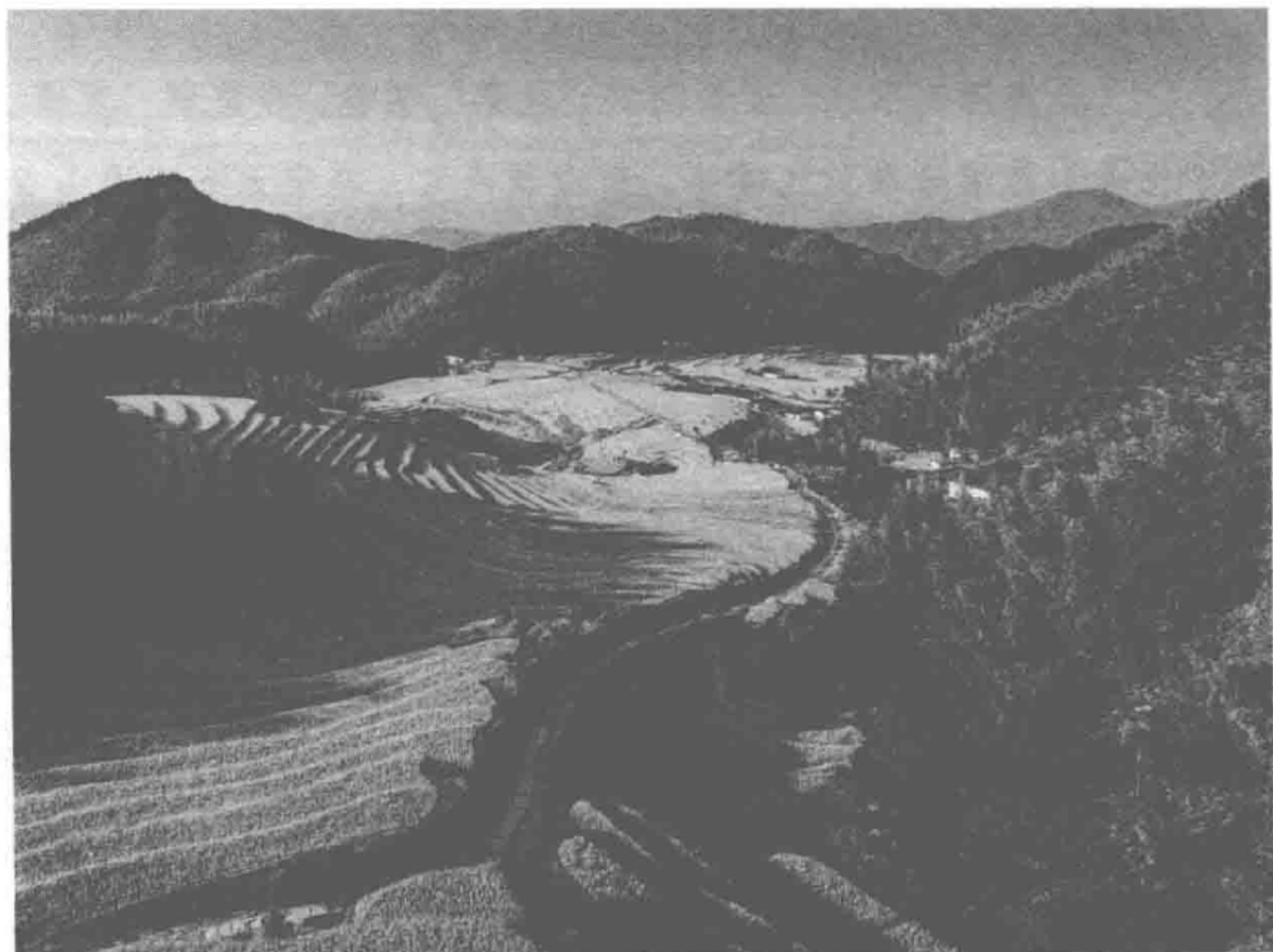
为了化“盗贼”为“善良”，为了除去“山中贼”的“心中贼”，设立县治乃不二之途。朝廷怕的就是“山贼”死灰复燃，何况这平“贼”之后即在该地设县立府以行控制，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常用的办法，就在几年前，江西的万年、安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设立了县治。所以，王阳明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批



准。两年之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一座新县城在福建南部拔地而起，取了一个吉祥的县名——“平和”。

有了在福建增设平和县的经验，王阳明便照此办理，平定横水、桶冈之后，在江西上犹县崇义里的横水，设崇义县县治；平定浯头之后，增设和平县。

平和、崇义、和平三县的设置，加强了明政府对江西、广东、湖广、福建接壤地区的统治，使这一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变。对于当地参与“匪乱”的居民，允许回原籍仍习旧业；对于外地流民，称之为“新民”，允许就地入籍，给予生存条件，但同时得向官府服役纳税，成为合法的编户齐民。



江西崇义县梯田

四、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

破“山中贼”靠的是才干，是“能臣”干的事情；破“心中贼”就不仅仅要靠才干，还主要靠道德和学问，这才是“圣贤”的事业。王阳明从小立志为圣贤，南赣便成为其实践贤圣道理的“试验田”。给予民众生存空间是“破心中贼”，是“亲民”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全面恢复社学，同时兴建书院，对民众进行教化，并且用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规范其行为。

“社”本为土地神，在《周礼》中，“社”又是基层组织，以25家为“社”。明太祖洪武时期，命各级官员在官学之外，仿照古代家塾、党庠，在乡村建立“社学”即基层学校，聘请教师教育民间子弟，读明太祖的《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从社学的性质看，其带有官民合资兴建的特点，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学生衣食自理，教师馆资由官府负担。虽然一直到王阳明时代，明朝政府都在不断督促各地官府兴办社学，但所谓社学，大抵名存而实亡。

王阳明行政的风格是“亲民”“较真”，只要认为对民众、对国家有利，便竭尽全力而为。办社学需要场所，新建校舍势必增加农民负担，王阳明命将境内各种“淫祠”，即没有经过官府批准的祭祀场所改建社学，既是移风易俗，又解决了社学的校舍问题。办社学需要教师，南安、赣州本地不乏饱学有识之士，追随王阳明到赣州的弟子中，更有不少品学兼优的现成老师。

不仅如此，王阳明以提督军务兼理巡抚的身份，行牌福建布



政司，礼聘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舒芬来赣州主持办学。舒芬是江西进贤人，正德十二年状元，因为上疏抨击皇帝而被贬谪到福建市舶司为副提举。王阳明对他的评价是：“志行高古，学问深醇，直道不能趋时，长才足以济用。”（《礼取副提举舒芬牌》）王阳明礼聘舒芬，既是看重舒芬的人品与学问，也是以自己的行为做出尊师重教的表率。养成尊师重道的风尚，是改变当地社会风气的重要一步。

王阳明亲自写了一篇《训蒙大意》，颁发给社学教师，对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年谱一》）

教育方针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看似老生常谈，却是做人的根本。教育方法反映出王阳明自己的体会，歌诗、习礼、读书三步并举，特别强调“寓教于乐”的重要性，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其实，当年孔子教育学生，已经如此。但是，秦汉大一统以后，特别是科举成为制度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变得越来越功利，读书成了进官场的敲门砖，学校成了科举附属。从这个角度来说，科举成为制度后，中国教育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

当然，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所说的“诱之以歌诗”“导之以习礼”“讽之以读书”的递进，主要是针对“童子”，即儿童教

育，所以和在龙场、贵阳的“八字教”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是不一样的。

在读宋朝历史时，王阳明对程颐责备哲宗一事应该有深刻的感触。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以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给小皇帝讲课。为什么选程颐？因为程颐是当时最著名的大儒。但不得不说，司马光选错了人，因为程颐固然学问大，却不是“童蒙教育”专家，不懂得寓教于乐的道理。一次，刚满10岁的哲宗在课间折了一根柳条，学着骑马的样子，感觉很是威风。这本是小孩的天性，但程颐见了大不高兴，当着宫女、太监的面，将小皇帝责备了一番：如今正是春天，万物生长，皇上怎能无故摧残生命？皇上今日不爱惜草木，日后亲政，又怎能爱惜百姓？

这番话道理不错，加上又是教导皇帝，所以后来为程颐弟子广为传颂。但是，程颐忽略了一个常识，四个字：“入情入理”。任何“理”，前提都是“情”。如果有悖于“情”，任何“理”都不成其为理，都没有理。

对于程颐的这番斥责，小皇帝无法接受。他抛下柳条，转身便走。司马光、苏轼听到这件事情连连跺脚：君主不愿意接近儒士，就是因为有程颐这样的腐儒！但他们却没有检讨自己选人的错误。

王阳明赞成司马光、苏轼的看法。如果程颐因势利导，与小皇帝一起游戏，再相机劝戒，效果不是更好吗？但如果是那样，就不是程颐而是苏东坡了。而王阳明自己更是在祖父的鼓励下，好动、好冒险、好发奇想，如果遇上一位整日板着面孔、严加督责的教师，哪里会有今日的阳明子？



当然，光有教化是改变不了社会风气的，还必须要有规范。西魏苏绰曾经向宇文泰灌输一个观点：“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周书·苏绰传》）所谓“亲民”，一是物质保障，二是思想教化。而教化又应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爱民如慈父”；第二“训民如严师”。只有让民众严格守法，才是真正的爱民。看似宽大，纵容民众，然后对其绳之以法，那不是爱民，而是害民。

为此，王阳明推出全面社会改革的措施。一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献形成了：《南赣乡约》。《乡约》一共有15条，是王阳明在“十家牌法”的基础上推行的又一社会改革措施。如果说“十家牌法”是通过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督进行管理，那么《南赣乡约》则是通过民众的自治，再辅之以国家的法律，以实现社会的稳定。

经过王阳明的这番治理，南赣巡抚辖区逐渐安定下来，至少在此后的几百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如果说“功业”，这才是王阳明真正的功业，不是杀了多少流民，而是安置了多少流民，改变了多少当地的陋习。今日江西赣州的民众，仍然津津乐道当年王阳明对南赣的治理，甚至认为，今日赣州的民风纯朴，归功于王阳明当日的治理。

五、王门弟子

所谓“龙行云、虎行风”，跟随王阳明来赣州的，不仅有巡抚都御史赴任时按朝廷规制所配备的随员，更有大批和巡抚都御史这个职务完全无关但在学术上崇拜王阳明的人，他们大抵都成了

王阳明的弟子。

《阳明年谱》列出了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姓名：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薛俊、杨骥、郭治、周仲、周冲、周魁、郭持平、刘道、袁梦麟、王舜鹏、王学益、余光、黄槐密、黄荃、吴论、陈稷刘、鲁扶馘、吴鹤、薛侨、薛宗铨、欧阳昱，共26人。但《年谱》上没有列姓名的应该更多，如刘阳、陈九洲等人。王阳明当年在龙场的弟子冀元亨，曾在王阳明从龙场赴任庐陵知县时追随到吉安，在王阳明北上时返回常德老家，后听说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也赶来赣州相聚。设在赣州的巡抚衙门，又成了讲求功夫、切磋学问的书院。而他们，则是王阳明在南赣推行教化的重要力量。他们以“体制外”的身份，帮助王阳明干“体制内”的事情。

在赣州任南赣巡抚，比在北京任吏部员外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行事要方便得多。巡抚是封疆大吏，节制一方，司、道、府、县都是下属，有职有权，扩大讲学场所、调拨钱粮经费均比较容易。特别是南赣巡抚，远离江西省府，本省的镇守太监、巡按御史等也无法进行干预。

聚集在赣州的王门弟子主要来自江西、广东二省，王门江右学派和粤闽学派的主要人物也开始在赣州亮相了。

在上述名单中的江西籍弟子，欧阳德、何廷仁、黄弘纲是佼佼者。

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正德十一年，刚满20岁的欧阳德就在竞争激烈的江西乡试中了举人，正准备赴京参加正德十二年的会试，听说王阳明巡抚南赣，会试不去了，赶



往赣州，拜王阳明为师，成了王门中最年轻而且有功名的弟子之一，被王阳明称为“小秀才”。从正德十二年开始，欧阳德在王阳明门下五六年，直到王阳明离开江西回浙江后，才参加了嘉靖二年（1523年）的会试，并且中了进士。嘉靖时，欧阳德先后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太常寺卿掌北京国子监祭酒事，专以讲学为事，致有“南野门人半天下”之说，成为王学有力的传播者。

何廷仁字性之，号善山；黄弘纲字正之，号洛村。二人都是江西雩都县（今江西于都）人。

何廷仁从小倾慕陈献章的学说，想投入白沙门下。但他13岁的时修，陈献章去世了。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巡抚南赣，机不可失，何廷仁对家人说：我恨不得为白沙弟子，如今阳明先生来了，不能再失去机会。当时正值王阳明驻军南康，组织对桶冈、横水“山贼”的清剿，何廷仁赶到南康，投入王门。后来又追随王阳明回浙江，以阐述、传播王学为己任。虽然嘉靖元年何廷仁已在江西中举，但直到嘉靖二十年才出任新会知县。

黄弘纲与欧阳德同年中举，也是因为王阳明到赣州而放弃会试。此后，随王阳明在赣州、吉安、南昌，又追随入浙。王阳明死后，黄弘纲在王家居守三年，安排后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才出任汀州推官。

王阳明在赣州的三年，公务繁忙，有学子前来问学，先让学问根基较深、悟性较高的弟子执教，称为“接引”，再亲自接见。在江西期间，被王阳明列入“高第”而有资格进行“接引”的弟子，有广东揭阳籍的薛侃、江西新建籍的魏良器，以及何廷仁和黄弘纲。尤其是何廷仁、黄弘纲，不但在王门的时期长，而且心

无旁骛。

后来人们提及王门弟子，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之说，钱为钱德洪，王为王畿，何、黄即何廷仁和黄弘纲。在江西赣州时期，王门主要的“接引师”是何廷仁和黄弘纲；在浙江绍兴时期，王门主要的“接引师”是钱德洪和王畿。

王阳明在赣州期间投入王门或准备投入王门的江西籍弟子中，还有两位后来名气更大的没有被《年谱》列入，他们是邹守益和罗洪先。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可见江西籍弟子在王门中的地位。又说：“姚江之学（即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东廓”为安福邹守益，“念庵”为吉水罗洪先，“两峰”为永丰聂豹，“双江”为安福刘文敏，全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们既是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在整个明代，也都算得上是著名的学者。

六、徐爱的贡献

孔子讲学，有《论语》传世；朱子讲学，有《朱子语类》流行，又与吕祖谦编《近思录》，传播周敦颐、张载及二程的思想。王阳明从小立志要“学为圣贤”，由于“事功”的推动，王阳明的“学术”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王阳明固然逐渐以“圣人”自居，弟子一入王门，便也自认为是入了“圣门”。既然是“圣门”，便应该和孔子、朱子那样，有师门训示录。作为王门大弟子，徐爱做出表率，仿照《论语》，用问答的方式将自己向老师请教学问及老



师的解答记录下来，编成了一卷《传习录》。

在序文中，徐爱说明了自己编《传习录》的目的：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传习录（上）》）

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取意《论语》中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徐爱编《传习录》，则取意《论语》中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传不习乎”的教诲用于编撰老师语录，徐爱可以说是有心人，老师的教诲，不能仅是聆听，听了还要复习，要复习就要有记录文字，《传习录》正是师门教诲的记录。

在王门弟子中，记载并整理师门语录的并非只有徐爱一人，陆澄也在着手干同样的事情。王阳明开始对此事表示反对：古代圣贤教人，如同医生用药，必须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下药或轻或重。如果不问青红皂白，死守药方，那就不是救人而是杀人了。我对弟子们的训导，也是因人因时而异，有感而发，当时就未必得以深思熟虑，何况时过境迁，事情变化无常，如果编成语录，

作为教条，岂不害人？

王阳明对“语录”的认识可以说有独到之处，其中也许包含着对《朱子语类》的不满。但是，因此而否定编纂“语录”的需要，却不无片面，这也正是“有感而发”的弊病。

王阳明的这个看法，很多弟子都知道。有人得知徐爱仍在编录，多相规劝。这些规劝有的是出于对师训的恪守，有的则不免带有讥讽的成分。但徐爱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同门师兄弟说：如果因为先生有“语录”易成“教条”的话，便不再收集、编录先生的训导，那倒反而失去了先生的本意。当年孔子曾对子贡说：我不想多说话。但没过几天，他却告诉别人：我和颜回谈论了一整天。这件事情你们可听说过？孔子不是自相矛盾吗？徐爱继续解释：其实孔子并不是自相矛盾。子贡为人聪明机敏，善于谈吐，想在语言上追求为圣之道。所以孔子用不说话来提醒他，让他自己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师门的精神。颜回对师门的教诲却是心领神会，但不善言辞，所以孔子和他讨论整天，让他将自己的体会表述出来。所以，孔子对子贡不说话，话却不能算少；与颜回讨论整天，话也不能算多。

这段人人都熟知但并不在意的典故，经徐爱一解释、一发挥，成了一番发人深省的道理。当然，徐爱对编纂语录的作用也有自己的认识。他在《传习录》的序文中说：如果人们对先生的教诲只是入耳出口，不去认真体会，不去身体力行，那我编这《传习录》不但没有效果，可能反而成了师门的罪人。我所希望的是人人都以师门的精神去学习师门的教诲，得之于言表，行之于实践。如果是这样，我编纂《传习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其实，从王阳明的内心来说，对于徐爱编《传习录》还是支持的。如果没有《论语》，孔子的思想如何传播？如果没有类似于《传习录》的语录传世，自己的学说如何传播？难道真的放弃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字传播，却停留在原始的口耳相传或书信往返？

正德十三年八月，薛侃在赣州刻印了由徐爱整理的《传习录》，但整理人徐爱一年前已经去世。徐爱在正德十一年为南京工部郎中时，回家乡余姚省亲，第二年即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病逝。据传徐爱曾经游过衡山，并在衡山做了一梦，梦见一位老和尚拍着自己的肩膀说：“尔与颜子同德亦同寿。”说罢不见踪影。徐爱从梦中惊醒，十分诧异。

王阳明时常对人说，徐爱就是我的颜回。没想到徐爱果然和颜回一样，在年仅 31 岁时病死。得知徐爱病逝的消息，王阳明不胜悲伤：徐爱一死，我的学说就更加孤立无助了，希望陆澄有所继承。徐爱死后，接着编《传习录》的就是陆澄，以及薛侃、钱德洪等人。

就在王阳明对南赣进行“综合治理”，并且在公务之余与学生相与讲学之际，江西省城南昌却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而这场大变，则是由统治者心中的“心中贼”造成的。

【第八讲】

宁府之变



一、几代人的恩怨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间，采取各种措施，建立各种制度，希望朱明王朝千秋万代。为了千秋万代，明太祖废除了存在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为了千秋万代，明太祖把自己20多个儿子封到各地为藩王。废除宰相制，是担心有人取而代之；分封诸王，是一旦朝中出了“奸臣”，皇帝管不住，藩王可以起兵“勤王”、起兵“靖难”，所以每个王府都有军队。

由于太子朱标死得早，明太祖朱元璋把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明太祖去世后，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感觉叔叔们的势力太大，采纳黄子澄、齐泰等人的主意，开始裁革王府的军队，因而引起诸王的不满，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更以此为借口，起兵“靖难”，说是朝中出了奸臣，破坏“祖制”。经过几年的“靖难之役”，朱棣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庙号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永乐皇帝，建文帝则下落不明。

燕王朱棣能够“靖难”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拥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而这支军队本来隶属于宁王朱权。朱权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封地在大宁即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拥兵8万，兵车6千，所属汉蒙骑兵骁勇善战。当时有一个说法：燕王善谋、宁王善战，其实并非宁王本人善战，而是他的军队善战。燕王朱棣起兵时，将宁王朱权挟持到北平，朱权麾下精锐成了朱棣夺取皇位的重要力量，朱棣发布的文告也有不少出于朱权之手。

为了安抚朱权，朱棣许以事成平分天下。夺取皇位之后，朱棣既不愿兑现也不可能兑现诺言，宁王更明白所谓平分天下的不现实，便想找个好地方享受生活，提出去苏州或杭州。但是，哥哥朱棣借口苏杭风气奢靡，将朱权安置在了南昌。从此，宁王府由大宁迁至南昌。

从这一代人的恩怨来说，成祖朱棣及其子孙应该是欠了宁王府一笔债。

100年过去。宁王之位传到了朱宸濠，这是第四代宁王；皇位传到了朱厚照，从朱棣开始，这是第七代皇帝。如果朱厚照雄才大略，或者励精图治，退一步说，不那么荒唐，不那么胡闹，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恰恰皇帝朱厚照是位荒唐胡闹的皇帝，宁王朱宸濠又是一位自视甚高也确实有些本事的宁王。于是宁王有了想法：既然你的祖宗可以以藩王夺皇位，我也同样可以以藩王夺皇位。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战端一开，民众要遭受多大的苦难？当然，野心家从来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民众的苦难与生死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损耗”。

为了等待机会取而代之，宁王朱宸濠逐渐培育了三股力量：一、王府护卫。按明太祖的规定，王府都设有一到三个护卫，每个护卫5000余人，既是王府的卫队，也可在朝廷发生“奸臣”乱政时起兵“靖难”。当年成祖起兵，“护卫”是基本力量。但做了皇帝之后，担心他人效法，所以逐步裁减各王府护卫。宸濠要图大事，这护卫自然是不能少的，于是通过各种手段，恢复了护卫。二、江湖亡命。宸濠命人联络长期在鄱阳湖为盗的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人，让其招募渔夫樵父、散兵游勇，以部伍法进



行管理，打造一支可以战斗的水军。三、文人幕僚。新建籍退休都御史李士实、安福籍举人刘养正，都是不甘于人下的读书人，他们帮助宸濠联络党羽，打击和排斥不肯依附的地方官员。

一场朱氏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宁王府的各种动态，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北京。有位名叫萧淮的御史上疏，建议朝廷早做处置，将宸濠逮捕进京。疏至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认为宁王“反状”不明，不宜过激，为了防患于未然，拟旨革除宁王府护卫。这份由内阁起草、以正德皇帝名义发出的敕旨说：宁府之事，关系宗社大计，“朕念亲亲，不忍加兵，特遣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往谕，革其护卫”（《阳明年谱二》）。

朝廷关注宁王府，宁王府也在侦察朝廷的动静。负责在京打探消息的宁王府间谍林华，知道有御史上疏建议朝廷将宸濠逮捕进京，却不知内阁拟旨是警告宁王、革除护卫。当然，一旦护卫革除，宁王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赖义一行奉旨出京，北京街头议论纷纷，都说要将宁王押解赴京。林华急了，昼夜南奔，要抢在朝廷使者之前赶回南昌，报告其在北京得到的并不准确的情报。

林华回到南昌报信的这天，是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这天是宁王朱宸濠的41岁生日，在南昌的江西官员，从中央派驻的镇守中官、巡抚、巡按，到江西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长官，以及南昌府，南昌、新建二县的官员，先后到宁王府祝寿，宁王府喜气洋洋。但是，林华从北京带来的消息，特别是听说派来的使者中有驸马都尉崔元，宸濠大吃一惊。因为明朝开国以来的惯例，是只有对犯罪宗室抄解家属时，才派遣驸马。

宸濠召集谋士商议，决定立即起事，不能坐以待毙。

第二天，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府大摆宴席，回请昨天前来祝贺的江西官员。这天来到宁王府赴宴的，以镇守太监王弘、巡抚都御史孙燧为首，包括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江西布政使梁宸、胡濂，参政王纶、刘斐、程杲，参议杨学礼、许效濂，江西按察使杨璋，副使许逵、唐锦、贺锐，佥事师夔、潘鹏、赖凤，江西都司都指挥许清、马骥、白昂、郑文等。凡中央派驻南昌及在南昌的江西三司长官，以及南昌府，南昌、新建二县的长官，都至宁王府赴宴，并且再次向寿星表示祝贺。等众官到齐，几百名带刀武士在鄱阳湖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人的统领下，封锁了所有通道，将众官员团团围住。众官惊疑不定，却见宁王朱宸濠满脸杀气，出现在众人面前。

宸濠将官员们逐个扫视了一遍，高声说道：众官听了！孝宗皇帝本无子嗣，宦官李广将民家儿子抱入皇宫，伪称柏妃所生。孝宗皇帝为其所骗，将此子立为太子，其后继承了皇位。这个伪皇子就是当今的皇上。我太祖、太宗得不到亲生骨肉的祭祀已经14年了。我奉太后密诏，起兵讨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宸濠所说奉太后密诏，纯属胡扯。但关于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身世，倒真是众说纷纭。而这个众说纷纭，源自皇族对事实真相的隐瞒。朱厚照出生时，宫中传出消息，说是皇后张氏所生。这就有疑问了。因为张皇后入宫多年未育，人们正怀疑她是否有生育能力，而且压根儿就没听说她什么时候怀孕了，怎么凭空就生了个儿子？后来张皇后真的怀了孕，尽管这个儿子不久夭折，毕竟证明皇后是能生育的。于是宫中又传出消息，说朱厚照本是柏



妃所生，只是因为皇后将朱厚照视为己出，所以说是自己所生。你自己出尔反尔，不说真话，所以就怨不得“关心政治”的老百姓说三道四，朱厚照的身世也成了一桩迷案，至今没有定论。

虽然官场、民间都在传说宁王有异谋，然而一旦宁王真把阴谋变成事实，把30年前的旧案作为起兵的托词，官员全都愕然，呆若木鸡。江西巡抚孙燧首先清醒过来，要求查看所谓密诏，左右武士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按察副使许逵从人群中冲出，要救孙燧，也被武士按住。宁王一不做二不休，命将二人立即斩首。其余人见反抗无效，统统被迫“从逆”。其中最倒霉的当数江西按察使杨璟，本为岭北道副使，追随王阳明平定南赣“山贼”，因功升任江西按察使，才到南昌不久，便稀里糊涂成了“叛逆”。

被宁王所杀的江西巡抚孙燧，和王阳明同为弘治五年浙江乡试的举人。有一传说，说那年浙江乡试，考生进场之后，有“夜半巡场者”即巡夜的吏卒隐隐约约见到两个“巨人”，一服红、一服绿，东西相向而立，大声说道：“三人好做事！”当时不知所言何事。后来宁王事发，这一次浙江乡试的举人，有三人和平叛有关：胡世宁为江西按察使时，不断向朝廷报告宁府的动向，要求朝廷削其护卫；孙燧在宁王发难时是江西巡抚，率先抗争被杀；最终平定宁王之乱的，是王阳明。

二、兵不厌诈

南昌发生变故的这天，王阳明正在前往南昌的官船之上。

前些日子，王阳明接到家书，说是祖母病重，老人希望在临

终前能够见到孙子。为此，王阳明多次上疏，提出退休的要求。但是，王阳明没有等来朝廷的批复，却等来了让其往福建勘处兵变善后事宜的命令。

兵部的命令六月初五日到赣州，王阳明六月初九启程，乘船顺赣江而下。既然兵变已经平息，善后便不必太过着急。王阳明拟经南昌下鄱阳湖，经信江，先往绍兴，看望祖母和父亲，再往福建。这也是30年前他在南昌完婚之后，经上饶回余姚的路线。

六月十五日，船至丰城县界黄土脑。丰城有位浙江宁波籍的吏员向王阳明通报了南昌有变的消息。接着，丰城知县证实了此事，并说有传言宸濠杀了巡抚、副使，控制了南昌的官员，并且派人沿江而上，邀击王阳明。虽然王阳明对宁王的所作所为早有警觉，但猛然听说宁王已经杀了孙燧、许逵，在南昌和朝廷分庭抗礼，也不免大吃一惊。他往福建戡平兵变，属于公事，已经通告江西、福建二省和宁王府。宁王根据王阳明的行程，派人沿途截杀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情紧急，王阳明与同行参谋雷济、萧禹等人商议，丰城地方狭小，兵马粮饷无法筹集，而且离南昌不过百里之遥，宸濠兵马朝发夕至，遂决定返回吉安，调集军马，与宸濠周旋。

王阳明命船夫将官船靠近一条渔舟，自己和雷济等人弃官船、上渔舟，其余人等在官船虚张声势。渔舟逆水向南急驶而去，官船则缓缓而行，至夜更大张灯火。事后，王阳明的幕僚龙光向阳明弟子钱德洪说起当时的情形：

时师闻变，返风回舟。濠追兵将及，师欲易舟潜遁，顾



夫人诸、公子正宪在舟。夫人手提剑别师曰：“公速去，毋为妾母子忧。脱有急，吾恃此以自卫尔！”

原来，和王阳明一同从赣州乘船而下的，除了参谋雷济、萧禹、龙光等人之外，还有王阳明的妻子诸氏、养子正宪。而此时的诸氏夫人，也表现出女中豪侠的胆气。

王阳明的官船并没有被宸濠的护卫追上，王阳明等人乘坐的渔舟，则在当天深夜到了临江府（今江西樟树）。临江知府戴德孺来见，请教方略。王阳明沉思片刻，屈指说道：为宁王计，若出上策，应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如此则国家危矣。若出中策，当直取南京，如此则大江南北受其祸害。若出下策，盘踞江西省城，如此则为害较小，勤王之事也较易。这既是王阳明个人的看法，也是和雷济等人商议的共同认识。

告别戴德孺，船过新淦（今江西新干），王阳明的座船在赣江江面遇上闻讯前来接应的吉安知府伍文定的船队。伍文定比王阳明大两岁，是同一年的进士，虽然是读书人，却从小练习武艺，臂力过人。一年多前，伍文定曾经随王阳明征讨横水、桶冈的“山贼”，今日在赣江江面相见，都是感慨万分。

伍文定护卫着王阳明，一同来到吉安，部署平叛。十年前，王阳明曾在吉安府治所在地庐陵县做了半年知县，造福一方。这些年来，王阳明在北京、滁州、南京、赣州讲学，吉安的读书人有不少已经投入王门，经过他们不无张扬的传说，特别是王阳明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平灭福建、江西、广东、湖广四省“作乱”几十年之“巨寇”，在吉安、江西，在全国的百姓心中，王阳明已

经不是人而是神。

兵不厌诈，王阳明再一次展示出他行事的特点，即“用心”。此时将此“心”放在宁王身上，把年轻时学来的阴谋诡计全用上了——两个字，造假。

离开临江之前，王阳明就让戴德孺办几件事情：一、赶写文告，向各地通告宁王叛乱之事；二、编造假公文，说奉朝廷密旨，巡抚两广都御史、巡抚湖广都御史，以及南北两京兵部，已分别命将出师，直扑南昌；三、派出谍报，让几位戏子扮作间谍模样，带着假公文前往宸濠叛军驻扎地窥视，戏子先后被叛军捕获，所藏假公文也被查获。

来到吉安，王阳明和幕僚继续造假。第一，伪造上奏朝廷的公文，说宁王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等，并非真心为宁王策划，只是因为受到胁迫，迫不得已，今各有密书，陈诉实情；“贼将”凌十四、吴十三等，开始不明真相，今亦洗心革面，有密书送来，望朝廷许其将功赎罪。第二，伪造王阳明给李、刘，给凌、吴的密信，说是来书已悉，并已上奏朝廷，让其戴罪立功。这些伪文书也通过各种方式为宁王的叛军截获。

有人问：宁王精明，会信这些假文书吗？王阳明反问：宁王会狐疑吗？当然会狐疑，这就够了。所有乱七八糟的假消息，不但让南昌城内人心惶惶，也令宁王及其谋士心怀疑惧，本打算一鼓作气攻取南京，竟然犹豫半个月，不出南昌一步。在这些时间里，王阳明已经向各地通报了宁王叛乱的消息，并报告朝廷，将在吉安起兵平叛。



三、置九族之祸于不顾

在不断制造假象搅乱宸濠部署的同时，王阳明于六月十九日、二十一日连续上疏朝廷，奏报宁王在南昌发难，杀死孙燧、许逵，囚禁官员之事，要求朝廷立即派遣重兵，平灭宸濠之乱。又命人带着提督南赣汀漳都御史的公文，通告邻近各省，说是已奉朝廷密旨讨伐宸濠，要求各省巡抚火速调集军马，往江西平乱。

我们是在事后描述事情的进展，但在当时，形势对于外界来说，并不是太明朗。嘉靖时历任都察院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郑晓回忆，宁王叛乱时，他正在杭州参加科试，当时江西及邻近各处都有告急文书发到杭州，但这些文书或者说江西省城有变，或者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者说江西巡抚被害，或者说南昌忽然聚集兵马船只，都不敢指名说宸濠谋反，只有王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叛乱，钦奉密旨，会兵征讨。每当回忆此事，郑晓不禁感叹，王阳明此举，实是“不顾九族祸”（郑晓《今言》）。

为何说是“不顾九族祸”？原因有二：一是事涉宗室，情况不明，万一属传言，那就是“离间骨肉”，所以各级官员不敢贸然张皇，以免徒取奇祸；二是武宗行事荒唐，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久，同党甚多，万一宁王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自己的退路？王阳明公然宣称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又假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更是不留回旋余地。原来，虽然仕途阅历更加丰富了，地位也更高，但王阳明还是原先那个敢于担当、不计祸福得失的王阳明。

宁王朱宸濠终于发现上当了，什么两广大军、湖广大军，什么京军、边军，连个兵影子都没看到。在延误了半个月后，七月初一日，宁王朱宸濠让儿子宜春王朱拱樛留守南昌，自己率叛军近10万，乘坐大小船只上千艘，顺赣江而下，出鄱阳湖，入长江，主力直扑安庆，偏师则顺带攻略沿途的县城。

得知宁王离开南昌，王阳明率领在吉安招募的军队北上，七月十五日，与来自临江、袁州、赣州、瑞州、抚州各府“勤王”之师，会于临江府的樟树镇，略略统计，竟然有8万多人。这8万多人中的多数，半个月前还是佃户、佣工、商贩等，另有各府、县的驻军及捕快、刀手等。还有从赣州调来的官军及民兵，他们曾经追随王阳明征战南赣，是如今这支“义师”中的骨干。

十九日深夜，王阳明率军逼近南昌城。第二天黎明，开始攻城。王阳明亲自来到南昌的广润门外，申明军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克斩伍长，四鼓不克斩其将。又将早已写好的招降书若干份，命人用弓箭射入城内，涣散守军斗志。随着急促的鼓号声，各路将领身先士卒，士兵们冒着箭雨，架起云梯，前仆后继，一鼓作气登上城墙。守军本来就不愿和朝廷对抗，稍事抵抗，一哄而散。当天上午，整个南昌被占领，被宁王留下守卫南昌的宜春王朱拱樛及宦官万锐等，成了俘虏。宸濠的眷属在王府纵火自焚，霎时间，宁王府被熊熊大火吞没，周围的民居也被烧了不少。王阳明命人分道救火，安抚居民。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支被王阳明称为“义师”的军队，本来就是临时召募的乌合之众，也有不少流落江湖的亡命之徒，来到南昌繁华之地杀人抢劫，或趁火势入宁王府抢劫的也不在少



数。王阳明闻报大惊，深悔自己在下达攻城命令时，只强调“奋勇当先”，忽略了“秋毫无犯”。禁止杀掠的号令下达了，卫队立即出动，将违令者斩了十多人，这才制止了混乱局面。

此时的宁王朱宸濠，正指挥强攻安庆，突然得到情报，说南昌失守，大惊失色。宁王是想成大事业的，离开南昌就打算舍弃南昌，舍不得南昌怎么可能得到南京，怎么可能夺取天下？只要南昌能够坚守十天半月，或许就占领南京了。万万没有想到，王阳明有如此快的动作，南昌半天也没有守住，留守的宜春王干什么去了，你是头猪也得把王阳明顶几天啊！十多年的精心筹划，转瞬成了泡影，争夺天下的梦算是破灭了，面临的是灭门之祸。

四、君臣之义，朋友之情

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宁王当机立断，回师南昌，和王阳明拼命。王阳明在南昌也一刻没有松懈，大仗即将来到，一面赈济军民、安抚人心，一面派出伍文定，率领船队前往巡逻，并集结军队、搜罗船只，准备与宸濠决战。

宁王的前锋由鄱阳湖大盗出身的闵廿四率领，骨干多是长年在鄱阳湖及赣江、信江以劫掠为生的“水寇”，极为彪悍。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王阳明攻下南昌之后的三天，伍文定所领船只正在鄱阳湖巡逻，但见一支船队如飞而来，正是闵廿四的船队，可见其速之快。伍文定下令拦截，闵廿四一声号令，几十条快艇呼啸而进，将伍文定的船队冲得七零八乱。伍文定一面号令将士拼死抵挡，退入赣江，一面命人火速往南昌报信。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二十四日一早，闵廿四领着宁王的前锋，逆赣江而上，进抵离南昌省城仅三四十里的黄家渡；宁王朱宸濠所率主力停泊在稍北的樵舍。远远望去，叛军连棹十多里，风帆蔽大江。伍文定重整旗鼓，奋力拦截，但经不起叛军的大船冲击，掉转船头，且战且退。叛军士气高涨，鼓噪而进，刚追出几里，只听得两岸鼓号之声连天，无数船只从港湾中驶出。原来，再战之前，王阳明和伍文定查看了江面水情，船只再多，在江中难以展开，所以把增援船只埋伏在港湾之中，等待叛军船到，拦腰撞击。叛军猝不及防，阵形大乱，退往樵舍，与宁王大军会合。

第二天，七月二十五日，两军决战。赣江之上，大小战船，千帆竞发，和水天融为一体。王阳明率领船队顺水而下，占据上游之势，没想到刮起了北风，叛军倒占了上风。伍文定胆气过人，见叛军倾巢而出，挥动号旗，领着船队当先而行。叛军借着风势，火炮齐发，伍文定的船队被火光笼罩。前面几只小船掉头而回，伍文定大吼一声，命大船靠了上去，亲兵跳上小船，手起刀落，将率先退却的两人砍死。王阳明的船队随后赶到，一连砍死了几十人，稳住了阵脚。

伍文定站在船头，迎着炮火，领先向着敌船冲去。突然，一团火光在船头炸开，伍文定的头发、胡须全被燃着，但他像木雕泥塑一般，岿然不动。王阳明命人擂起战鼓，全部战船降下橈帆，士兵操起木桨，拼命划动，战船顺着水势急驰而下。两军战船搅在一处，风力便无法借用。伍文定带着几只战船冲透敌军船阵，逼向宁王朱宸濠座船。一声令下，火炮齐发，宁王“龙舟”顿时



成了火海。宁王大惊，向下游退去。“龙舟”一退，被宁王劫持、不得已而“从逆”的原江西三司官员也令船只倒退，叛军顿时乱成一团。王阳明催动船队，奋力冲击，叛军被杀、被俘 2000 多人，落水溺死、逃散的不计其数。

第二天天刚亮，宁王收拾残部，准备最后一搏，却见大江之上漂来无数木片、竹片，有人顺手捞起一片，却是免死牌。原来，王阳明早已令人制作免死木牌、竹牌无数，于发起总攻之前投入江中，宁王残部军心大乱，溃散大半。王阳明下令发起攻击，叛军溃不成军。宁王朱宸濠及儿子、孙子，谋士李士实、刘养正，被封为太师、军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的几百人，以及被胁迫随军的江西三司官员，全被官军俘虏。乘乱而逃者，或被官军在赣江口追及，或被乱军所杀，或受伤落水而死。可惜的是娄谅先生的孙女，嫁给宁王为妃，曾极力劝阻宁王叛乱未果，投江自杀。事后有传言，说宁王曾叹息：商纣因听妇人之言亡，我因不听妇人言而亡。

宁王宸濠从六月十四日起事，到七月二十六日兵败被俘，总共 42 天。但着手准备，却有十多年的时间。只是因为出了个王阳明，十多年的心机成了泡影。当武士将朱宸濠押至王阳明帐前，宸濠忍不住高喊：“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王守仁！我朱家自己的事情，何劳你费心如此！或许宁王还要说：王守仁，你仔细想想，我难道不如厚照那荒唐皇帝！王阳明望了望宸濠，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吭声。宸濠似乎从王阳明的眼神中发现了一丝希望，又大声高呼：王先生！恳请留我一条性命，降为庶民，行吗？

王阳明心中刚刚腾起的一丝同情又被鄙视和厌恶所压制，挥了挥手，让卫士们将宸濠一行押了下去。宸濠一面挣扎，一面高呼：娄妃是娄谅先生的孙女，请看在娄先生的分上，替我收殓她的尸体！听到“娄谅”二字，王阳明心中猛然一震，娄谅先生与自己有师生之谊，而且，早就听说娄妃非常贤惠，只可惜嫁给了宸濠。无论是就娄妃而论，还是就自己与娄谅先生的情谊而论，都应该好好收殓她的尸体。

一回头，宁王的谋士刘养正被卫士押着走来。刘养正少年时代就以文采著名，对朱陆之学多有研究，而且精研兵法谋略，为王阳明所重，称其为“道友”。但刘养正又是个不甘心久居人下的读书人，眼见正德皇帝荒唐，又知宁王宸濠有想法，于是寻机参拜，成为宁王的谋主，曾经奉宁王之命，至赣州与王阳明见面。

见到刘养正，王阳明心中升起一些惋惜之意。惋惜之余，有些内疚。虽然说人各有志，但自己却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没有“责善”。如果刘养正到赣州时，自己推心置腹地对其讲清道理，阐明大义，或许其能幡然醒悟。即使不听，自己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想和刘养正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处说起。刘养正见了王阳明，也是欲言又止。四目对视，王阳明挥了挥手，刘养正点了点头，大步而去。出于朋友的情分，王阳明让刘养正选择了自杀。后来王阳明到安福，厚葬刘养正之母，并撰文以祭：“君臣之义，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王阳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荡平“数十年积寇”，但毕竟对手是流民。而宁王的属下，却是由王府护卫和江洋大盗为骨干的能



南昌市新建区

战之师。王阳明从樟树誓师，十多天即予剿灭。所用之兵，全是“乌合之众”。《明史》作者不由赞叹：“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阳明的“功业”，也由此达到顶峰，由于他擒获宁王宸濠的地点是江西南昌府新建县，所以被明朝封为“新建伯”。

但是，王阳明完全没有想到，对于他的真正考验，他所遭遇的真正困境，才刚刚开始，而王阳明对“圣人之道”的体悟，也因此有了新的契机。

【第九讲】

处变不惊



一、荒唐天子，菩萨心肠

对王阳明的新考验，来自宁王宸濠想取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一直厌倦皇宫生活的乏味，在边将江彬、许泰等人的唆使下，今日往宣府巡边，明日往大同阅兵；今日在关内寻花问柳，明日在关外跑马放鹰。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王阳明在江西围剿横水、桶冈流民之时，正德皇帝朱厚照在山西大同东北部的阳和一带，指挥军队和“套虏”打了一仗。这件事情令正德皇帝兴奋不已。多少年来，被称为“套虏”的蒙古部族一直在边境侵扰，守边将士很少敢于主动出击。此次皇帝以“九五之尊”，亲自冲锋陷阵，不但击退了蒙古的大部队，还亲手杀了一个蒙古武士。让那些天天劝自己待在紫禁城的文官武将们看看，大明开国以来，可曾有过如此英勇的天子？特别是，从京师北京到太原，再由太原到陕西榆林，然后回到京师，往返好几千里，正德皇帝和将士们一样，骑快马、负重铠，顶风冒雪，从来不坐辇车，随行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病了，可皇帝却是越来越精神。躲在北京只会叨咕“祖宗法度，圣贤道理”的大学士们，可敢随朕在万里边塞走上一趟？

但是，就是这一仗，虽然一共“格杀”了7名蒙古人，受到奖赏的明军将士，竟然有9000多人。仅此一例，可知皇帝是如何胡闹，否则，宁王朱宸濠恐怕也不会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正德十四年（1519年）初，不知是皇帝的兴趣发生了转移，还是受身边亲信及宦官、边将的挑唆，宫中传来消息，说皇帝在

春暖花开之时要巡视江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可不是闹着玩的。山西、陕西地处边陲，人烟稀少，皇帝再折腾，也不影响国家的大局；江南却是国家的财赋重地，一旦闹起来，难以收拾。特别是南京、扬州、苏州，不仅经济、文化发达，而且青楼花巷遍布，名妓名伶辈出，皇帝正值盛年，又是“文艺青年”，喜欢词曲弹唱，他这一去，还不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相似，国家岂不断送？

内阁首辅杨廷和同僚一致认为，皇帝南巡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必须设法制止，于是联名上疏，但不敢说青楼花巷、名妓名伶等事，那样更易引起皇帝的兴致，只是说，东南为国家财赋所出之地，近年一直遭受水灾，加上徭役繁重，民不聊生，供不起大军经过的费用。这是其一。其二，运河最近时常断流，一般漕船尚且难以通过，何况龙舟巨舰，一旦搁浅，路上发生意外，如何处置？

在内阁的推动下，六部及其他政府机关的官员，以及六科十三道的给事中、御史，纷纷上疏，请求皇帝放弃南巡。但皇帝统统不予理睬。一些年轻气盛的言官被皇帝的这种态度激怒，成群结队来到皇城左顺门外，从辰时一直跪到申时，这在当时叫“伏阙”，我们现在叫“请愿”。但是，皇帝仍然不理不睬。皇帝的态度激怒了更多的官员，也鼓励了更多的官员，忠不忠于国家，就在这种时候表现出来。于是，吏部郎中张衍等14人，刑部郎中陆俸等53人，礼部郎中姜龙等16人，兵部郎中孙凤等16人，以及翰林院的史官、各衙门的属官，包括王阳明的弟子太常博士陈九川、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舒芬等人在内，数百名中级官员同一



天上疏，力阻皇帝南巡。

臣子可以效忠，君主也有脾气，何况还有身边的亲信在不断煽动，正德皇帝朱厚照动怒了，降旨让 107 个言词激烈的官员到午门外罚跪，你们不是喜欢“伏阙”吗？一天不够，让你们连跪 5 天！

这 107 个官员每天清晨穿着官服从家中步行来到午门罚跪，傍晚再步行回家，成为北京街头一大奇观。其实，就皇帝朱厚照的性格而言，此举更像是恶作剧，他要等着官员们承认错误，等着他们向自己求饶。但几天过去，官员却没有一个求饶的。朱厚照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到了第五天，也就是官员罚跪的最后一天，朱厚照下令，107 个官员，每人廷杖三十。打完之后，将舒芬等 4 人贬谪出京，其余 103 人停发 6 个月的俸禄。舒芬虽然被打得奄奄一息，一得到贬往福建市舶司为副使的公文，立即裹创就道，一时传为美谈。舒芬刚到福建，便接到了王阳明请他到赣州的钧牌，成为王阳明在赣州建立的“濂溪书院”的“主席”。

这次廷杖官员的事情发生在正德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十天之后，四月初五日，朱厚照觉得这口恶气还没有出够，又听说受了廷杖关在锦衣卫大狱中的官员仍在商议如何劝阻皇帝南巡。朱厚照一怒之下，命将陈九川等 39 人从狱中拖出，在午门外行刑，各打四十或五十廷杖。霎时间，午门再次变成了刑场。监刑的司礼监太监一声令下，锦衣卫校尉齐声呼喝，将受刑的 39 名官员拖翻在地，举杖便打。这一次由于江彬等人的吩咐，所用刑杖更重，校尉们的呼喝声，官员们的惨叫声，响彻云霄，也令皇帝朱厚照一阵心惊。事后太监回报，说是 39 人中，有 8 人当场死于杖下，

另有一人气息奄奄，眼见也活不成了。

皇帝朱厚照心中不免一阵内疚，这些人自己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十年寒窗，数赴考场，好不容易弄了个一官半职，本指望光宗耀祖，可如今却命丧黄泉，但他们何苦与自己作对啊？这对他们有何好处？皇帝朱厚照想不通，但一个英雄惜英雄的奇怪念头却在他脑中闪过：不管怎么说，原来文官中也有不怕死的，好汉子！他决定恶作剧到此收场，也暂时放下了南巡的打算。

二、渔阳鼙鼓动地来

但是，老天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正德十四年七月，关于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的告急文书到了北京。本来是十分糟糕的事情，却令皇帝朱厚照和亲信们极度兴奋，终于有了南下的理由，不是去“巡幸”，而是去“平叛”。

皇帝让司礼监到内阁传口谕：宸濠谋反，上逆天道，下悖祖宗，着内阁拟旨，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领各镇军马，前往征剿。听着这道旨意，大学士们一阵苦笑，不管多么严重的事情，让这位皇帝一搅乎，便成了儿戏。“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是谁？是皇帝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号。“朱寿”是谁？是皇帝朱厚照自己给自己取的姓名。皇帝自己给自己下命令，让内阁拟旨。另外还有一个前部先锋、威武副将军朱泰，是皇帝的干儿子、边将许泰，赐姓朱。许泰是南直隶扬州江都人，应该向皇帝灌输了不少扬州、南京的传说和故事。

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拒不拟旨，皇帝并不在乎。在他的眼里，



大学士不过是朝廷养着的一帮书生，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当然也经过和内阁杨廷和等人的讨价还价，八月二十二日，皇帝亲自率领数万京军、边军，离开京师，浩浩荡荡杀奔江南。

这个时间，是在王阳明俘虏宁王宸濠、平定宸濠之乱的近一个月之后。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王阳明的报捷文书到了。大学士杨廷和尽管和王阳明学术取向不同，但对于王阳明及时平灭叛乱，却是由衷佩服，国家避免了一次危机，百姓减轻了许多苦难。杨廷和命人骑快马追赶皇帝，仗打完了，没有南下的必要，请皇帝返回北京。

但是，王阳明的捷报令皇帝朱厚照和他的亲信们大为沮丧。前往平叛的皇帝和发动叛乱的宁王一样，也怪这个王阳明多管闲事。既然是南赣巡抚，你就应该待在赣州；去福建处理兵变，你因何要兜圈子到丰城？传说王阳明与宁王有交往，看来并非子虚乌有：其一，宁王妃娄氏是上饶娄谅的孙女，王阳明言不称师，但念念不忘娄谅对自己的教诲；其二，宁王的首席谋士刘养正和王阳明关系密切，刘养正去过赣州，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多次往返南昌与赣州，显然是互通情报；其三，宁王的生日在六月十三日，胁迫江西官员叛乱在十四日，王阳明十五日到丰城，明摆着是准备给宸濠祝寿乃至参与叛乱；其四，如果不是相互之间有默契，宁王敢放着王阳明在吉安却倾巢而出打安庆？

立场决定观点。所有疑问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猜测，进而成为一种判断，两个字——“通濠”：王阳明本来就参与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阴谋，只是看到形势不对，才从背后捅了宁王一刀，

成了平叛英雄。这个思路一成立，继续南下成了必要，但不是去平宁王之乱，而是去追查王阳明与宁王勾结的罪状。当然，人人心里又都明白，猜测归猜测，判断归判断，却不可能是事实。

皇帝朱厚照南下，是实现他本来就有的到江南玩玩看看的愿望，去体验江南的戏曲文化，当然，也希望和宁王打一仗，以显示自己的文韬武略。所以有人暗示王阳明，把宁王放了，让皇帝亲自和他打一仗。跟随皇帝的太监、将领，南下的目的是为了发财，现在增加了一个——和王阳明抢功。君臣大方向一致，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王阳明的报捷文书、杨廷和的劝驾奏疏被留中不发，大军兼程南下。由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和皇帝干儿子、威武副将军、安边伯许泰（已改名朱泰）率领数千禁军，日夜兼程，直趋南昌，既要夺宁王朱宸濠，更要夺传说中宁王府的无数珍宝财物；另一位提督军务太监张永率领两千禁军进驻杭州，对南昌形成夹击之势。

王阳明所面临的形势，比在南赣平乱、南昌平叛更为严峻。这时候，老朋友乔宇出手相助。乔宇少年时代专心于棋，三年之后国内难寻对手；青年时代和王阳明一道热衷于辞章，由唐宋而入汉魏；人到中年，决定改弦易辙专心“圣学”，却感到迷惑，向王阳明请教。此时的乔宇，正为南京兵部尚书。据明朝的制度，留都南京事务，由南京兵部尚书主持，种种对王阳明不利的消息传来，乔宇忧心忡忡，在第一时间向王阳明通报了两路大军的行程。

此时的王阳明心急如焚。第一，数万边军、京军抵达江南，无论对南京、南昌还是杭州，都是极大的骚扰，可能造成比宁王



叛乱更大的社会动荡，如何才能尽快消弭这场灾难？第二，张忠、许泰率军到南昌，目的是发财，如何既满足这几千人的私欲，又把南昌、江西民众的损失降到最低？第三，宁王朱宸濠是条死狗，即使放了也起不了风浪，但如果落入张忠、许泰之手，在他们的威逼、诱使之下，胡乱咬人，把对自己的猜测弄成“铁证”，那就真是灭族之祸了，该如何应对？

三、宁王宸濠成奇货

《明史》对王阳明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评价：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王）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明史·王守仁传》）

整个明朝，论用兵打仗，文官中没有能够比得上王阳明的。如果王阳明把眼前可能的灾难视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对待，皇帝和宦官、将领们应该也不是对手。更无人能及的是，情况越是不明，越是迷雾重重，王阳明“神明愈定，智虑无遗”。《明史》的作者认为，这固然是由于王阳明天分高、料事准，更是因为他“有得于中”。什么是“有得于中”？《明史》不便明说，其实就是王阳明后来不断讲述的“良知”“致良知”。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他可以做别人不敢做乃至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一句话，可以完全不按常规出牌。

得到张忠、许泰率军直扑南昌的消息，得到将宁王移交给张忠的“旨意”之后，如果换一个人，得老老实实在南昌等候。但在王阳明看来，那就是坐以待毙。如果自己连性命都保不住，如果因为自己而祸连家族，怎么对得住家人，怎么可能把南昌、江西民众的损失降到最低，又怎么可能减轻数万京军、边军对江南造成的灾难？

在这种种矛盾之中，对宁王宸濠的处置成了事情的焦点，王阳明自身的安危则不但关系到家族安危，更关系到江西、江南的安定。所以，处置好宁王，保护好自己，成了王阳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胜负手”。这个“胜负手”的选择是由对国家、对民众的责任而决定，由“良知”、由“吾心之本体”而决定的。但是，如何将“胜负手”化为“胜手”而不是“负手”，却既要有“良知”，更要有“致良知”的手段，这个手段，王阳明称之为“功夫”。王阳明不断倡导“知行合一”，什么是“知行合一”？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以说是“知行合一”在王阳明身上的集中体现：心有良知，行有担当。

在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王阳明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将宁王等一干主要人犯装入囚车，离开南昌，亲自押往杭州。事实证明，这是王阳明渡过难关真正的“胜负手”。

来南昌的张忠、到杭州的张永，都是正德皇帝朱照厚的亲信宦官。张忠和许泰等人关系密切，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王阳明；张永则让人示意王阳明放了宁王宸濠，让皇帝和他打一仗。他们的表现，本是“一丘之貉”。但王阳明却从他们的经历和行事风格，分辨出其中的不同。张永是当年的“八虎”之一，和刘瑾齐



名，但为人仗义，顾全大局，曾和都御史杨一清一道，设计让皇帝诛杀刘瑾。王阳明决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赌在张永的为人仗义和顾全大局上。

王阳明赌对了。张永虽然不读书，又是宦官，却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看不起只会钻营、见了宦官矮三分的文官，却佩服有胆有识并和自己共过事的杨一清、佩服遇事稳如泰山的杨廷和，对于人称“阳明先生”的王阳明，更是带有几分敬畏。十多年前，王阳明因上疏言事，下锦衣卫狱，廷杖四十，贬谪龙场，张永并不在意。本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数不清有多少官员挨过板子。就在不久前，还有107名官员受杖，当场死了8人，比起他们，王阳明的四十廷杖算不了什么。对于王阳明聚众讲学，弟子遍天下，张永也没有太在意。文人讲学，犹如武人练兵，不值得大惊小怪。令张永不解并佩服的是，王阳明一介书生，却能领着一帮乌合之众，一年灭巨寇，一月平叛藩，包括自己在内，天下只怕没有第二人能做得到。

这就叫先声夺人之气，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是一个耍嘴皮的教书先生，王阳明还真见不到张永。王阳明离开南昌时，已经通报张永，但张永让人阻拦王阳明；王阳明到了杭州张永开府的浙江镇守中官府，被卫士阻拦在门外。当然，不要说此时的王阳明，就是刚出道时期的王阳明，也不会在乎这个架势。王阳明朝着卫士厉声喝道：我有机密大事，谁敢阻拦！进得府门，王阳明大声呼喊：“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就在王阳明高声呼喊之时，一位壮士出现在面前，张永露面了。

落座之后，王阳明开门见山：正德以来，江西百姓先遭“流

寇”之祸，继受“叛藩”荼毒。大乱之后，继以旱灾，穷困已极。若京军边军齐至江西，供应之费不下亿万。催逼之余，必然逃窜山谷，相聚为乱。这是其一。其二，皇上久离京师，如有奸党窥测，乘机煽动，天下必成土崩瓦解之势，那时再想收拾残局，恐怕就不容易。守仁有鉴于此，违旨抗命，冒死前来杭州，面见公公陈说利害。望公公在皇上面前，相机劝导。如此，江西百姓幸甚，大明江山幸甚，守仁虽祸灭九族，亦无怨言。

王阳明侃侃而论，触动了为人仗义而顾全大局的张永的“良知”，不但接受了宁王宸濠，并且承诺在皇帝面前因势利导，帮助王阳明渡过难关。王阳明一颗提着的心稍稍落地。张永是老资格宦官，地位高于张忠、许泰，有他在皇帝面前替自己说话，张忠等人或许掀不起大浪。

四、高人指点，化险为夷

按照二人约定，王阳明在西湖畔的净慈寺住了下来，等待张永的消息。消息倒是不断传来，说皇帝到了扬州，说张忠在南昌胡作非为，说王阳明如何与宁王朱宸濠勾结，等等，就是没有张永的消息。王阳明内心焦急，一个人物在脑中突然闪过。谁？替张永出谋划策诛杀刘瑾的杨一清。如果杨一清能够帮助自己，那就加了一道“双保险”。

杨一清从小才学出众，被举荐为“翰林秀才”，王阳明出生的那一年，19岁的杨一清中了进士。事实证明，杨一清并不只是“秀才”，而是正德年间官员中公认的第一干才，历任多处巡抚



杨一清

都御史，做过吏、户二部尚书，多次处理令人头痛的陕西马政和西北边务，特别是与张永一道，谋划诛杀刘瑾。杨一清既通达政务，又为人豁达，而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人们将其比作唐朝开元时期的贤相姚崇。此时，年近七十的杨一清正赋闲在家，就住在扬州对岸的镇江。

王阳明以晚辈的身份叩见杨一清，请教进退之计，请教是否该过江求见皇帝。杨一清见王阳明谦恭诚恳，心里高兴，扳起手指，一字一顿地说：伯安以讲学名扬海内，毁者誉者在所难免，新近又屡立奇功，所谓“树大招风，名高招忌”，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你坏话，不足为怪。伯安志气远大，犯得着与小人计较吗？此其一。其二，皇上虽在扬州，但“帘高堂远、君门万里”，没有旨意，不要说一江之隔，就是扬州行宫的一个门槛儿，也跨不过去。其三，即使见了皇帝，说什么？伯安难道要用道听途说的传言和皇上理论？

王阳明从小宣称要“学为圣贤”，近年功业卓著，弟子前呼后拥，也开始以“圣贤”自居，自以为可以处变不惊、临事不乱，但事到临头，毕竟还是有些沉不住气。特别是如何侍候皇帝，还真不是王阳明之所长。杨一清的一番话，令王阳明坐立不安。不能去见皇帝，那应该怎么办？杨一清笑道：伯安见识过人，原也用不着多说。张永已去扬州，当为你洗刷不白之冤。张忠、许泰在南昌，久则生变，到时罪名还得由你来背。

王阳明一刻也坐不住了，辞别杨一清，登上快艇，逆水而上，经湖口入鄱阳湖，往南昌而来。人在路上，皇帝的旨意已经下达，王阳明为江西巡抚。王阳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不能不感叹张永的力量强大，不能不佩服杨一清的料事如神，真可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自己的事情解决了，接下来是解决江西的事情、南昌的事情。

张忠、许泰率领的京军、边军，先先后后来到南昌城内城外的有上万人，人人以为宁王府珍宝山积，人人以为江西人腰缠万贯。早在800年前，王勃就盛赞南昌“物华天宝”；当日北京的大小衙门，有成堆的江西官员，店铺作坊有许多也是江西人开的。谁知一进南昌城，街道并不宽敞，市面并不繁荣，百姓并不富裕，再看宁王府，只是一片尚有余烬的废墟，所见和所闻距离实在太太，令人难以置信。更令张忠、许泰恼羞成怒的是，想夺宸濠，宸濠却被王阳明抢先一步给了张永；想到南昌发财，大官小官全露苦脸。冤有头，债有主，冤头债主就是这个王阳明。恼羞成怒，张忠、许泰往南昌狱中审讯宸濠的亲信人等，严刑逼供，非让他们说出王阳明和宸濠交结的证据，但所供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又把曾经往来于南昌、赣州的王阳明弟子冀元亨抓起来。但是，任凭百般拷讯，冀元亨矢口否认老师和宸濠之间有密谋。张忠、许泰无奈，命人将冀元亨押赴京师，希望锦衣卫的用刑专家能把他的口撬开。

王阳明回到南昌，得知张忠、许泰等人的所作所为，心中充满激愤。但通过和张永，特别是和杨一清的交流，王阳明觉得自己的功夫又深了一层。作为江西全省的最高长官，绝不能因一时



之怒而因小失大。为今之计，是稳住南昌和江西的大局。京军、边军虽然蛮横，但人心都是肉长的，王阳明相信，自己有征服他们的办法。

南昌百姓听说王阳明回来，觉得有了靠山；京军、边军听说王阳明回来，以为找到债主。王阳明不紧不慢，或在衙门处理公务，或往街市劝慰市民，或往军营看望将士。对于张忠、许泰，既礼貌周全，又不亢不卑。将士们在张、许等人的挑唆下，或口出不逊，或故意挡道，王阳明全然不予计较，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但一系列的举措也随之而出。

农历十一月的南昌，天气已经寒冷，王阳明说服城内居民，在农村有住房的，暂回老家，将城里住房空出，让京军、边军居住。消息传出，将士大为感动。张忠、许泰明明知道王阳明是在收买人心，想极力制止，但无济于事。王阳明又命人晓谕百姓，京军、边军远离家乡，为的是国家太平、百姓安居，虽然南昌不富裕，但不能让将士们受寒挨饿，如遇士兵有难处，都要尽力帮助，倘若力不能及，要告知官府，由官府处置。消息传开，将士又是一阵感激。北方人到南方，水土不服，王阳明将南昌及附近的郎中集中起来，替有病的将士免费看病开药。将士中偶有因病亡故的，王阳明命人准备棺木，予以安葬。将士对王阳明有了新的看法。不管张忠、许泰如何说王阳明不是，京军、边军不再谩骂、冲撞，都恭恭敬敬，高呼“王都堂”了。

但是，上万士兵长住南昌及近郊，负担巨大，又不能明着赶他们走。王阳明心中一动，冬至就要到了，这是传统的祭祀亡灵的日子。冬至这一天，南昌城内的大街小巷、城外的村头道口，

白幡招展。在平灭宁王的战斗中，双方有上万人丧生，不管是“从逆”而死，还是“赴义”而亡，亲属们都在这天祭祀亡灵，全城内外，哀声遍地。京军、边军久离故土，触景生情，悲不自禁，纷纷要求返回家乡。

张忠、许泰无计可施，面见王阳明，想敲些钱财了事。但江西百姓久遭兵祸，又遇旱灾，还要供应上万军队的粮饷，哪里还有余财？王阳明正色道：宁府富甲天下，但宸濠为反叛朝廷，财富用于贿赂京中权贵。如朝廷让二位查处，王某定当全力相助。宁王贿赂的朝中权贵，张忠、许泰也在其中，如果真要追查，难脱干系。二人没有想到王阳明此时还如此强硬，无言以对。

正德十四年冬至后不久，张忠、许泰奉命撤离，南昌民众终于结束这场灾难。但是，还有数万军队在江南，对江南的骚扰仍然在继续。怎么办？皇帝下江南，名义上是剿灭叛藩，但叛藩早已被王阳明剿灭，如果兴师动众地来，又偃旗息鼓地回，皇帝一点面子也没有。要让皇帝回北京，得给他台阶下。

为了给行事荒唐却又极爱面子的皇帝一个面子，让他早日离开南京、返回北京，“成大事者不计小节”，王阳明决意不计较舆论可能对自己的指责，于正德十五年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平定宁王之乱将近一年之后，上了一道《重上江西捷音疏》，疏中特别注明，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遵奉大将军钧帖”。这个“大将军”是谁，是皇帝朱厚照。在这个奏疏中，将原先谎称的“奉旨起兵”，统统说是实有其事；将实际上已是马后炮的皇帝旨意，说成是在宁王起事之前已经下达的命令。一句话，一年前平定宁王之乱，完全是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所以应该归功于皇帝。但是，



疏中还不能称皇帝为皇帝，而要按皇帝的意思写成“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张忠、许泰等人，当然也包括张永在内，皇帝身边亲信，一个不漏，都在这道奏疏中予以称颂。

这是王阳明有生以来所做的又一件违心事，也为对王阳明、王学不满的人提供了又一口舌。若干年后，湛若水为已故王阳明作墓志铭，仍然说这件事情：“流为先与后擒之言，上下腾沸，是不足辩也。”为了江南早日安宁，为了百姓少受荼毒，王阳明在所不计。正是经历过这些磨难，才使得王阳明在体悟“圣人之道”的过程中，一直感觉十分贴近却又无法捅破的那层窗纱，终于被捅破，原来，所谓“圣人之道”不仅“吾性自足”，而且如此便捷通透。

【第十讲】

以方寸心，
体天下物



一、王门弟子中的“异类”

正德十五年八月，整整折腾了一年，皇帝终于离开南京北归，王阳明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一天，正与门人、幕僚在巡抚衙门论学，门子来报，有泰州王银先生在门外求见。等到这位自称“王银”的人进得门来，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众人不禁哑然失笑。但见此峨冠博带，双手端着一块木片，神情古怪却不失恭敬。

王阳明连忙离位相迎，落座之后，问道：先生所冠是何冠？答曰：此为有虞氏之冠。又问：先生所服是何服？答曰：此为老莱子之服。“有虞氏”是“三皇五帝”中舜的号，传说舜生性至孝，不管父母如何虐待，兄弟如何亏待，都不怨不怒，最后终于感动了父母兄弟。由于有这样的孝心，又办事能干，所以尧将帝位让给了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尧舜禅让”。“老莱子”是春秋时楚国人，也是个孝子，70多岁，为了让父母开心，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学着小孩步子，故意摔跤，然后假装哭泣，逗得父母直乐。舜和老莱子都是以“孝”闻名，后来人们知道，王银一生所学、与人讲学，皆从《孝经》出，所以见王阳明的时候，也仿效古时两位大孝子的穿戴。

王阳明和弟子们逐渐明白，王银此番求见，是要找王阳明一比学问高下的。经过几番诘难，王门弟子开始对王银刮目相看，此人看来读书不多，但见识机变，绝非常人所及。经过几番诘难，王银也逐渐收起了狂傲之心，为王阳明的学识所折服，成了王门

弟子，并向王阳明和王门诸弟子讲述了此番来到南昌的缘由。

王银是明代著名盐场泰州安丰场人，父亲是盐场灶户，也就是盐户。在上交朝廷下达的纳盐指标后，灶户生产的“余盐”可自行销售。这样，王银父亲和其他灶户一样，成了小盐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弟通过读书应试进入官场，这样可以改变门第，由被统治者而为统治者。王银父亲也将改变门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王银7岁时，将其送入私塾读书。但是，每见父亲起早摸黑操劳，王银就感到不安，到11岁时，便坚决不再上学，凡官府有差役，均代父充役，父亲出外经商，也跟随前往。

随着年龄增大，王银开始下池煮盐，或独自外出经商。与父辈以及世世代代的灶户不同，王银无论到哪里，都要带着书本，遇有读书人，虚心请教，反复商讨。由于天赋极高，又极爱思考，总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王银不但和读书人讨论学问不再有对手，就是煮盐经商，远近也无人比得上。学问大了，家境富了，王银开始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并且也和当年的吴与弼、陈献章及当代的王阳明一样，开始体验“圣贤”之道，梦想自己也成为“圣人”。

王银此时38岁。他告诉众人，说是几年前，他29岁时做过一梦，梦见天塌，压在大地上，也压在自己身上，成千上万的人奔走呼号。王银奋力振臂，竟然将天举了起来，救了亿万人的性命。抬头一看，由于这一塌，日月星辰都错乱了位置，于是一一将其移正归位。做完这些事情，累得汗流如雨，内心却陡然空明洞彻。一觉醒来，以往参悟不透的事物，这时都在自己的意念之



中，觉得圣人已经附体。于是，王银开始用“心”体验万物，而这种“体悟”，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既异途，又同归，结论都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从此，王银开始教人以“心”体验万物。时间一长，农夫渔父、商贩工匠，都知道王银先生，其名声传遍江北。名声一大，王银更加傲气，也更加特立独行，按照《礼经》，自制一顶“五常冠”、一套深色大氅、一条比常人的宽大得多的腰带，又用毛竹制作了一块比官员上朝时所用的笏板大得多的笏板，出没在城市乡村。每到一地，观者如潮。佩服的捧之为圣贤，不以为然的视之为怪物。王银对此都不屑一顾：我说的是尧该说的话，行的是尧该行的事，怎能不服尧时的冠服？原来，他见王阳明时穿着舜时的衣服，已经是表示谦虚了。

有位名叫黄文刚的吉安盐商来泰州贩盐，正遇王银讲学，挤在人群中听讲。听着听着，大吃一惊，这位穿戴奇异的王银先生，所讲之理竟和他在南昌听阳明先生所讲极其相似。事后黄文刚来见王银，问他与阳明先生是否有师承关系。王银听黄文刚说到王阳明，顿觉茫然。阳明名声遍天下，王银竟然没有听说过。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的“朋友圈”没有交集。虽然王阳明在体制外讲学授徒，面对的都是读书人；王银也是在体制外讲学授徒，面对的却是渔夫樵父、贩夫走卒。

好奇心盛，好斗心更盛，王银当天启程，前往南昌，来见王阳明。一是想看看王阳明到底何许人，二是想与王阳明分个高低。王银不相信，这个世上还有人“心”的感悟能超过自己。

听了王银的诉说，王阳明和弟子们笑得前俯后仰。王阳明

对这位早已开宗立派的弟子更是刮目相看，替王银改了名，去掉“金”旁，只剩“艮”字，叫“王艮”，又取了字，叫“汝止”。“艮”为八卦中的一卦，代表山，巍然挺拔，不依不附，符合王银的性格；但也要有所收敛，应适可而止，所以叫“汝止”。从王阳明给王银所取的名和字看，他赞赏王银的独立思考，但对于王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过多野性，则打算有所修剪和矫正。但是，这个“艮”字又有多解，可以是八卦的“艮”卦，也可以是银子的“银”、民众的“民”的异体字，还可以作耿直的“艮”解。所以，我一直认为，虽然王阳明给王艮去“金”留“艮”，是寓意八卦的“艮”卦，但从当时的传播方式来说，读音仍然应该是银子的“银”的异体字“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笔者的两篇文章：《关于泰州学派王艮“艮”字读音的思考》《关于泰州学派王艮“艮”字读音的再思考》，分见《光明日报》2013年2月2日、5月23日）。

从此，在王阳明的弟子中，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史上，多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个人物便是王艮；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派，这个学派就是后来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王艮之入王门，无论是对于王阳明本人还是对于王学的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个人来说，王门弟子之中多了一个“异类”；就王学来说，开始由“士人”即读书人的学问演变为“众人”即



王艮



大众的学说。而在与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体悟出“圣人之道”的王艮的切磋之中，王阳明自己也获益良多。

二、百死千难揭“良知”

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剥削富人，铲除功臣，控制舆论，严惩贪腐，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严峻冷酷”之中。这个时代只有一种价值标准：仕途。优秀青年被选入官学，读书科举并诚心实意报效朝廷，既可光宗耀祖又可体面脱贫，是国家倡导、社会认同的普遍价值，是当时的“第一等事”。

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们对社会财富有了新的认识，朝廷也不容易再对社会财富进行无偿剥夺，严峻冷酷的时代正在过去，“财富”继“仕途”之后，成为新的社会价值标准。这一价值标准的形成，对于推动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起着重要的作用。官学之外的私人讲学授徒，也开始兴起。

到王阳明出生的时代，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追求，曾经被明令禁止的各种娱乐、各色服饰重新抬头并以新的面貌出现，私人讲学蔚然成风。前些年因拍卖价高达2.81亿港元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在王阳明出生后五年的成化十三年面世。今日发现的明朝最早的说唱词话刊本，也产生在王阳明的少年时代。和王阳明同辈的新一代文化人应运而生：北方有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南方有“南四子”祝枝山、唐寅、文徵明、徐祯卿。他们的诗、文、书、画，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着众多男男女女“文艺青年”。各种各

样在明朝前期被禁止的江湖技艺，如风水术、星相术、房中术、黄白术等，也堂而皇之地进出皇宫内院。文化重新被人们关注、追逐，并且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明朝也由此进入多元化社会，进入一个好玩而没有权威的时代。

社会的多元化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追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王阳明步入仕途之后所面对的种种怪相：刑部大牢中的猪吃人食，身上有18条人命的罪犯不处决，刘瑾等“八虎”带着少年皇帝胡闹，江西镇守中官的肆意摊派，南赣数十年的动荡难以平息，宁王朱宸濠及其同伙的叛乱，特别是平定宁王之后，皇帝及一帮宦官、边军将领带着大军南下，正是这些问题的每一件都因人们没有克制的“私欲”而起，王阳明把人们心中的这种私欲称为“心中贼”。

这个“心中贼”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而且，权位越高，“心中贼”越盛，对社会的危害越大。关于这一思想，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王阳明在南京时，就在给学生黄宗明（诚甫）的信中加以阐发：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与黄诚甫》）

王阳明认为，社会精英们的正常生态应该是：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但现实恰恰相反，满嘴道德者，追



求的正是功名，声称为国计者，谋求的正是私利。这些问题并非只在明朝，更不是只在王阳明的时代才有，而是社会的“痼疾”，只是各个时代表现的方式、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当年孔子说“仁”，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性”，说“人性本善”；程、朱说“理”，说“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正人心”。归根到底，都是在寻找克制人们私欲、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但是，为何人欲难去而天理难存？王阳明上下求索，左右彷徨，希望从“圣人之道”中寻找治疗人们私欲的药方，并且及时把自己的体悟传播出去。

在应对皇帝及其佞幸的危机过去之后，王阳明在南昌、吉安、赣州等地巡视，在南昌的巡抚衙门，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吉安的青原山，赣州的濂溪书院及通天岩讲学，与官员、弟子、普通民众交流，一个呼之欲出而又姗姗来迟的理念迸发出来，王阳明用两个字予以表述——“良知”。

“良知”的概念并非王阳明首创，而是出自《孟子》。《孟子·尽心》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并列的概念：第一，“良能”。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或功能，如手能握、足能走，目能视、耳能闻。第二，“良知”。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感知或认知，《孟子·告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即是“仁”，羞恶之心即是“义”，恭敬之心即是“礼”，是非之心即是“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知，“非由外铄我也”，是不需要学、不需要想的。但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常常被泯灭。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说法，对“良知”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特别突出“是非之心”，特别强调“良知”乃“吾心之本体”：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大学问》）

对于“良知”二字的“点出”，王阳明极为振奋，并且溢于言表：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钱德洪《刻（阳明）文录叙说》）

王阳明自称，从“龙场悟道”之后，在在讲学，都是围绕着“良知”二字，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什么原因？不是读书不够，而是磨难不够，所以体悟不够。从正德十二年正月到江西，开始是平定四省边境的流民，在当地推行《南赣乡约》，然后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紧接着是应对从北京来的皇帝以及随行而来的宦官和边军、京军将领，在这些磨难之中，王阳明越来越体悟到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的重要。正是有如此的体悟，所以王阳明才对学生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



见得到此。”（钱德洪《刻（阳明）文录叙说》）

三、一生精神

但是，王阳明真正提出“良知”二字，并不需要等到平定宁王之乱及平息皇帝南下的风波，而是在正德七年到十年从北京南下到滁州及南京的时候。

《传习录（上）》记载，徐爱曾经向王阳明请教过《大学》之中的“止于至善”，王阳明答道：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原来，“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圣人之道”，就是这个“良知”。而且，此“良知”就是“心之本体”。王阳明举的具体例子是：儿子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孝顺；弟弟见到哥哥，自然知道敬重；见到小孩落下井中，自然产生同情、怜悯。徐爱向王阳明请教《大学》，主要是在王阳明于正德七、八年之间的南行途中，以及回到老家余姚的那段时间。

《传习录（下）》记载：正德十年（1515年），弟子陈九川见王阳明于龙江（南京），请教《大学》中所说的“诚意”。王阳明答曰：

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

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

在任何事情上，只要排除自己的私欲，良知便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良知既是与生俱来的，又被人们的私欲、被人们心中的“贼”所掩盖。

但是，王阳明此时点出“良知”二字，却只是在讨论“诚意”“止于至善”等《大学》概念时的“附带产品”，属于“无意识”或“潜意识”。而在平息皇帝南下风波之后，在江西南昌、吉安、赣州期间的反复点出、不断点出，则属于“有意识”，并且开始成为王阳明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但是，此时揭示的这个“核心思想”，并非只是“良知”二字，而是“致良知”三字。所以罗洪先、钱德洪等修《阳明年谱》，不说“始揭良知”，而是说“始揭致良知”。

人性本善，人知本良，只是由于生活在混混沌沌的世界，本来的善性、本来的良知被掩盖、泯灭。圣人之学，就是帮助人们恢复被掩盖、被泯灭的善性、良知，这就是“致良知”。

自从“致良知”三字揭出之后，王阳明便将其视为自己一生学说的结晶。晚年往广西平定民变的路上，王阳明给养子正宪信中明确地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学生朱守乾请学而归，王阳明也给他题了三个字：“致良知。”并且特别说明：

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



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书朱守乾卷（乙酉，1525年）》）

虽然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自己的学说有过“三变”，经过“三变”而有“龙场悟道”。但在百年之后的黄宗羲看来，王阳明的学术不是经过一个“三变”，而是有两个“三变”。

黄宗羲说王阳明学术的第一个“三变”，借用了王阳明自己所说，经过“溺志于词章之习”“稍知从事正学”“求诸老释”三个阶段，然后在龙场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感悟。但黄宗羲认为，王阳明通过第一个“三变”到“龙场悟道”，只是寻找到了通向“圣人之道”的“路”，是始得其“门”，而非已得其“道”。以“龙场悟道”为起点，王阳明的学术经过了第二个“三变”：

一、“龙场悟道”得入“圣人之门”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开始专注从“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性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

二、奉命为南赣巡抚到“江右”即江西，经过平乱、平叛，特别是经过与皇帝及其佞幸的周旋，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已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良知”二字。这样，就为“知行合一”注入了内核和灵魂。“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

三、在江西为巡抚及晚年赋闲绍兴、往广西平变，直到病逝，王阳明把自己的学说推向大众，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只要把各

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落实在行为上，即“致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要恢复人心、恢复人心中被泯灭的“良知”，就必须有“致”的“功夫”。所以王阳明说：“圣学只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致良知”。如果只有“良知”而无“致”的功夫，那还只是“讲学”先生，只有练就“致”，把“致”和“良知”融为一体，才能建功立业，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晚明有一署名为“七乐生”者所著的王阳明的小说式传记，名叫《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以“舆论”的姿态，对王阳明的“良知”做出评价：

如讲学一途，（世儒）从来依经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抉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戡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后人对王阳明的崇拜。论讲学，别人是皓首穷经、咬文嚼字，不得要领，王阳明只揭“良知”二字，便为后学指明了直达圣贤之“道”，何等便捷。至于建功立业，那更无人能及。

但是，以这本书为代表的后人对于王阳明的认识，恰恰是少了一个“致”字，遂使“良知”落不到实处。如同少了一个“行”



字，“知”也就不是“真知”。王阳明从“良知”中“挥霍”出一生行事的“横来竖去，从心所欲，戡乱解纷，无不底绩”，并非只是因为“良知”，而是因为能“致良知”。“致”字的提出，一直在酝酿之中，直到平息了皇帝南下的风波之后，王阳明才最终揭示出来，这是王阳明把孟子的学说在“事”上磨炼、在“实践”中体悟的结果，所以说是从“百死千难”中而来。如果只是读《孟子》、注《孟子》，固然也可从中揭出“良知”二字，却体悟不出“致”的功夫、“致”的作用。

隆庆时内阁首辅李春芳说：

夫“致知”学发自孔门，而孟子“良知”之说，则又发所未发。阳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则好善恶恶之意诚，推其极，家国天下可坐而理矣。

李春芳特别强调了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对孔子“致知”、孟子“良知”的继承与发展。

明末大儒刘宗周曾经论说王阳明一生的学问所在：

先生之学，始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但是，难道这个“良知”真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待学、不

待虑的吗？其实王阳明自己也在继续思考、继续体悟。任何伟大思想产生，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四、真知即是行，不行不为知

无论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还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良知”说，都使王阳明的学说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所以与陆九渊的学说一道，并称“陆王心学”，于是有“唯心”乃至“主观唯心主义”之说。

其实不待后人批评，王阳明自己就把自己的学说定义为“心学”，并且一再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文集序（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年）》）但是，王阳明学说的特点，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真正的“实学”。所谓“心学”，乃是陆九渊、王阳明等人承袭孔子、孟子等“先圣”的学说，在人生的历练之中、事业的磨难之中，用自己的“方寸之心”，体悟“天下万物”，从而揭示出来的经验和真切感受，绝非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成果”。后世学者以学术研究的惯性思维看待陆九渊、王阳明，看待“心学”，所以体悟不到“心学”乃“实学”的根本要旨。

徐爱曾经问王阳明：“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王阳明断然答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

徐爱对此表示不解。由于老师讲学，多以“事”论理，所以



徐爱也举例说明“心”不能尽“天下事理”：“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孝、忠、信、仁，以及其他种种，各有各的“理”，怎能只求于“我心”。

其实，这个问题王阳明在龙场和席书讨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时候已经以大禹、后稷的例子加以说明。此时针对徐爱的提问，王阳明有些无可奈何：“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

为何“蔽之久”，因谁而“蔽之”？蔽之者，朱熹也。因为朱熹将“人心”与“物理”分为二途，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

有学生以朱熹的说法向王阳明提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王阳明提出批评：“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

心即理，性即理，心、理本为一件事，朱熹在“心”和“理”之间加了一个“与”字，就将“心”与“理”分为二了。王阳明反复告诫学生，要恢复“圣人之道”，就是在实践上，清除被私欲掩蔽的“良知”，在理论上，扫除后儒特别是朱熹蒙在“圣学”之上的“私意”。

王阳明反问徐爱：如果你不知道孝敬父亲，便去求一个“孝”理；不知道如何忠于君主，便去求一个“忠”理；不知道如何以信交友，以仁治民，又去求一个“信”理、一个“仁”理，这就陷入朱熹挖的坑中。那怎么办？王阳明告诉徐爱，所有这些理，其实都在你的自己心中，因为心即理。关键是把蒙蔽“心”的私欲

排除，心明亮了，理也就明亮了，以这颗“纯乎天理之心”，事父就一定会是孝，事君就一定会是忠，交友就一定会是信，治民就一定会是仁。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一切功夫都在于排除私欲，恢复心之本能，所以，“理”是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因为事事之理，都在你的心中。

有学生对“心即理”不理解，王阳明告诉学生：“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下）》）当你的心在此物之上，此物便在你的心中，物之“理”便与你的“心”融为一体，所以“心即理”。原来，他所说的“心”，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是处处用心。用心去观察，用心去分析，用心去体验。所以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比别人远，比别人周到，比别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悟”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正是对“心即理”的初步认识；而在江西揭“致良知”之教，提出“此心在物则为理”，则是对“心即理”的完善。

所以，此时的王阳明不断宣称：“圣贤之学，心学也。”（《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甲戌，正德九年，1514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文集序（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年）》）心学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心即理”。所以王阳明说：“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传习录》）

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事物比“心”更包容、更伟大，只有以方寸之心，方能体天下万物。从这个角度说，以“心即理”为特质的“心学”，又可以使人内心强大，是让人内心强大的学说。

但是，王阳明同时告诫学生：第一，内心的强大是有界限



的，否则，容易异化为自我膨胀。也就是说，内心的“强大”必须“止于至善”。第二，内心的强大是有条件的，否则，就容易沦陷为迷茫。也就是说，内心的“强大”是经历磨难而成的。第三，内心的强大是有宗旨的，否则，容易转化为极端的私欲。也就是说，内心的强大必须以“良知”为底线。

同时，无论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的“理”，还是王阳明所说“心即理”“不外乎一人之心”的“天下之理”的“理”，指的主要是“事理”或“伦理”。陆九渊、王阳明所说的与“吾心”相对应的“物理”，以及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的“物理”，指的也都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层面的“事理”或“伦理”，而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自然层面的“物理”。

王阳明在给学生陆澄的信中说：

致知之说，向与惟浚（陈九川）及崇一（欧阳德）诸友极论于江西。……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与陆原静（澄）二》）

王阳明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的“知”为“良知”，“良知”为“知行合一”的真谛和灵魂；“知行合一”的“行”，为践行“良知”的过程和功夫。说到底，“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的提出，使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区别清晰起来。第一，“格物致知”的“知”没有明确的指向，需要处处“格”、事事“致”，所以说“尚未有下落”。而“知行合一”的“知”，就是心中的“良知”，只在自己的心中。第二，更重要的是，“格物致知”的目的在“知”，而“知行合一”的核心在“行”，所以王阳明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与不知，全在于行与不行（《传习录》）。

“致良知”的提出，也使王阳明的“心学”和程朱的“理学”有了根本的区别。王阳明和程颐、朱熹一样，都倡导“去人欲存天理”，但是，王阳明所说的“天理”，就在人们的心中，是人人本来就有的“良知”，不需要向外寻求，人欲排除，良知自见，这就是“致良知”。而程颐、朱熹的“天理”，要向外物寻求，“天理”无处寻求，“人欲”如何除去？所以人们说，对于“存天理，去人欲”，“心学”比“理学”更为“快捷”。

所以，王阳明的学说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其间也有一个由“渐悟”到“顿悟”的过程。

王阳明曾经把“知行合一”解释为：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但是，如何才叫“会得时”？王阳明进一步阐明：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但是，虽然王阳明自己心里明白，旁人仍然费解：“知”到什么程度是“真切笃实”？“行”到什么程度是“明觉精察”？

最终在与顾璘的切磋中，揭示出“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

原来，是否“知行合一”，关键看是否“行”，一切落实在“行”字上。而这个“行”，与“致良知”的“致”是异曲而同工的。是否真是“良知”，关键看是否“致”；是否真是“知行合一”，关键看是否“行”。

有学生提出疑问，先生说“知行”本应“合一”，但为何有时只说“知”，有时只说“行”？王阳明回答：

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传习录》）

原来，有时说“知”、有时说“行”，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补偏救弊。后人不明古人论事之理，往往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对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各种误解，多由此而起。

【第十一讲】

绍兴刮起『王旋风』



一、天有不测风云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北京病逝，时年31岁。大臣们根据他生前的喜好和行为，为他立了庙号“武宗”。武宗既无皇子，也无兄弟，堂弟朱厚熜以藩王的身分继位，这就是后来庙号为“世宗”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继位时的年龄和堂兄正德皇帝当年一样，都是15岁，这也是王阳明出居庸关考察的那个年龄。正德皇帝当年热衷于去边关，未尝不是像王阳明那样，怀着一腔热血，想为大明立大功。此时的嘉靖皇帝，同样也是热血少年，在湖广安陆为兴献王世子时，就对王阳明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一个讲学的“道学”先生，竟然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边境结寨数十年的“巨寇”，又只用十多天的时间，就平定了筹划十多年之久的宁王宸濠之乱，而且，还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因为正德皇帝南下而引发的风波。这位既以讲学闻名天下，又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尽打胜仗的“阳明子”，到底是何许人也？嘉靖皇帝充满着好奇，即位之后，让内阁拟了一道旨意，发往江西，命王阳明即刻进京：

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钦此。（王阳明《乞便道归省疏》）

嘉靖皇帝继位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诏书到南昌的时间是六月十六日，前后不到两个月，可以看出新皇帝的拳拳求贤之心，敕旨话虽不多，也没有说到具体的安排，王阳明却强烈感受到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预感自己的才能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自己的学说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南昌的王门弟子群情激动，老师进京，大家跟着沾光。

六月二十日，即见到敕旨的4天后，王阳明从南昌启程。按



理说，从南昌到北京，应该顺赣江入鄱阳湖，由湖口进入长江，再经扬州沿运河北上。正德五年秋天，王阳明在庐陵知县的任上得知刘瑾倒台，便是从这条路去北京的。但这一次，虽然皇帝让他“驰驿”去京，王阳明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回绍兴的线路。

从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阳明离开赣州，到此时离开南昌，两年时间里，王家发生了一些变故，祖母去世，父亲病重，王阳明曾多次向朝廷提出回绍兴省视，但政坛诡谲，没有得到批准。如今皇恩浩荡，奉旨进京，王阳明决定不按旨意“驰驿”进京，而是向皇帝上了《乞便道归省疏》，请求在祭祀祖母、看望父亲之后，再进京面君。这个理由十分充分，如同我们一再说到的，按中国传统理念，家有孝子，国才有忠臣。

多年以来，王阳明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这种心情可以从他的一首诗中看出来：

行年忽五十，顿觉毛发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独犹在。
世故渐改涉，遇坎稍无馁。每当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倾否
作圣功，物睹岂不快？奈何桑梓怀，衰白倚门待。（《归怀》）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到绍兴，王阳明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感受和亲人团聚的喜悦，就被以皇帝名义发来的第二道敕旨泼了一头凉水。这第二道敕旨是第一道敕旨发出之后不久下达的，所以没有提及王阳明的《归省疏》，只是要王阳明等待“后命”，不要忙着到京师来。幸亏王阳明离开南昌后是来绍兴，否则，到了哪里，就得先在哪里待着，或者退回南昌，等着“后命”。这不

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皇帝让你在哪里待，你就得在哪里待着，这也是“皇恩浩荡”。

王阳明预感到朝中的风云突变。果然，“后命”很快来了，命王阳明接替好友乔宇，为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则改任兵部尚书，赴北京就职。也就是说，王阳明现在该去的地方是南京而非北京。十几天后，王阳明回绍兴省亲的请求得到批准，南



新建伯王阳明

京也不必去了。几个月后，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接着又追赠三代，子孙世袭。这是对他平定宁王宸濠之乱的嘉奖。有明一代文官因军功封伯的一共三人，王越是第二位，王阳明是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

论功行赏是惯例。但是，对于平定宁王宸濠，除了给王阳明“新建伯”外，跟随王阳明平叛的，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一人得到升迁，其他的一概没有下文。而且，王阳明的这个“伯爵”，既不按惯例给铁券，也不给禄米，是没有待遇的“新建伯”。什么原因？因为王阳明讲学引起的争论在持续发酵，因为王阳明的行事作风引起当权者的不满。所以，因宸濠之事受到牵连的王阳明弟子冀元亨，被囚禁在北京锦衣卫大牢之中，虽然经过王阳明多次移文都察院及各部，以及不少言官们极力辩冤，嘉靖皇帝即位后下令将其释放出狱，而其出狱5天后便去世，朝廷却一直没有给予抚恤。



二、王门新弟子

王阳明的预感没错，京中果然是风云突变。当时的内阁首辅仍然是杨廷和，他和他的同僚赞成王阳明的事功，但不满他的讲学。而且在他们的印象中，王阳明是王琼的人。曾任兵部尚书、时为吏部尚书的王琼，在与内阁的斗争中失败，以“交结近侍律”论死罪，因为功劳大，死罪免去，发配戍边。如果逼走一个王琼，召来一个王阳明，岂不和自己过不去？

所以，尽管皇帝有敕书让王阳明进京，大学士们自有办法让这道敕书成为“过去时”。有科道官上疏，说眼下正值武宗死后的“国丧”，朝廷革故鼎新，花去了许多经费，如果此时将王守仁召到北京，就得对他以及跟随他平定宸濠之乱的官员和将士进行犒赏，户部一时间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银子？所以，可让他暂留南昌，“国丧”之后再进京，论功封赏。这道奏疏通过内阁的“票拟”、司礼监的“批红”，催生了皇帝的第二道敕旨，让王阳明等待“后命”。接着，以南京兵部尚书的职务、新建伯的爵位对王阳明进行安抚。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因为已故正德皇帝既无儿子又无兄弟，才由外藩召到京城做皇帝的，所以有自己的难处。其一，皇位尚未巩固，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其二，内阁杨廷和等人是自己的“恩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决策，这皇位由谁来坐，还不得而知；其三，皇帝的父亲是藩王，继承的却是皇位，大学士们让皇帝改称生父为“皇叔父”，称已故弘治皇帝为“皇考”，皇帝不同意，正

在哀求大学士让自己“尽孝”。如此种种，对于人事的安排，皇帝不能不听从大学士们的意见。

赐封“新建伯”的诏书到达绍兴时，正值王阳明父亲王华的77岁生日，喜上加喜。但寿星王华却一如既往地平静、淡泊；当追赠三代、子孙世袭的诏书到来时，王华已在弥留之际，却清醒地催促王阳明兄弟出迎使者。父亲去世了，王阳明得在家乡守制三年，由此赋闲绍兴。

王阳明从来就是闲不住的人。“致良知”的揭出，既是向天下人宣告自己所体悟的“圣人之道”，也是王阳明向自己提出的要求。所以，无论在官在闲，无论是达是穷，皆有兼济天下之心，报效国家的初心不改，“亲民”的责任在胸。为官时可以建功立业，赋闲时可以传播学术。

王阳明从南昌回绍兴时，一批著名的“江右王门”弟子邹守益、魏良器、黄弘纲、何廷仁等，以及“粤中王门”弟子薛侃、日后“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等，都追随他来到绍兴。到绍兴之后，后来在“浙东王门”执掌门户的钱德洪、王畿，也先后投入王门。

正德十六年九月，王阳明由绍兴到故乡余姚祭扫祖坟。这一去，引起了一位县学秀才的关注。这位秀才就是钱德洪。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早就听说王阳明的大名，想往江西投师。但父辈们都知道王阳明早年的个性，是个“问题少年”，也知道他曾经沉溺于佛老，怕钱德洪所投非人，误入歧途，故而加以阻挠。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王阳明的学说受到非议，其实也和他早年的行为方式有关。但如今的王阳明显然今非昔比，不但事功卓著，



而且门人众多。王阳明回到故乡，26岁的钱德洪暗自观察。几天下来，钱德洪信服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宗师。钱德洪办事踏实，沉得住气，一旦决定了的事，就要做到底。他不再顾忌家人的反对，带两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侄子钱大经、钱应扬以及朋友郑寅、俞大本，一起投入王门。听说为人稳重的钱德洪也拜王阳明为师，当地70多人投入王门。

当时入王门需要有人引荐，钱德洪是由王正心引荐的。王畿则是经魏良器引荐。继薛侃、黄弘纲、何廷仁等人之后，魏良器从南昌开始也成了王门的“接引师”。

到绍兴后，魏良器发现有一落魄秀才，住在老师家附近，见到王门弟子来来往往，便背地唾骂。魏良器甚觉有趣，一打听，知道此人姓王名畿，字汝中，与王阳明本是同宗，应该属“愤青”一类。一天，王畿见魏良器与同门投壶雅歌，且饮且唱，有些诧异，问道：腐儒也会玩游戏？魏良器笑道：我等为学，虽然讲究性命天理，其实并不迂腐，也不固执。你心存偏见，故不知其中的乐趣。王畿听后，有些触动。嘉靖二年（1523年），王畿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狂妄之心有所收敛，在听了王阳明的几次讲学之后，觉得合自己脾性，经魏良器的引荐，也成了王门弟子。

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王阳明不只是能讲学，能在讲学中发人心智，而且视事功为学术，在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任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平灭四省“山贼”、平定宸濠叛乱，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和军事才能。所以，不管朝中当权者怎样排挤他，不论学者出于何种原因攻击他，不管社会舆论怎样看待他，他都成为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想在学术上有所造就的，想在仕途上有

所作为的，乃至想倚傍王阳明名头的，都向往着一个名字，那就是王阳明；都向往着一个地方，那就是浙江绍兴。到绍兴去，找王阳明去，成了学子们的梦想和行动，绍兴成了青年学子心中的“圣地”，王学也由此而大兴。

三、无辩未必能止谤

但是，王学越盛，招致的非议也越多。就在王阳明守制期间，京城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嘉靖二年是大比之年，主考官是大学士蒋冕、掌制诰吏部尚书石瑶，二人都是首辅杨廷和的拥护者。不知是出于何种用意，最后一场的“策论”，他们要求考生对“心学”做出评价。

本朝以“朱学”为本，策论题偏偏是“心学”，可以理解为主考官别有用心，也说明“王学”已经影响到方方面面。参加会试的王门弟子为数不少。在钱德洪影响下入王门不久的余姚弟子徐珊，一见策论题，心中气愤，掷笔而起，离开考场，这进士不要了。人们为他因此失去当年入仕机会感到惋惜，徐珊坦然笑道：我宁可一辈子不做官，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师门的不是。但是，另外几位王门弟子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在策论中理直气壮地阐发师门学说，竟然被录取了，说明考官之中已经有人服膺王学。

钱德洪也参加了会试，落第而归。回到绍兴，钱德洪没有为自己的失败叹息，却对主考官的做法愤愤不平。没想到，王阳明问明原委之后，却大为高兴：“圣学从兹大明矣！”钱德洪糊涂了，问道：“时事如此，何见大明？”王阳明笑道：“吾学恶得遍语天下



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此等“圣人之道”，我只是在弟子中宣讲，不可能让天下人都知道。会试以“心学”为题，天下举子无论是者非者，通过官方印行的“会试录”，都将会知道我的学说。是我之说者，必将代我传播；非我之说者，也将起而攻之。这样一来，岂不是会试主考官存心宣扬“圣学”？弟子们听罢，恍然大悟。自作聪明的当权者，本想借着手中的权力扼制王学，没曾想反倒帮助王学的传播。

但是，对王阳明及王学有看法的，不仅是京中的大学士，曾经被王阳明视为最志同道合的湛若水，也对王阳明的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滥收门人越来越有看法。

王华去世之后，正在南京国子监为祭酒的湛若水专程到绍兴祭奠。按照当时浙江的规矩，自家子弟在服丧期间须素食百天，但对于前来祭奠的客人，则烹鲜割肥，以示礼貌，当然也不乏竞奢摆阔之意，杭州、绍兴城市繁荣，风气奢靡，更加如此。王阳明对此已经予以裁革，即使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只能上一两道荤食。湛若水是广东人，不解浙江风俗，更不知绍兴的风气，见菜中有荤，心中十分不满，回到南京后，专门致书王阳明，予以指责。王阳明知道湛若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荤菜为题批评自己的学说。但是，王阳明不想因为争执而扩大二人之间的分歧，所以只是装糊涂，就事论事表示歉意。弟子们表示不解。王阳明解释道：与湛先生讨论“良知”“天理”，必须假以时日。如有数月时间，在一起相与讲学，不经意中因事而发，应可消除歧见。如在书信中反复陈说，不但事情说不清楚，还会引起争端，徒让好

事之人笑话。

在弟子们看来，不管湛若水怎样致书挑战，与老师之间也是君子之争，但小人们反对王学、攻击老师，则完全是别有用心。

就在王阳明守制期间，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充等人先后上疏，要求对王阳明的“通濠”进行核实。这位程启充是四川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进士，为知县而以能吏称，为御史又以直言称，嘉靖元年巡按江西，发现了一批已故宁王宸濠与当时的司礼监太监萧敬、吏部尚书陆完等人的通信，其中，有关于将巡抚孙燧调离江西的内容，而接任的名单中，有南赣巡抚王守仁的名字。所以，程启充在弹劾萧敬等人的同时，请求查处王阳明之罪。什么罪？“阴谋党恶、素与交通，乃贪大之功谬获封爵。”这个罪几乎是完全可以“灭九族”的。

正在南京任刑部主事的王门弟子陆澄写了一份《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逐条驳斥。王阳明闻讯，立即写信，提醒陆澄，“无辩止谤”，让陆澄多从自身行为的检点做起，不与时俗较短长。话虽如此，“无辩”其实未必能够“止谤”，而陆澄的申辩疏也已经上了。朝臣之中，正在为这件事情吵得一塌糊涂，一批御史和给事中“文章”上书，要求革除王阳明的爵位。

此时，显示出16岁的嘉靖皇帝的英明，也说明他对王阳明仍然充满敬意。见群臣不断发起对王阳明的攻击，嘉靖皇帝一面让陆澄噤声，一面自己发话：“守仁一闻宸濠之变，仗义兴兵，戡定大难，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议。”（《明世宗实录》）

可见，“无辩”未必能够“止谤”，是嘉靖皇帝为王阳明主持了公道，是嘉靖皇帝的庇护，使得在绍兴的王阳明逃过了一场劫难。



四、狂者当戒

追随王阳明在绍兴的弟子们，对老师所受到的诽谤、排斥表示不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老师的功劳太大、爵位太隆，引起官员们的嫉妒，是“忌嫉谤”；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老师的学问太高、影响太大，引起学者们的反对，是“学术谤”；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天下慕名求学者越来越多，不免泥沙俱下，良莠难齐，有人借师门招摇撞骗，引起人们的不满，这可以说是“误解谤”。

弟子们的看法，王阳明认为都有道理，但遗漏了最为紧要处。哪个“最紧要”处？王阳明对弟子们说，“忌嫉谤”来自官员，“学术谤”来自学者，“误解谤”来自弟子，但被遗漏的最要紧处，王阳明指了指自己，来自这里。

弟子们不明白老师的意思。王阳明笑道：我到江西之前，还有“乡愿”的意思；到江西之后，特别是近年以来，做了一个“狂者”。人们对我的误解，由此而起。

弟子们知道老师年轻的时候做事不依规矩，曾引起不少非议。但自从贬谪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后，开始处处检点，不与物忤。平日教导弟子，也是强调静坐默思的功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善恶不为念，是非不萦怀，怎么倒成了“狂者”？这“狂者”和“乡愿”该作何解释？

“乡愿”又为“乡原”，这里的“原”和“愿”是通用的，意指恭敬、忠厚。但是，一旦和“乡”联系在一起，称“乡愿”或“乡原”，则成了“伪善”，成了“老好人”的代名词，孔子对其严加鞭

挹：“乡原，德之贼也。”王阳明没有孔子那样地直截了当，而是设身处地对“乡愿”做了解释：所谓“乡愿”，是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与君子相交，则忠信廉洁，于是君子视我为君子；与小人相处，则同流合污，不自清高，以避免他们的忌恨。王阳明说，自己原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近年有所反思，原来正如孔子所说，这“乡愿”看上去两不得罪，其实既讨巧于君子，又献媚于小人，本心已受到破坏，有损“圣人之道”。

这就有意思了，处处检点，不与物忤，并非圣人之道，却有“乡愿”“伪君子”之嫌。

那怎么办？抛弃“乡愿”，做个“狂者”。怎样才是“狂者”？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阳明年谱》）

狂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刻意讨好他人，凭着“良知”行事，只要排除了杂念，就可成为圣人。即使杂念未必完全排除，但行事不加掩饰，心就纯洁，比“乡愿”更接近圣人。王阳明说，自从在江西揭示出“致良知”后，自己逐渐成为“狂者”，不再掩饰自己，不再献媚于他人，所以虽然离圣人更近了，被人误解或得罪人处也就更多了。

虽然是在做自我批评，但得意之处也溢于言表。而这种得意，来自王阳明内心的日益强大。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在进入“圣域”了，试看当年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哪



一个圣人不曾被人飞短流长、说三道四？而且，作为“狂者”，还有孔子的教导为依据。《论语·阳货》记载了一段子贡和孔子的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无论是善者还是恶者，乡人皆好之，这就是“乡愿”，这就是既讨巧于君子，又献媚于小人的结果。那么，“狂者”怎样？是乡人中的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恶之。

但是，对于王阳明以“狂者”行事，不仅“不善者”有非议，“善者”未必能够接受，更有学生把这个“狂”字推向极致。

在所有的门人中，王阳明最器重而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位王艮。王艮随老师从南昌到绍兴，也成了“教授师”，而老师的“狂”又十分对自己的脾性，觉得自己有责任将王学传遍宇内，于是向王阳明请教孔子所乘车辆的规制。王阳明想起第一次见面时王艮（那个时候叫“王银”）的穿戴，不觉好笑，王艮则从老师的笑声中得到了鼓励，回到老家，翻阅古书，创制了一辆“蒲轮车”。这辆“蒲轮车”，以蒲草包裹轮子，减少震动，轮子的直径据记载有六尺，王艮告诉别人，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乘坐的就是这种车。

王艮带着弟子，乘着这辆巨型车，一路招摇，来到京师北京。京师有位老人，头天夜里梦见一条无头黄龙，腾云驾雾，来到崇

文门。一觉醒来，便往崇文门，想看看梦中所见是真是假，刚巧遇上王艮驾车而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京城轰动，人们都将王艮视为怪物。一打听，这怪物竟然是王阳明的弟子，攻击王学的人们添油加醋，诽谤之声又甚嚣尘上。京师同门力劝王艮稍事收敛，王阳明得到消息，传书王艮立即回绍兴。

此时王艮已年届四十，见到老师之后，垂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王阳明又是生气，又是好笑。这个弟子悟性极高，又极有个性，但意气太盛，做事太离奇，必须杀杀他的性子。王艮跪在老师家门口请罪。王阳明进进出出，视而不见。到了第三天，王阳明出门送客，见王艮仍然跪在门旁，还是不予理睬。王艮高声嚷道：弟子知错了！王阳明打算再治治他，仍不予理睬。和客人道别之后，王阳明径自向书房走去，没想到王艮跟在后面，当庭跪倒，大声叫道：“仲尼不为已甚者！”（黄宗羲《明儒学案》）

王艮的话大有讲究，出自《孟子·离娄》，意思是孔子行事，包括责罚弟子，从不过分。言下之意，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太过分了。王阳明闻言，猛然一惊，自己对这位已经闯出了极大名头的弟子确实有些过于苛责了，便急忙返身，将王艮扶起。而从王艮的这番招摇，王阳明倒是看出了自己过去的几分影子，这不正是所谓“狂者”吗？看来，物极必反，“乡愿”固然不可取，“狂者”也非“圣道”。

【第十二讲】

心中有良知，
满街皆圣人



一、“花草”与“善恶”

从“乡愿”到“狂者”的转变可以看出，随着事功的卓著、名声的日隆，王阳明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以“圣人”自居，越来越不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原来，少年时代所养成的不事边幅、豪迈不羁的习性，竟然是如此根深蒂固。虽然通过娄谅先生的教诲，通过“百死千难”的修炼，看似已经有了改变，但骨子里的这股“豪迈不羁”仍然长存，既支持他不断排除各种险阻、渡过各种难关，也推动由“乡愿”而为“狂者”，旁人越是说三道四，就越是我行我素。

这种转变也很容易理解，人都有七情六欲，哪里说戒就可以戒得了。如果真正戒了，那倒真正是“出世”了，但王阳明恰恰是“入世”。但是，王阳明的伟大，正在于随时自我反省，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方式。

一边是王阳明在反省自己的内心、修正自己的行为，一边是京中的形势在发生逆转。年轻的嘉靖皇帝在与大学士们的斗争中，逐渐开始掌握主动，也越来越心狠手辣。在一帮被称为“小人”的中下级官员的支持下，凭借着君主集权的国家机器，在一场由“大礼议”转化的权力斗争中，嘉靖皇帝迫使杨廷和等一大批元老重臣及反对派退出官场，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皇帝的父亲名正言顺地被称为“皇考”，后来更被迫尊为皇帝，牌位也进了太庙。根据在“大礼议”中的表现，嘉靖皇帝对臣子们分为三类处置：支持皇帝的，提拔重用；反对皇帝的，贬谪斥用；不吭声

不表态的，闲置不用。

尽管王阳明的“心学”在一定程度上为嘉靖皇帝的议礼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几位著名的王门弟子方献夫、黄绾等人都支持皇帝议礼，并因为议礼而得到重用，王阳明却由于种种原因，在“大礼议”中保持沉默。嘉靖皇帝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希望有王阳明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但王阳明却不说话。睚眦必报的嘉靖皇帝由极度的期望转为极端的失望，于是在王阳明守制期满后，仍然让其赋闲绍兴。

在此后的日子里，王阳明继续在绍兴讲学授徒，继续阐释自己对“致良知”、对“亲民”、对“知行合一”的认识，但是，弟子们发现，“狂者”王阳明逐渐回归到平和，当然不是退回到“乡愿”，而是以更加包容、更加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和学术。

一天，王阳明和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惊喜地发现，一簇簇树丛破岩而出，鲜花盛开，大概老师这段时间不断在说“心即理”“心外无物”，于是问道：

（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问得好，此树此花，在山中自生自灭，与我何干？没想到，老师笑了：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个关于“花”的故事，通过历史教科书为人们所熟知，并且成为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证据。但是，王阳明正是借此阐述他的主张：“心即理”，“此心在物则为理”。怎么说？你的心在此花上，此花也就在你的心中，便明此花之理；如果你心不在此花上，花也就在你的心外，便不明此花之理了。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花的故事，发生在赣州或南昌。

一天，王阳明和弟子在花圃除草，烈日当空，薛侃感慨道：

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王阳明随即借物说事：

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十分“客观”的王阳明的形象。

当然，薛侃不肯到此为止，继续发问：

然则无善无恶乎？……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佛教讲究的也是无善无恶，先生是否真的“入禅”了？

王阳明回答：当然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

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

薛侃追求：

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既然草非恶，那就不用不着去草了。王阳明断然否定：

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

王阳明借此花与草，将“圣人”之“善恶”观与佛教之“善恶”观做了重要的区分：一、佛教的“无善无恶”，是“出世”的理由；“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强调不以内心的好恶看待世界万物。二、佛教讲究的是“出世”，所以见善可能为但见恶却未必除，故非“治天下”之道；“圣人”虽不让内心的好恶蒙蔽自己的判断，但并不影响为善除恶，这才是“治天下”必需的态度。

这个观点和王阳明的“亲民”观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如果停止在“明明德”上，就是佛家，如果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这就是“圣学”。



作为王阳明在赣州的“首徒”之一，薛侃也在不断的请教与难解难分的辩论之中，激发王阳明的学说灵感。由于悟性高，薛侃也便十分自负，十分赞赏孔子所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且向老师提问：上智下愚为何不可移？

王阳明自己有天赋，所以收弟子也讲究天赋，但也注重学生的后天努力。对于薛侃的提问，他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感受：“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传习录（上）》）上智者见事准，办事有效率，特别是能够不断向他人学习，以修正自己。他们不愿改变自己，这是有主见。下愚者见事迟，办事缺乏效率，更要命的是自以为是，不肯向别人学习。他们也不愿改变自己，这就是固执。所以孔子说上智与下愚不移。

二、泰山不如平地大

嘉靖五年（1526年）会试，钱德洪和王畿双双中式，但不满当国者攻击王学，二人一商议，放弃殿试，与会试下第的黄弘纲、张元冲，一路讲学，回到绍兴。见了老师，钱德洪等人述说沿途讲学的故事，说我们在讲述中发现，人们对“圣学”有信的，也有不信的，由此也得出一个结论，从对老师和“圣学”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人品的高下。

这倒是个新观点，王阳明有点感兴趣了，问道：何以见得？

钱德洪说：“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

老师您就是泰山北斗。泰山在面前，人人都得仰视。见到泰山而不仰视，那不是没长眼睛吗？说明人品有问题，不承认高人，

不敬重圣人。

如果在几年前，王阳明也许口中不说，心中却会认同。但经过这几年的磨砺，王阳明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钱德洪发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王阳明反问：“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人们只知道泰山高，却不知泰山的高是被平地烘托而成，没有平地之大，哪里有泰山之高？更何况，人生大多如平地，哪里天天登泰山？就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意味着王阳明认识上的又一次脱胎换骨，意味着王阳明的返璞归真，这才是真正入“圣域”，真正的“圣人”境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伟大人物，当其自视伟大、自视为泰山北斗时，其实并不伟大；只有当其自视为平地，归之于平淡之后，才是真正的伟大。

就着这个泰山与平地，王阳明把问题拉了回来，问钱德洪，你们说沿途讲学，有人信，有人不信，你们是如何讲学的？

钱德洪等人大概告诉了老师，说他们讲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亲民”而非“新民”；又讲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等等。

王阳明笑了：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这有意思，怎样才能做得个“愚夫愚妇”？“愚夫愚妇”关心的是什麼，他们的梦想是什麼？钱德洪出身于浙东大族，从小吃



喝不愁，可能还真没有关注“愚夫愚妇”关心什么、梦想什么。就像伟大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宝贝儿子司马衷，有人说天下灾荒，饿殍遍野，司马衷奇怪，他们那为何不吃肉粥呢？如果王阳明没有经历过巡视刑部大牢，没有经历过录囚江北，特别是如果没有经历过贬谪龙场以及在庐陵知县、南赣巡抚任上与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大概也不知道“愚夫愚妇”关心的是什麼，梦想的是什麼。

王阳明告诉学生，也提醒自己，自己的学术、自己的心得、自己的“圣人之道”，不仅要让学生接受，更要让普天下的人们都接受。要让普天下人接受，那就得关心普天下人，特别是“愚夫愚妇”所关心的事情。

那么，“愚夫愚妇”关心的是什麼，梦想的是什麼？是日常用度，是自己及家人的生老病死。王阳明在赣州制定《南赣乡约》、设立平和等三县，正是由此而起。普通民众、愚夫愚妇的“心中贼”，多由日常用度、生老病死而起，“衣食足，知廉耻”，要破除他们的“心中贼”，必须从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用度、生老病死着手，同时建立起对待日常用度、生老病死正确态度。这也正是王阳明的“心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和程朱“理学”最大的区别之一，更多地注入了对个体的人文关怀。王阳明“心学”的本质特点，是“实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既是为治国平天下而发，也为“百姓日用”、为“亲民”而发。

自己如此，学生也如此，必须收敛起狂傲之心，建立起对他人的敬意。《传习录》记载了两件类似的趣事：

一天，王艮出游而归。王阳明问道：“游何见？”王艮答道：

“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笑道：“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你看人人都是圣人，人人看你也是圣人啊！

又有一天，董沄出游而归，见到老师便说：“今日见一异事。”王阳明问有何异事？董沄兴奋道：“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毫无诧异，问道：“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董沄把满街都是圣人视为怪事，王阳明说这很正常啊，有何奇怪？

董沄字复宗，“萝石”为其号，以擅长作诗闻名江湖。嘉靖三年，68岁的董沄来到绍兴，这是当年娄谅在上饶接待王阳明时的岁数。董沄听说王阳明正在与弟子会讲，前去观摩。王阳明见是长者，又问明是董沄，连忙下坐迎接。董沄也不客气，和几年前的王艮一样，昂然上坐。董沄年事虽高，谈锋却甚健，这次来绍兴，其实是想看看王阳明是否真有学问，是否是浪得虚名。会讲之后，董沄和王门弟子何秦交流感想：见过不少谈论学问之人，个个都是道貌岸然，其实学无根柢、支离破碎，说到实用，如木偶人一般。其中更有卑劣之辈，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哪里会去真心做学问？我以为今世已无学问可谈，今日听了阳明先生论良知，如梦方醒，才知道天下学问原来在此。如果不入阳明门下，可谓虚度此生。

但是，王阳明听说董沄要入王门，连连摆手，说哪里有学生比老师年长十多岁的道理。但董沄决心已定，不入王门，决不离去。王阳明被董沄的态度感动，比王阳明白15岁的董沄成了王门最年长的弟子。原来诗社的朋友取笑董沄，说你如此大年纪，何其硬找个老师来管束自己？董沄笑道：今日入王门，我才真正脱离了苦海，我这是“从吾之好”，从此以后，以“从吾”为号。



记载这两件事情的钱德洪解释说，为何老师对相似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这是因为王艮天赋既高又狂放张扬，老师随时提醒，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董沅入师门较晚，偶有所得，老师在不经意间给予鼓励，满街都是圣人，你也是圣人，不足为奇啊！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和弟子叶宗兗的一段十分有趣的对话。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

人的品质、素养，不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而论，犹如黄金的纯度，不以斤两的多寡而论。所以，“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三、儒佛老庄，皆为我用

这些讨论，反映出王阳明对自己的认识在发生新的变化。从小汲汲以求要为圣人、汲汲以求要寻求为圣之道，原来，圣人就在自己的身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地位有高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只要心中有良知，只要按良知行事即“致良知”，无分尊卑贵贱，愚夫愚妇，皆为圣人。

王艮后来继承了王阳明的这一理念，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天下的道理，圣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比“百姓日用”更重要。

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否则，只是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二程到朱熹，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说，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为着解决社会问题，都是为医治时代弊病而开具的药方，都是为着唤醒人们自身的自觉。

其实，唤醒人们自觉的，不仅仅是孔孟、程朱，也不仅仅是陆王，佛老之教的宗旨，也是唤醒人们的自觉。王阳明早年曾醉心于佛老，后来逐渐感觉到佛老之非，所以在杭州灵隐寺喝醒了僧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自己对生活、对学术有更多的体验之后，王阳明对于佛老又有了新的看法。

嘉靖二年十一月，刑部尚书林俊致仕，回福建莆田老家，路



过杭州，绕道绍兴，来见王阳明。林俊是成化十四年的进士，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还早一科，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及嘉靖初，林俊都以持正敢言、不避嫌疑著称。王阳明对林俊十分敬重，听说他以70多岁的高龄，枉道探访，连忙带着几个弟子前往萧山迎接。谈起时事，林俊不胜感慨，鼓励王阳明不负初志。

送走林俊，在回往绍兴的船上，弟子张元冲想起一个自己这些天来一直无法勘破的问题，请教老师：

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著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陆九渊开始，人们就将心学视为“禅学”。王阳明在重刻《象山文集》的序文中，还专门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虽然在事实上，从唐代以来，儒、佛、道三家便开始有了合流之势；所谓“禅宗”，本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产物。但正统的儒学家如韩愈、朱熹等，或者对佛学取批评态度，或者小心谨慎地与禅学划清界限。明代成化、弘治间有位著名的学者陆容，津津乐道地说了一个儒者与僧人的对话。僧人吹嘘道：“儒教虽正，不如佛学之博。如僧人多能读儒书，儒人不能通释典是也。”儒者反击：“譬如饮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决不食之矣。”（《菽园杂记》）从这个记述中，可以看出传统士大夫对佛老的态度。在反对王学的人中，也有不少将王学视为禅学。不少年

轻人向王阳明问学，要先打听王学是否真的有别于禅学。

张元冲向王阳明请教，措词十分谨慎。他一面继承师说，认为由于佛道在关于“性”与“命”的解释上与儒学所差只在毫厘之间，只是因为强调出世，与儒学强调的入世恰恰相反，才最终相差千里。另一方面，却试图否认这个“千里”，提出佛老有助于“圣学”，有益于“我身”，不应予以排斥，而应该兼容并蓄。可以说，虽然是提问，张元冲其实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但是，张元冲万万没有想到，王阳明的问答竟然大大突破了自己的心理界限：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已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年谱三》）

一席话，令张元冲兴奋不已。老师的胸怀实在是博大无边，老师的学问实在是深不可测，原来，天地万物本是一体，只是被后儒们分割开了。经过王阳明的这番解释，强行区分儒学与佛、老的区别，便是多余的了。特别是老师的最后一句话，更使张元冲和同行的弟子升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圣人与



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

这个认识，和王阳明一再强调的“万物一体”一脉相承，乃王阳明“一以贯之”的认识。《传习录》节录王阳明给顾璘的信有这样一段话：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中）》）

王阳明及其学说，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成果，所以，王阳明的学说也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是“以方寸之心”，“体天下万物”“容天下万物”“化天下万物”，这才是王阳明的“心学”。

在王阳明的一生中，每当对自己的“学问”有所阐发的时候，总会有“事功”等着他去验证。而王阳明又总是在“事功”中，对自己的“学问”有新的体悟。这一次也一样，新的“事功”又在召唤着他。

四、“天泉论道”

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初六日，兵部派出的使者带着公文来到绍兴王家。公文说，两广未靖，命王守仁以南京兵部尚书总制军务，速往广西勘处。

此时，王阳明在绍兴已经赋闲了将近6年。在这6年中，尽

管不断有人推荐王阳明做兵部尚书、总督三边、提督京营，也不断有人推荐王阳明入阁做大学士。老友席书此时已是礼部尚书，发表了一番代表人们的普遍看法却又得罪无数人的言论：“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阳明年谱》）但是，这些建议只能使一拨又一拨的当权者对王阳明更加忌惮。更何况，对王阳明在“大礼议”中的态度极为失望的嘉靖皇帝，是不可能轻易让王阳明出来“工作”的。这次朝廷派使者到绍兴来，是因为广西田州出事了。巡抚都御史姚镆一筹莫展，于是朝廷想起了王阳明。

两年前，和王阳明相伴了近四十年的妻子诸氏去世；7个月前，继室张氏为王阳明生下了一个儿子，但王阳明的身体眼看也越来越虚弱了。见到兵部的公文，王阳明立即上疏，陈说自己重病在身，无法胜任兵甲的劳顿，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皇帝的敕旨驳回了王阳明的请求，加大了王阳明的职责：以原官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两广、江西、湖广四省军务。为了让王阳明实心办事，皇帝命两广巡抚姚镆致仕，让正在广西的镇守太监郑润、总兵官朱麟，停止该管事务，广西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不得掣肘，由王阳明负全责。这就是嘉靖皇帝的办事风格，不用你的时候，让你赋闲6年；用你的时候，所有的权力都给你。在当时的明朝，由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没有比这权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了。王阳明懂得侍君的道理，事情到了这个分上，不能再推辞、再耽搁了。

这时的绍兴，已成为全国的讲学中心，常年聚而不散的弟子有三四百人。远远近近的寺观都住满了，常常是几十人挤在一处，



晚上轮流睡觉，歌声通宵达旦。一到王阳明讲学时，几百人前后左右环绕而坐。为了讲学的方便，王阳明在嘉靖三年建了稽山书院，仍是容不下日渐增多的求学者。嘉靖四年十月，弟子们又在绍兴城西门内自行筹建了阳明书院。另外，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在王阳明的老家余姚龙泉寺还有定期聚会。



阳明书院中天阁

对于老师的复出，弟子们自然是高兴。但老师的两广之行，肯定又是旷日持久。钱德洪和王畿是王阳明在绍兴时收的弟子，虽然入门时间不长，却已显示出在王门的地位。但二人性格禀赋却大不一样，王畿机敏善辩，钱德洪踏实持重，因而对于师门的教训也就有不同的理解。

嘉靖六年九月初七日，钱德洪和王畿一起来到张元冲的船上，

讨论为学的宗旨。

王畿首先提出疑问，说先生近来有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我看，未必是不易法言。

钱德洪是师门学说的坚决恪守者，一听王畿对师学提出疑问，有些紧张，问道：此话怎说？

王畿解释说：如果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意”有善恶，那么“心”也应该有善恶。

钱德洪不同意王畿的解释，他认为：心体是与生俱来的，原本无善无恶，但人生下来之后，会染上各种习性，于是就有了善恶之念头。为善去恶，正是恢复原来的本体。

可以说，王畿是在恪守王阳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旧说，钱德洪则开始接受王阳明正在形成的新说。

二人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一起来见老师。王阳明已定在次日启程前往两广，夜分时刻，客人陆续散去，王阳明正想就寝，听说钱德洪和王畿在门外等候，有些诧异，连忙出来询问。听说他们正在争论“四句教”，不禁一喜，说我正要二位有此一问。

王阳明与王畿、钱德洪一起来到住宅附近的天泉桥上，让二人再将各自的意见说一遍。听完之后，王阳明笑了：朋友中还无人对这“四句教”提出异议的。你二人的见解，其实正好相辅相成，却不能因各持己见而相病：汝中（王畿）应用德洪的“功夫”，德洪应悟汝中的“本体”。



钱德洪本以为自己是捍卫师说，没想到被老师各打“五十大板”。他对此表示难以理解。王阳明解释说：入我王门的有两种人。一是“利根”之人，一是“中根”以下之人。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可直接从本源上领悟到心的本体，“中根”以下之人本体受了习性的蒙蔽，故应为善去恶，等“功夫”熟透之后，才可明尽本体。

王阳明见二人若有所思，继续说道：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引利根人的法门；德洪之见，却是我这里接引中根以下人的法门。二者不偏不废，相取为用，这样，中根上下之人皆可得道。世上“利根”之人极其难得，颜子、明道也不敢承当。如果只依汝中之见，岂不将他二人也拒之门外？人生在世，少有不染习性的，如果不教他们在“良知”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一切都不着实处，只去悬空想个“本体”，岂不养成了一个“虚寂”？

听了老师的这番话，钱德洪觉得自己的感悟有了依托，王畿则因为被老师称为“利根之人”而有些自得。王阳明再次叮嘱说，我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不是小事，所以不能不对你二人说破，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

王阳明对这“四句教”的解释，看似复杂，其实是对孟子及自己原来所说的“良知”为“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的修正。即使颜子、程颢，也不敢说不经过“致”的功夫、“致”的过程就直接达到心的“本体”，就直接抵达“良知”。人之初，性本无善无恶。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到“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恰恰是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过程，也是人们从建

立“良知”到“良知”被蒙蔽，再到“致良知”的“知行合一”的过程。

正是这个“四句教”，使得王阳明“心学”所揭示的“善恶”之念、“致良知”之意与人类思维的过程更相吻合，也更加具有科学性。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论是王阳明还是陆九渊、朱熹，以及孟子、孔子，乃至佛祖释迦牟尼、禅宗六祖惠能，他们的学说、思想，也都有一个动态的、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所谓“圣人”“圣人之道”，瞬间的“顿悟”只是表象，长期的“体悟”才是事实。一切“顿悟”，都是“渐悟”的阶段性成果，只要思维还在，行为还在，这个“渐悟”的过程是不会中止的。正如王阳明对于“四句教”的阐述，如果天假年月，还应当继续。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儒家学说，类似于六祖惠能对于禅宗，他的贡献是把儒家学说中带有永恒意义的思想提炼出来，让儒学从宋儒连篇累牍的书卷中解放出来，从“学者学说”解放为“百姓日用”之学，解放为直透内心、唤醒“良知”之学。但是，与禅宗不同的是，并且也是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推进，王学主张，不仅要唤醒良知而“为善”，还要唤醒良知而“去恶”，这才是“致良知”，才是“知行合一”。

【第十三讲】

最后的行程



一、事功即是学问

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日，王阳明告别妻子张氏和不到一岁的儿子，告别家乡绍兴，踏上他多次由浙江去往江西的道路。沿着富春江—衢江，经富阳、桐庐、衢州到常山，然后经草坪驿到江西玉山、上饶，再在上饶登船，由信江经铅山、弋阳、贵溪、余干进入鄱阳湖，再入赣江。一个月后，王阳明来到江西省府南昌。

南昌父老早已将“阳明先生”视为神明，城里城外，顶香而立的居民填途塞巷，王阳明乘坐的轿子无法通行，被人们从头顶传递到都司衙门。王阳明为南昌父老的情谊所感动，到都司衙门后，立即接见当地父老。人们从东门进、西门出，几个时辰过去，仍然是人流不息。有人从西门出来后，又从东门进去，再看一眼这位与常人并无太大区别的“阳明子”。

江西民众的这种热忱，王阳明在自己家乡也从未见过。他用诗句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南浦道中》）

民众是纯朴的，只要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们就将以他们的方式，给你树一树丰碑。《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在江西为巡抚时的一件事情。有一属官诉苦，说长期听先生讲学，心向往之，

只是因为簿书压案、讼狱繁难，没有工夫跟着先生学习，如何是好？王阳明听后觉得好笑：

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

我何尝要求你们离开工作去学习？你既然有工作，就应该从工作中学习，在处事上磨砺，这才是真正“知行合一”，才是真正“格物”。那么，如何在事上磨砺？王阳明就这位属官的“簿书讼狱”即案卷、案情为例，做出详细的解释，提出了“六不可”：

第一，不可因应对无状，便起了个怒心；

第二，不可因言语圆转，便起了个喜心；

第三，不可因恶其嘱托，便要加意治之；

第四，不可因怜其孱弱，便要加意宽之；

第五，不可因事务烦冗，便想随意断之；

第六，不可因旁人罗织，便想随意处之。

所有这些“怒心”“喜心”“加意”“随意”，都是掩蔽“良知”的“私念”。除去种种“私念”，就是学问，就是“致良知”。你既有官司之事，便应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王阳明特别指出：

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在王阳明的理念中，在王阳明的行为中，学问、事功从来就是一件事，这就是“知行合一”。在他那里，没有不落在实处的悬



空学问，也没有脱离学问的盲目事功。他是以做学问的办法从事政务、军务，又在政务、军务中提炼学问、揭示良知。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和“愚夫愚妇”探讨“百姓日用”，所以，也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从“愚夫愚妇”那里得知真实的情况。“此心在物则为理”，这就叫“心即理”。

告别南昌父老，王阳明登舟南行。前面就是丰城黄土脑，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王阳明就是在这里得知宁王宸濠发难的消息，转眼就是八年了。经临江、吉安、龙泉、赣州、南安，一路上都是故地重游，父老、诸生迎来送往。在南安弃舟登陆，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地界。由浈水、北江、西江，王阳明于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两广巡抚的开府地广西梧州。初到梧州，王阳明便凭着他的“知行合一”“不耻下问”，将田州、思恩土司“作乱”的前因后果理出了头绪。

田州、思恩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省会南宁市的西北。南宁市的武鸣区，在明朝属思恩州；1929年邓小平领导“右江起义”的所在地百色，以及著名的长寿县巴马，在明朝都属田州府。

广西是瑶、僮（即壮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明朝政府首批推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民之间，当地居民与明朝地方政府之间，一直存在一些在当时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总是难以安宁。从嘉靖二年开始，田州各土司相互攻伐，遂有岑猛父子之乱。岑猛家族世代为土司，据说是东汉名将岑彭之后，在当地有极高威望。明朝在两广的地方官利用土司间的矛盾，杀死岑猛及其长子，并就此废除田州的

士官，改设汉人流官。到了嘉靖六年，岑猛余部卢苏、王受等人乘着官军松懈，以岑猛未死相号召，并扬言在交趾借兵20万，一呼百应，不但攻占了田州府城，而且攻占了思恩府城（今广西武鸣），声势浩大，明军损兵折将。

二、“良知”的力量

根据这些情况，王阳明向朝廷提出以抚代剿、土流并用的方案。为了确保自己的方案得到朝廷批准，王阳明分别给大学士杨一清和京中弟子方献夫、黄绾等人写信，说明事情的原委。给杨一清写信，既表示尊重，也是私下沟通，争取支持；给方献夫、黄绾写信，则是让他们随时注意动态，排除阻力。

这也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是问心无愧，是朝廷、土司及民众的“三赢”；“致”是功夫，是如何达到“三赢”的目的。做人要君子、办事上手段是王阳明的一贯作风。当然，在一些认死理的士大夫眼里，王阳明不按常规出牌，非君子之所为，他们甚至以此作为自己办不成事情的理由，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对王阳明的诽谤、非议，有些属学术分歧，有些则是针对其行为方式的分歧。

不出王阳明所料，以抚代剿的奏疏下到兵部，兵部提出五条理由予以驳斥。但是，由于王阳明给杨一清打了招呼，杨一清为了国家大局，再次出手相助。方献夫、黄绾则上下疏通，排除阻力。结果，内阁替皇帝起草批复：“守仁才略素优，论奏必有所见。但未经询谋佥同，恐非定论。令与镇、巡等官熟计以闻。其



应施行者，亦许以便宜从事。”（《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六）

虽然说“恐非定论”，却仍然“许以便宜从事”，这就是批准。有了这个批复，王阳明可以按自己的意图办事了。其实，得到朝廷批复之前，王阳明已经将行营搬到浔州（今广西桂平），并且遣散了前任巡抚从各地调来的几万军队，只留下湖广永顺、保靖地方的几千士兵，而且下令，统统解甲休息，以示招抚的诚意。

正如王阳明给朝廷的报告所说，卢苏、王受等人起事，本是迫不得已。官军大兵压境，巡抚等官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必欲置之死地。卢苏等人求生不能、求降不得，只得拼死顽抗，官军竟然奈何不得。听说王阳明总督四省军务，领兵进剿，卢苏等人十分紧张，都知道这位“阳明子”来者不善。后来消息传来，说总督来广西，知道他们的举动是出于无奈，已经上奏朝廷并得到批准，要行招抚。卢苏等人开始不信，但眼见军队先后遣散，又不能不信。

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王阳明将行营搬到了离田州、思恩更近的南宁府（今广西南宁）。卢苏、王受召集大小头目商议，人们慑于王阳明的威名，多主张接受招抚。但是，这位王总督曾经诱杀过浚头首领池仲容，谁能保证他不用对付池仲容的手段对付自己？卢苏、王受左右为难，但人心已散，不挺身而出也不行。左思右想，顾不得许多，将能够召来的部属，统统带到南宁，驻扎在城外，总共有7万多人。

卢苏、王受二人自进城去，该杀该剐，听天由命。王阳明将二人召到大堂，口中历数二人的罪行，心中赞赏二人的担当。但是，对于他们却不能不有所惩罚，否则，一有矛盾就扯旗起事，

天下哪里还有太平？王阳明命武士将二人拖翻在地，在大堂之上施以杖刑。杖后宣布，往事一笔勾销，卢苏、王受立即释放。

卢苏、王受万万想不到，领头起事几年，官府损兵耗饷，一顿棍棒就算了结，不禁千恩万谢，感激涕零。王阳明和卢苏、王受一道出城，安抚部众。7万多当地民众，欢声雷动。王阳明让卢苏等人遣散部众，各回原来的居住地，等候朝廷的处理。自己召集幕僚，商议善后事宜。王阳明一直认为，善后妥当与否，比用兵或招抚更为重要。处理得当，可以有相当长久的太平；处理不当，自己前脚离开广西，也许大乱后脚就要发生。南赣如此，广西也如此。

根据王阳明的建议，朝廷批准将田州府改名为田宁府，设流官知府。府下仍设田州，以土司为知州；又设十九个土官巡检司，卢苏、王受等人皆为巡检。田州及巡检司土官均受流官知府节制。思恩州也采用流官统驭土官的办法。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是王阳明在赣州时得出的结论。田州的“山中贼”是受了招抚，但“心中贼”却不是靠招抚可以做得到的，为此，王阳明做了三件事：一、请老师。将在广东揭阳县任主簿的弟子季本调到南宁，主持“敷文书院”，加大讲学的力度。二、讲礼仪。因为来南宁游学的福建生员陈大章通晓礼仪，王阳明让他在府学中专门教学生习礼仪。三、找生源。田宁府学缺少生源，王阳明命广西按察司提学官动员各地学生来田宁府学读书，官府给予优厚的待遇。“心中贼”并非只存在于“山中贼”心中，更存在于各级官员的心中，为此，王阳明告诫广西各地官员，要克制心中的私欲，要廉洁奉公，善待各族民众。王阳明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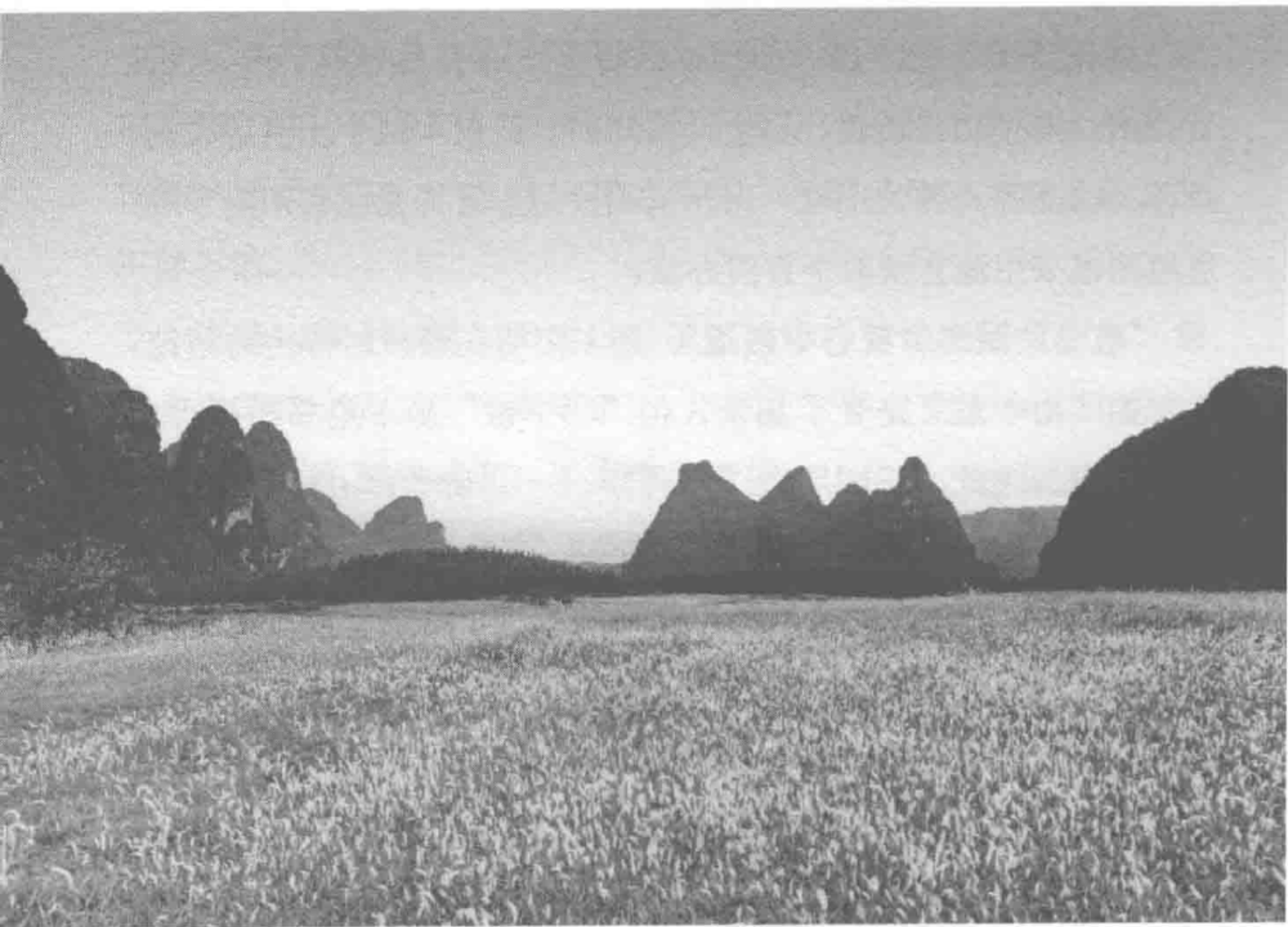


望通过这些办法，特别是希望通过“良知”的力量，在广西推行教化，安定一方。

三、暗度陈仓，功高遭忌

就在明朝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田州、思恩的时候，广西有几股影响比卢苏、王受更大的势力，正以大藤峡、八寨为据点，四出活动，劫掠州县。

大藤峡位于今广西桂平西北约 60 里处，与 300 年后太平天国



广西永福县

“首义”的金田村只有一山之隔，明朝属广西布政司的浔州府桂平县。但是，大“大藤峡”的概念则泛指包括今日沿柳江—黔江—浔江一线东西数百里长、南北上百里宽的瑶族和壮族居住区，地跨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平南、藤县、梧州等处。

“八寨”指明代思吉、周安等八个瑶民村寨，都在今天广西永福县境内，明朝属广西布政司桂林府古田县，在大藤峡以北 300 多里。

大藤峡和八寨与田州、思恩一样，从唐宋以来就属羁縻州县，大大小小的酋长也就是各州各寨的土官。明朝建立以后，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加强了，但也时时发生一些动荡。有因民族压迫而导致的民族矛盾，也有因官府包括汉官、土官对民众的剥削而引起的阶级矛盾，还有土司、土官即少数民族的酋长挑起的民族矛盾。

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四省军务，又兼着巡抚两广，虽然朝廷只是让他处置田州、思恩的卢苏、王受，但平定大藤峡、八寨的局面，理所当然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不知是早有成算，还是灵光一现，嘉靖七年七月，王阳明在遣散卢苏等部、遣返湖广士兵时，将其分成两路，分取八寨及大藤峡。这次军事行动是在遣散士兵的烟幕下进行的，正是兵法所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小据点皆被摧毁。令官府头痛 100 多年的问题，竟然被王阳明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平田州、思恩，平大藤峡、八寨，两次行动都出乎人们的意料。朝廷让王阳明总督四省军务，是要对田州、思恩用兵进“平”，王阳明却用了“抚”；大藤峡、八寨折腾已久，朝廷对这两个地方的用兵已没有信心，只是极力“抚”，王阳明却用了“平”。



而且无论是抚是平，都没有另外调动一兵一卒，也没有向朝廷索要一分一毫的军饷。这在明朝又是闻所未闻的故事。

消息传开，朝野上下皆感诧异，是真的？莫非王阳明在欺瞒朝廷？嘉靖皇帝头一个觉得不可信。他亲笔写了手诏给内阁，询问王阳明是否夸大其词，并问及王阳明的学问是否真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实为“伪学”。兵部不相信，所以对王阳明为将士请功的要求，迟迟不作答复；户部也不相信，要对王阳明提出的增设州县报告进行勘覆。

对当权者们的态度，不但王门弟子极为不满，翰林院掌院学士霍韬也拍案而起，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长达 3000 字的《地方疏》，为王阳明鸣不平：此处罹患积年，朝廷用兵数十万，劳而无功，王守仁片言只语，思恩、田州遂定；八寨、大藤峡，阻山隔水，王守仁一举平定。论者以朝廷仅命征思、田，而王守仁擅自用兵八寨、断藤峡，却不知大臣奉命出师，苟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安可瞻前而顾后，坐失良机？何况王守仁总督四省军务，敕旨明言，“应施行者，亦许以便宜从事”。霍韬特别提出宁王之事，以示警告：

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明史·王守仁传》）

对于霍韬的质问，皇帝只是批了三个字：“知道了”，除了派一位在当时微不足道的行人冯恩去两广奖励王阳明、招抚田州卢苏

外，再也没有下文。而此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一方面上疏朝廷，请求派人接替自己的职务，一面移居船上，沿着西江缓缓东行，等候朝廷的旨意。

四、此心光明

去年，嘉靖六年的九月初八，王阳明告别妻子张氏，在众弟子的陪同之下，离开绍兴，开始了广西之行。今年，嘉靖七年九月初八，王阳明已经从广西南宁来到广东广州，并且在这里迎接朝廷派来的使者，行人冯恩。这时，他已卧病一个月，也就是说，在袭破八寨和大藤峡时，王阳明的病情已经开始沉重了。

冯恩是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五年的新进士，朝廷派他到两广嘉奖王阳明，可见对王阳明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并不重视。但是，对冯恩来说，此行却是一种机缘。他是王学的信徒，又极具个性，有一股舍生赴义的气概，所以后来得了“四铁御史”的雅号，说他“口如铁，膝如铁，胆如铁，骨如铁”（《明史·冯恩传》）。

到广州后，冯恩向王阳明宣读了朝廷的旨意，这是公事。公事办完，冯恩办自己的私事，要求入王门，成了王阳明的关门弟子。

在这段时间里，最令王阳明感到意外而又激动的是，当乘舟从南宁沿西江东行，至横州以东约60里时，船夫指着眼前的一片沙滩说道：这里叫“乌蛮滩”，又叫“伏波庙前滩”，有汉伏波将军庙。王阳明一听“伏波”二字，不觉眼前一亮。40多年前自己从



居庸关回北京时，曾经梦见过自己拜谒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庙，还在梦中写过一首诗，至今历历在目。没曾想人到暮年，还真的路过马援庙。他命船夫将船靠岸，在侍从的搀扶下，来到破旧不堪的马援庙。庙虽然破旧，庙中所塑的马援像却和自己40多年前在梦中见到的一样，不禁大为惊讶：人生多少事，竟是这样难以捉摸！

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谒伏波庙》）

袭破八寨、大藤峡之后，王阳明在向朝廷报捷的同时，也向朝廷陈诉了自己的病情，请求回家乡治病，并推荐原广西布政使、现任郧阳巡抚林富接替自己的职务。但将近3个月过去，却未见朝廷的批复。

这也难怪朝廷。自出仕以来，在王阳明给朝廷的奏疏中，几乎每次都说身体不好，都说力不从心，但每次又都出人意料地将事情办得那么漂亮，那么令人嫉妒。不仅如此，每次还都有闲暇与人讲学。这哪里像是有病？分明又是在向朝廷要挟。而且，这一朝天子嘉靖皇帝是不好糊弄的，杨一清、张璁、桂萼也个个精明过人。他们要看王阳明下一步如何动作。但是，王阳明没有任何动作，既不再等待朝廷答复，也没有时间等待朝廷答复，他担心再拖下去咳嗽会继续加重，再拖下去自己未必能够回到老家和妻子团聚。于是，王阳明便不等朝廷的批复，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径自启程北归。广东布政使王大用是王阳明的学生，他亲自用船将老师送到南雄，又命人护送老师弃舟登陆，翻越大庾岭，来到

南安府所在地即今江西大余县。

南安府的推官周积也是王阳明的学生，他已为老师安排好了继续北上的船只。王阳明上了船，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周积看着瘦骨嶙峋、气喘不已的老师，心中一阵难过，情不自禁眼泪就下来了。王阳明向他摆了摆手，问道：近来学问可有进步？周积止



马援

住悲声，一五一十说起自己在南安推官任上处理过的事务。他知道，老师从来就不主张抛开事功论学问。王阳明一面听，一面点头，他为这个弟子对自己学说的理解而高兴。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528年1月9日，王阳明乘船来到南安府治所在地大庾县的青龙铺。前一天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夜，这天早上他觉得精神似乎比昨天要好些。但侍立在舱内的周积等人却感到情形不妙。周积问道：先生可有交待？王阳明摇了摇头：

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

临终之前，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学说。谁说王阳明的学说是至善至美的？在王阳明自己看来，“亲民”也好，“致良知”也好，“知行合一”也好，“四句教”也好，都是正在完善但尚未完



善的学说，所以说“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

其实，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学说，都有其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所谓“完善”，也是相对的；所谓“至善”，更是一种“努力”的状态，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王阳明强睁双眼，嘴角动了动。周积赶忙俯下身子，问道：老师想说什么？王阳明笑了笑：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周积双目流泪，俯下身去，想听听老师还何交待。但见老师双目紧闭，已经走到生命尽头。

关于王阳明在江西南安府大庾的去世，有一传说，说是南安有一老僧，在王阳明到南安前的几天突然在寺中密室坐化。王阳明从广东北归到南安，来到寺中，却见这位容貌犹生的老僧身旁的墙上有几句偈语：

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问君欲识前程事，
开门即是闭门人。

偈语并不艰深，说你王守仁 57 岁的时候，将来到寺中拜谒我的真身。但是，对于你的前程，我却已经无须多言，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但是，关于王阳明的这段传说，完全是后人的附会，并不可信。王阳明从广东到江西，身体已经极其虚弱，担心自己熬不到

绍兴。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王阳明都不可能在南安即大庾游山访寺。这年王阳明正是 57 岁，这个传说说王阳明见了偈语，不禁愕然，几天之后便去世了。传说载于清人汪森的《粤西丛载》，并且注明来自明末广东才子邝露的《赤雅》，但《赤雅》的这一记载同样来自道听途说，不合情理。

至于王阳明的临终遗言，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载：“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黄绾的《阳明先生行状》则载：“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这两段话，应该说都与王阳明临终时的处境和心情相符。

【第十四讲】

斯人已逝，
斯人永在



一、身后的是非毁誉

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最先得知消息的当权者是吏部尚书桂萼。这是一个睚眦必报、争强斗狠的人物。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王阳明所表现出来的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态度，都使桂萼感到难以容忍。王阳明去世，桂萼仍然不依不饶，劾其“擅离职守”。嘉靖皇帝朱厚熜显然还没有对王阳明在“大礼议”中的沉默释怀，再一次地立场决定观点，认为王阳明擅自离任，蔑视朝廷，命群臣议罪。

由桂萼主持的廷议对王阳明一生做了如下的“盖棺定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淡；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若夫剿（灭）峯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

廷议有所保留地肯定了王阳明“体制内”的事功，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王阳明“体制外”的学说，称之为“邪说”。

平心而论，廷议对王阳明学说的评价，并非全是攻击，倒有几分客观。当时的学术讲究师承关系，如湛若水，为陈献章的弟

子；陈献章和胡居仁、娄谅等，则是吴与弼的弟子。再如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徐樾、颜钧是王艮的弟子，何心隐、罗汝芳则是颜钧的弟子。但是，王阳明从未入任何学者之门，尽管拜谒过娄谅，也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娄谅的弟子。王阳明学说，也确如廷议所说，是从批评朱学而起；为了调和与朱学的关系，断章取义地收录了朱熹的一些自我反省的书信和言论，说是朱熹晚年已经后悔早年著述太多，致使脱离了学术的根本，从来引起更大的争议。而王门弟子，也确实是良莠不齐，招致诸多的非议。

但是，这个廷议，又是典型的“立场决定观点”，对于王学的精髓——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视而不见，全然抹杀。

根据廷议的结论，再加上自己的认识，嘉靖皇帝保留了王阳明生前“新建伯”的爵号，但子孙后代不得世袭，至于功臣死后朝廷应该给予的优恤等，一概免去。在嘉靖皇帝和朝中当权派看来，王阳明既然死去，就让他像天上的流星那样，划过夜空，然后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

但是，朝廷有朝廷的看法，社会有社会的公论。所谓“公道在人心”，与朝廷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阳明的灵柩所过之处，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各地，百姓遮道，哭声震地；因学术分歧与王阳明存有芥蒂的江西铅山籍退休大学士费宏，同样因为学术分歧由挚友分道扬镳的江西弋阳籍礼部尚书汪俊，专门赶到贵溪迎候灵柩。弟子钱德洪、王畿刚刚离开绍兴，准备北上赴京参加殿试，得知老师逝世的消息，再一次放弃殿试，一面讣告同门，一面掉头而西，经富阳、桐庐、衢州、常山、玉山、上饶，与王阳明养子正宪一道，在江西弋阳迎候王阳明的灵柩。嘉靖八



年二月四日，王阳明的灵柩抵达绍兴。



王阳明绍兴故居遗址

从这以后，一直到嘉靖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落葬，前来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王阳明的生前好友湛若水、伍文定、刘节、龙光等；有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省，绍兴、杭州等府，山阴、会稽、余姚等县的官员。门人之中，已是吏部尚书的方献夫，以及黄绾、欧阳德、邹守益、魏良弼、薛侃、王臣、黄宗明、翁万达、陆澄、万潮、应良等，纷纷从各地赶来凭吊。多的时候，同一天抵达绍兴的竟然有上百人。不少友人和弟子从江西一直将灵柩护送到绍兴，接着又在绍兴操办丧事。

黄绾再一次表现出为捍卫师门不惜两肋插刀的义气。他历数

了王阳明的“四大功”：

其一，宸濠不轨，谋非一日，内而内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为之内应；外而镇守如毕真、刘朗等，为之外应；故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若非守仁忠义自许，身任讨贼之事，不顾赤族之祸，倡义以勤王，运筹以伐谋，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为伍文定之功，是轻发纵而重走狗，岂有兵无胜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

其二，大帽、茶寮、浈头、桶冈诸贼寨势连四省，兵连累岁。若非早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临镇，次第底定。

其三，田州、思恩构衅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机，感以诚信，乃使卢、王之徒崩角来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难。

其四，自来八寨为两广腹心之疾，其间守戍官军，与贼为党，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顺狼兵，卢、王降卒，并而袭之，遂去两广无穷之巨害，实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战危，守仁所立战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

黄绾又历数王阳明学术的“三大要”：

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

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



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

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

黄绾特别指出，王阳明的学术，都是本于“先圣”之“正传”：

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阳明年谱》）

为了师门之学能够获得官方认同，黄绾不得不为老师收敛锐气，把王阳明的所有思想，都说成是对“先圣”的继承，都说成是恪守正道：“致知”出于孔氏，“良知”出于孟子，“亲民”出于《大学》，“知行合一”源于《易经》，同时，集中火力抨击桂萼，以掩盖对皇帝的不满。嘉靖皇帝朱厚熜念其议礼之功，不予计较，却也不予以理睬。

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问题是皇位的终身制，任何政治积弊，只要皇帝在位，便无法革除；任何冤假错案，只要皇帝在位，便不得平反。嘉靖皇帝尽管身体不好，却硬是活了60岁，做了整整45年皇帝，成了明朝享年仅次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在位时间仅次于神宗朱翊钧的长寿君主。所以，王阳明的这桩公案也硬是被压了40年，不得翻身。

二、舆论倒逼庙堂

但是，王学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

由徐爱等人整理、薛侃等人出资印行的《传习录》，在全国范围内广为发行。这个《传习录》，收集了王阳明和弟子的讲论及通信，可以说是王学的“《论语》”。

嘉靖九年五月，阳明弟子薛侃及董沄等人，在杭州城南十里王阳明曾经游历过的天真山，建起了一座可容纳 100 多人住宿的书院，宣传王学。邹守益、欧阳德、方献夫等人在书院兴建时，专程从北京、南京等地赶来，搬砖运瓦。

嘉靖十一年正月，由吏部尚书方献夫发起，兵部侍郎黄宗明，翰林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六科给事中戚贤、魏良弼、沈谧，南京礼部侍郎黄绾，以及钱德洪、王畿等王门弟子 40 多人，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京师庆寿山房集会，相互激励，共倡王学。

嘉靖十二年，已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欧阳德，与同门何廷仁、黄弘纲、刘阳、钱德洪等，聚会于南京僧寺，开讲于南京国学，王学信徒闻风而至。

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与同门刘邦采、刘文敏等在安福建复古、复真、连山书院，加上刘邦采原来所创的“惜阴会”，称为“四乡会”，宣传王学。春、秋二季，齐往吉安青原山，会讲王学。

此后，凡有王门弟子或再传弟子为官或为乡绅的地方，无不建立书院及祠堂，祭祀王阳明，传播王学。《传习录》《阳明年谱》



《阳明文录》，以及《朱子晚年定论》《山东甲子乡试录》等文稿也一再印行。特别是王艮在泰州及江北广大地区聚众讲学，硬是“闹腾”出了一个泰州学派。而欧阳德等人则利用主持南北两京国子监的机会，公开宣讲王学。

嘉靖三十二、三十三年间，阳明弟子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大学士职务之便，与欧阳德、聂豹等人，讲会于北京灵济宫。灵济宫又称洪恩灵济宫，始建于成祖永乐时期，至王阳明出生的成化时代达于极盛。嘉靖时期，灵济宫虽然已经在败落，仍然是北京的“大去处”。在徐阶的号召下，王门弟子上千人大会灵济宫，声势何等浩大。

但是，对于这一切，嘉靖皇帝竟然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根本没有人向他报告。因为此时的嘉靖皇帝早已深居西内，一心一意制作青词，与上天对话，希望上天让他延年益寿，人间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王阳明要恢复名誉，还得在嘉靖皇帝仙逝之后。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去世，庙号“世宗”。继承皇位的是其第三个儿子裕王载堉，主持朝政的则是徐阶。

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科道官耿定向等人联名上疏，为王阳明颂功。吏、礼二部会议的结果，对王阳明重新做出了评价：

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

遽夺于身终？（《年谱附录一》）

这是朝廷第一次不但全面肯定王阳明的“事功”，称其为“文武之全才”，而且也高度评价了其“学术”，说是“阐圣贤之绝学”。“圣贤”之学已“绝”，经王阳明的阐发而重见天日。

根据吏、礼二部的会议结论，首辅徐阶代表皇帝起草了一篇制书，对王阳明的学问、事功乃至性格都进行了全面褒扬，赠新建侯，谥文成，“新建伯”的爵位可由其子孙继承。

围绕这一次对王阳明的“平反”，有几个环节饶有趣味。

第一，由徐阶起草的“制书”，用了这样八个字：“爰遵遗诏，兼采公评。”（《年谱附录一》）明明是嘉靖皇帝压了王阳明近四十年，但平反的时候还是要说是遵其遗诏，十分滑稽，但这也是当日中国之“国情”。

第二，无论是吏、礼二部“会议”的结果，还是内阁为皇帝起草的“制书”，都说到一个不争事实，即朝廷为王阳明“平反”，是舆论“倒逼”庙堂的结果。部议说王学“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不但肯定舆论对王学推崇的合理，而且批评朝廷对王阳明处置的不公。皇帝“制书”说的“爰遵遗诏”是官样文章，“兼采公评”才是事实。可以想象当年“王学”“阳明学”的声势。

第三，王阳明的“心学”是在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王阳明死后所受到的官方待遇，竟然和朱熹一样。当年朱熹死后，其说一度被南宋朝廷称为“伪学”；王阳明死后，被明朝朝廷斥为“邪说”。而对王阳明的平反，和对朱熹的平反一



样，都在其死后 40 年。

三、从祀风波

王阳明弟子及王学的推崇者并不满足于只是为王阳明“平反”，他们希望给王阳明和王学更高的地位。王阳明因“体制内”的“事功”，生前封“新建伯”，此时赠“新建侯”，这在明朝，除了开国功臣之外，已是文官的极品。他们要为王阳明争取的，是将其学术由“体制外”纳入“体制内”，让当时被称为“阳明学”的“王学”获得主流和官方的地位，让王阳明和朱熹一样，从祀孔庙。在此之前，嘉靖九年，陆九渊已经从祀孔庙，说明“心学”是完全可以和“理学”并列，成为“孔门正传”的。

首先提出以王阳明从祀孔庙建议的，是隆庆初年为南京提学御史的耿定向。耿定向与王阳明并无师承关系，却是王学的坚定拥护者。

万历初年，又有一批官员上疏，再请以王阳明从祀孔庙，但遭到另外一些官员的坚决反对。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石槩的意见可谓反对派的代表：

国家以祀典为重。当祀而不祀，则无以崇报功德；不当祀而祀之，又何以激动人心？王守仁谓之才智之士则可，谓之道德之儒则未也。（《明神宗实录》）

石槩认为，王阳明的所谓“致良知”，无非先圣先贤之“余

论”，而诋毁朱熹，乃“名教罪人”，怎么可能让其从祀孔庙？石槩甚至重翻当年旧账，说王阳明与宁王宸濠“书札往来，密如胶漆”。虽然言词过于激烈，却反映了当时不少人对王阳明及王学的看法。当时内阁首辅为张居正，正以“尊主权、一号令”整顿舆论，打击以书院为阵地的各类讲学，王阳明从祀孔庙之请，当然不可能得到批准。

张居正去世之后，王阳明从祀孔庙迎来转机。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重提旧事，请以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孔庙，万历皇帝让众臣“廷议”。明朝的“廷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开始由内阁主持，随着内阁地位的提升，改由礼部主持。参与者有六部的尚书、侍郎，都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大理寺、通政司的长官，以及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等，人数不少，但内阁大学士不得参与，以免操纵。

有学者专门对王阳明从祀的这一次“廷议”做了研究。当时参与“廷议”的官员共41位，表态的有34位，提出了6位从祀孔庙的人选：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吕柟、蔡清、罗伦。如果把表态视为“投票”，胡居仁26票，居第一位；陈献章、王守仁即王阳明各24票，并列第二位。另外3人，蔡清3票、罗伦2票、吕柟1票（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到了万历十二年的“后张居正时代”，明朝的朝廷是如何通过一种“开放”的方式解决从祀这一“重典”乃至决定重大事务的。



万历皇帝

在被推荐的六人中，唯一有反对票的就是王阳明。兵部侍郎石星反对的理由是王阳明诋毁朱子、自立门户；刑部侍郎丘橈直斥王阳明为“禅”。礼部自始至终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万历初主张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官员提出，朝廷连伯爵都给了王守仁，难道不可以从祀孔庙？礼部尚书陆树声严词答道：“伯爵一时之典，从祀万世之典。”（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万历十二年的这次，礼部立场依旧，侍郎王家屏强调一个原则：从祀为重典，必重其选，

不能今日入、明日出。虽然没有明言王阳明，指向却十分清楚。虽然王阳明的支持率过半，但礼部主持廷议，又是职责所在，所以有极大的话语权。廷议结束后，礼部尚书沈鲤以王家屏的“原则”为由，直接上疏，力阻王阳明从祀孔庙。

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不仅仅是因为在学术上与王阳明有分歧，对王阳明的行事作风不赞同，也因对王门弟子王艮、王畿以及他们的弟子李贽、何心隐等人做派极其不满。这正是黄宗羲指出的一个现象：“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明儒学案》）王艮、王畿的讲学，虽使王学传遍天下，但他们的活动方式却为王阳明招怨。

力主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是虽然不能参与廷议却又力图操纵廷议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等，在他们身后，是对王阳明充满敬意的万历皇帝。申时行以内阁的名义对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者以反批评：一、有人说王学是伪学，这是不懂王学所致，不屑与辩。二、有人说王阳明自立门户，但王阳明实是光大圣学；如果说光大圣学是自立门户，则宋儒张、周、二程及朱熹也是自立门户。三、有人说王学是禅学，但禅学的宗旨是外伦理、遗世务，而王阳明的气节、文章、功业，近世名臣不能望其项背，世上哪有如此禅学？四、有人说崇王学必废朱学，申时行引用万历皇帝的话进行反驳：“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万历皇帝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操修经济，都是学问。”（《明神宗实录》）这个指向也是十分清楚的，陈献章重操守，王阳明是干才，都是学问。但是，万历皇帝同样反对“聚众空谈”，将其视为“自立门户”。



在万历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万历十二年十一月，王阳明的牌位被搬进了孔庙，从祀孔子，称“先儒王子”，与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并列，成为明代钦定的四位大儒之一。大学士申时行特别赞赏王阳明的学问和事功并重，赞赏他“知行合一”：

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今诚祀（王）守仁、（陈）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乎！（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孔庙大成殿

国家需要的是像王阳明这样脚踏实地，有真才实学，有抱负和作为，能够安民立政的“真儒”，而不是只知坐谈立论炫耀见识，只知宽衣博带搬弄学问，只知上古三代而远离现实的腐儒。这个言论在当时是带有震撼性的，似乎也是为正在被清算的张居正鸣不平。

四、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

王阳明从祀孔庙，使得王学成了当时的“显学”。但坦率地说，从祀孔庙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王阳明的格局，使其由“凤头”变成“凰尾”。

根据1919年孔庙的最终排位，从祀孔庙的一共172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四配”，他们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第二等是“十二哲”，除了朱熹之外，其他11位都是孔门弟子，包括子贡、子路等；第三等是“先贤”，共79位，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在列；第四等是“先儒”，共77位，王阳明和人们耳熟能详的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文天祥以及陆九渊，位列在这一档。按时代顺序，王阳明排在“先儒”第32位，总排序第147位。这大概会让当代王阳明的拥趸大跌眼镜。

对王阳明从祀孔庙持不同态度的人，乃至持相同态度的人，宗旨和动机是不一样的。

坚持并且有力量将王阳明送入孔庙的万历皇帝和以申时行为代表的内阁，即明朝的朝廷，他们已经不在乎王阳明与朱熹学术



上的分歧，他们需要的是树立一个样板，一个能够为国家办实事，能够在任何时候为朝廷分忧的样板，这是出于当时“国家利益”的需要。

王门弟子及王学的推崇者，既希望为王学争得“正统”，也希望为自己取得“合法”地位，当然更希望老师的“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能够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以达到天下的太平。

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人，同样希望以从祀孔庙来树立样板，但不是王阳明那样时时不按常理出牌、为达目的可以上手段的样板，而是希望在孔庙中树立恪守道德的“纯儒”的样板，至于能不能办事，那不是“儒者”的事情。历代从祀孔庙的，大多属这一类。

“王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是一柄“双刃剑”。王阳明及其学说，是明代100年前后社会多元化的产物，又推动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王阳明所倡导的“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为与多元化社会相伴而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主要是物欲横流的问题开具了药方。但是，一、王阳明经历“百死千难”揭示的“良知”，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逐渐成了人们“把玩”的口号；二、空谈逐渐成了“阳明末学”的特征，“致良知”的“致”、“知行合一”的“行”被束之高阁，“亲民”更不再被提起；三、王学对朱学的批判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是一种挑战。

所以，在整个清朝，王学被压制，朱子重新被尊崇。但是在民间，特别是受王学深刻影响过的地区，王阳明从来没有被忘记，全国各地那么多的“阳明路”就是明证。在我的家乡江西吉安，

以及下放过的江西安福，历明清而至民国，一些曾经的书院所在地，一直在传唱“书院歌”，也可以称之为“阳明歌”：

生知为良，致知永彰。先觉觉后，淫目不张。淫目不张，
唯先生是唱。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两个东邻，朝鲜和日本，王阳明所受到的待遇也迥然不同。

朝鲜是明朝的“属国”，所以薛瑄、胡居仁、陈献章也在当时的朝鲜入了孔庙，但王阳明没被让进。什么原因？朝鲜不需要王阳明，当年朝鲜的统治者和中国清朝的统治者一样，害怕王学扰乱人心，冲击朝廷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日本却不一样，王学以“阳明学”的名称从明朝中期传入日本之后，经过两三百年的争锋，一度取代朱学成为显学，一批日本志士成为“阳明学”的信徒。在日本“阳明学”研究巨擘冈田武彦看来，日本的“阳明学”在幕末维新时期达到了“至今所未达到的思想上的深刻与透彻”，并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因是：第一，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多灾多难之际”，而日本的阳明学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奉行的是“务实的阳明学”。第二，日本的阳明学者认为：“人人确立起以深刻的自我体验为本的心学，是维系国家社会之纲纪的根本。”（《日本人与阳明学》）

冈田武彦之言，正是王阳明学说的本质之所在，既是“修心”之学，更是“实践”之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否则



就容易走向极端。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日本将领东乡平八郎，腰间常悬一铜牌，牌上镌刻七个字：“一生俯首拜阳明。”其实绝无此事。其一，此牌既无实物遗存，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提及；其二，无论在日本还是我国，没有任何研究东乡平八郎、研究王阳明的严肃著作提及；其三、东乡平八郎时代，日本的“阳明学”已趋沉寂，向西方学习成为日本的主流。

又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曾国藩也不错，但只能算半个。不知道此说的起源在哪里，只能说是“高手在民间”。在晚明及清朝，人们公认王阳明为有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王阳明的“立言”，是通过讲学、著述实现的：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是王阳明一生学术的精髓。王阳明的“立功”，是通过任职、处事实现的：事无大小，都体现出他的尽心尽责，处处都在“立功”。王阳明的“立德”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节，是王阳明立言、立功的终极动力。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气节。

还有一种说法：“明朝一哥”王阳明。这过于抬高王阳明了。说到“明朝一哥”，怎么也轮不上王阳明，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专称。没有朱元璋，哪来的明朝，又哪来的“明朝一哥”？但是，说王阳明是“明朝一哥”，又过于贬低王阳明了。因为王阳明及其学说，不仅仅属于明朝，也属于当下；不仅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东亚，属于世界。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认为王阳明是“完人”，也从来不认为其“心学”可以“包打天下”。但是，王阳明以自己一生的行为，践行自己的理念：“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以自己一生的行为，给世人也给后人做出了垂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无论是穷是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

从《大明嘉靖往事》，到《万历兴亡录》《国史通鉴》，屈指算来，《王阳明》是我和《百家讲坛》合作的第四个系列节目，也是我和《百家讲坛》开始合作时提出的第一个选题。

那是2009年4月。当我提出录制“王阳明”时，被编导王珊、李锋二位小友断然否定，理由是，王阳明知名度太低，《百家讲坛》需要收视率。我大吃一惊，有没有搞错啊，王阳明知名度低？即使低，难道就不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让他的知名度高起来？当然，不得不承认，王珊、李锋是对的，我是错的。截止到2009年，王阳明的知名度确实不高。举个例子，2004年6月，我借出差宁波之便，专门去了一趟余姚，打上“的士”，说“去瑞云楼”，司机说没听过。我说瑞云楼就是王阳明的故居。司机一愣：“王什么？”“王阳明”，我重复了一遍。司机一脸茫然，他真的没听说过，不但没听说过“瑞云楼”，也没听说过“王阳明”。2010年前后，王阳明的知名度开始高了起来，但直到2015年10月的一天，商传教授告诉我，刚在某省某设区市的“中心学习组”讲王阳明，课后一位正县级领导拉着他的手说：商教授，这个“王明阳”真



是了不起。听了半天课，知道了一个名字：王明阳。商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好一阵子犯糊涂，到底是王阳明还是王明阳？王阳明知名度确实不高。

最近几年，王阳明的知名度一路飙升，热心于“王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在一些圈子里，言必称“王阳明”已成时髦，口不离“致良知”象征身份，而一些机构传播“知行合一”的方式，颇类风靡一时的“祭孔”，更似屡禁不止的“传销”。说来奇怪，任何“文化”，一旦加热过度，便成“文化产业”；一旦成了“产业”，“文化”自然变味。

有个好玩的事情。一家电视台拍摄王阳明宣传片，让我提意见。我一看宣传大纲，第一句话是：“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第一人。”我问这个提法从何而来，答复是“专家”的结论，但专家怎能下如此不顾事实的结论？事实是，王阳明从其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存在争议，一直毁誉参半。这个事情说明，即便是“专家”，也未必真正了解王阳明，或者，未必能够客观看待王阳明。

还有个更好玩的事。有位企业家朋友，三年前打算投资拍摄王阳明的电视连续剧，希望我做历史顾问，并且找来了一位据说比较著名的编剧。但是，编剧“编”出来的剧本，却是“穿越剧”的路子，朋友和我都不满意，这不胡闹吗？但人家编剧不这样看，“穿越剧”的路子有什么不好？可以多卖拷贝啊！应该说，编剧比我们更了解观众，“正版”的王阳明未必受欢迎，“戏说”的王阳明才可能有市场。这或许就是“文化市场”的属性，我跟不上形势。

忍不住还要说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2017年11月，我在北京

出席一个超大规模的“王阳明”会，会上的主题报告说明朝患了“癌症”，王阳明给明朝的“癌症”开药方。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满场喝彩，我却愕然。王阳明的学说确实是给明朝社会开药方的，但谁说王阳明的时代明朝得了癌症？一个朝代犹如一个人体，人总是会得病的，人体也确实是有癌细胞的，但并不是有癌细胞就有癌症，更不是得了病就是癌症。明朝也一样，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就杀了无数的贪官污吏，能说明朝一开始就得了癌症？王阳明出生在明朝开国的第105年，去世于明朝亡国前的115年，王阳明的时代，正是明朝多元化社会形成的时代，是明朝社会转型的时代，明朝老百姓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当然，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的多元化，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这本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王阳明学说的核心，“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正是针对这些社会问题开具的药方，但并非是治疗“癌症”的药方。难道明朝竟然拖着患有癌症的躯体，度过它的大半生？

以上种种，说明这些年来，王阳明的知名度虽然是高了，但人们对王阳明，对王阳明学说以及王阳明时代并不真正了解。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不管通过哪种方式，只要真正能让王阳明的学说、思想和精神传播出去，哪怕是传播一点点，让多一些的企业家、公务人员及各色人等多知道一些“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就是好事，就应该鼓励。恰恰相反，人们对王阳明、王阳明学说、王阳明时代的不了解，倒是我们这些所谓学者没有做好工作，没有把相对真实的王阳明、王阳明学说、王阳明时代，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王阳明的话——用“愚夫愚妇”的方式传播出去。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汲汲以求地“学为圣贤”；中年时代的王阳明，义无反顾地“知行合一”；晚年时代的王阳明，越来越回归于平淡，将“致良知”视为一生之精神。有朋友问我，王阳明学说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归纳了一句话十个字：“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是对有抱负、有想法的朋友而言。还有一句话，也是十个字：“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这是对所有的人而言。有位企业家朋友把“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十个大字书写在自己创办的“庐陵人文谷”入口处，警醒自己，感悟他人，让我感动。

坦率地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王珊、李锋否定我的“王阳明”耿耿于怀，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感谢他们。十年前我提出录制王阳明，一是因为对王阳明学术与事功的景仰，我是他的铁杆儿粉丝；二是因为曾经写过一本王阳明的传记，以“旷世大儒王阳明”的书名出版，如果讲王阳明，撰写讲稿比较轻松。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我以这样的态度录制“王阳明”，大概会停留在1997年写作王阳明传时的水平。但是，十年之后的今天来讲述王阳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认识上的突破，得感谢“王阳明热”兴起之后，多地党政机关、多家办学机构请我讲述王阳明，使我对王阳明的事情、王阳明的学术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我接触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中，确实有“懂”王阳明者，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获益良多。我甚至认为，如果他们真正研究王阳明，对王阳明学说的理解、对王阳明精神的领悟，绝非高校和研究机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导的一般学者可比。因为王阳明学说的形成，既是从“书”

中诵读而来，更是从“事”上磨砺而来。胡居仁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几乎是对王阳明学说形成的总结。同样，对王阳明学说的理解、对王阳明精神的领悟，固然需要读王阳明的书，更需要像王阳明那样，无论穷达，都有敢于担当的精神，都有兼济天下的情怀，甚至需要像王阳明那样，有“百死千难”的经历。

认识上的突破，我还得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游道勤。道勤是我30多年的老友、小友，我们之间有十分难得的默契和信任，是他让我对《旷世大儒王阳明》进行了修订，并以《千古一人王阳明》的新面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个暑假的修订过程，也是我对王阳明重新体悟的过程。但是，我一面为《千古一人王阳明》的出版感到高兴，一面又觉得意犹未尽。由于是修订旧稿，我不忍心打破原书的结构，下不了决心推倒重来，自然也就无法把这些年的心得和感悟真正融入进去。

为了对得起王阳明，也为了对得起自己，趁着《国史通鉴》第四部和第五部的间隙，我开始重读王阳明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传习录》，更多地关注国内外王阳明研究者的成果，也感谢钱明教授惠赠他自己及其导师冈田武彦先生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仔细琢磨王阳明身上发生的事情，反复思考王阳明及其学说发生的时代。一段时间之后，竟然觉得“任督二脉”被打通，有点王阳明点出“良知”二字的振奋，思路清晰了，写作也越来越顺畅，对于王阳明的立德、立功、立言，对于王阳明身上“人”和“神”的交融，对于王阳明“心即理”“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念的形成、内涵及相互关系，以及王学对陆学的继承、对朱学



的挑战及其间的瓜葛，特别是王学对当代社会、对后世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句话，对王阳明的心学、对心学的力量自认为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于是有了这部《王阳明：心学的力量》。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蔡长虹小友和于殿利总经理。商务已经出版了我的《万历兴亡录》和《国史通鉴》的前四部：《天下大势·远古先秦卷》《山河万里·秦汉三国卷》《乡关何处·两晋南北朝卷》《大国气象·隋唐五代卷》，以后还有第五部（辽宋金元）、第六部（明清）。虽然市面上已经有了多得数不清的“王阳明”，他们还是欣然决定出版《王阳明：心学的力量》，让它尽快与读者见面。作为当今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从19世纪末创办至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每个中国读书人都感激商务印书馆在“开启民智”方面的贡献。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杂务，我错过了去年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年的盛典。

为了和更多的人分享我对王阳明研究和体悟的心得，我和《百家讲坛》制片人那尔苏、陈力商议，抽出这部书稿的部分内容，在《国史通鉴》的第四、五部之间，插录一个《王阳明》，了结十年来的心愿。我的想法得到那尔苏、陈力二位小友的全力支持，也得到已经在新岗位上的王珊的支持，于是在2018年的5月11—13日、6月10—12日，录制了14集《王阳明》。我认为，这是和“百家”合作以来，录制时间最为紧凑、自我感觉也最为良好的一个节目。

“百家”的录制过去了一个多月，书稿也在商务的编辑之中，但在写这个“后记”的时候，我竟然还是兴奋不已，这是以前我

为其他著作写“后记”时所没有过的。

想起 2014 年在贵阳和董平、于丹一道录制王阳明的节目，我和央视主持人张腾岳小友私下交流：王阳明从小想入非非，是从“三教九流”中来，是从“异端”到“主流”。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混迹于“三教九流”，少时甚至幻想“太乙真人”或“菩提老祖”将自己带到某个山洞学习武功，如今身边的朋友，仍然有不少“三教九流”。

原来，这一次写作王阳明、讲述王阳明的感觉，好像是在面对身边的朋友，讲述一位刚刚去世的朋友的故事。这位刚刚去世的朋友，名叫王阳明。

为本书题写书名的，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中央美术学院邱振中教授，特此致谢！

方志远

2018/7/27

井冈山红东方寓所

2019/4/9

改定于江西师大北区寓所

《王阳明》是明史学者

方志远教授与《百家讲坛》合作的第四个
系列节目。节目播出后，被观众称为“余音不绝，堪称
经典”。《王阳明：心学的力量》由方志远教授根据讲稿修
订而成，全书系统讲述了王阳明从“少年立志”到成为有
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第一人的波澜起伏的
生命历程，展示了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探索“圣人
之道”、体悟“心性之理”、践行“亲民”“致良知”“知行
合一”的心路历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将“心学”
改造为既是“修心”之学又是“行动”之学、
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良知”之
是非为是非、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
之心的王阳明。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7871-6



定价：40.00 元